

## 目 录

1889年10月(一岁) .....	( 1 )
1890年—1894年(二—六岁) .....	( 2 )
1895年—1897年(七—九岁) .....	( 3 )
1898年—1899年(十—十一岁) .....	( 3 )
1900年—1904年(十二—十六岁) .....	( 4 )
1905年—1906年(十七—十八岁) .....	( 5 )
1907年(十九岁) .....	( 6 )
1908年—1909年(二十—二十一岁) .....	( 6 )
1910年(二十二岁) .....	( 7 )
1911年(二十三岁) .....	( 8 )
1912年(二十四岁) .....	( 9 )
1913年(二十五岁) .....	( 11 )
1914年(二十六岁) .....	( 17 )
1915年(二十七岁) .....	( 19 )
1916年(二十八岁) .....	( 23 )
1917年(二十九岁) .....	( 32 )
1918年(三十岁) .....	( 51 )
1919年(三十一岁) .....	( 64 )
1920年(三十二岁) .....	( 94 )
1921年(三十三岁) .....	( 116 )
1922年(三十四岁) .....	( 138 )
1923年(三十五岁) .....	( 158 )

1924 年 (三十六岁)	.....	(178)
1925 年 (三十七岁)	.....	(196)
1926 年 (三十八岁)	.....	(217)
1927 年 (三十九岁)	.....	(234)

附一:

公祭仪式	.....	(245)
------	-------	-------

附二:

李大钊著作目录	.....	(248)
---------	-------	-------

1889年(一岁)

10月

29日 (阴历十月初六日) 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李大钊乳名憨头, 少年时名晋年, 字寿昌。后来改名大钊, 字守常。

大钊同志的远祖原籍山东, 明朝曾为官,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奉诏移此”。(参见刘荆山《李大钊同志轶事补遗》《乐亭文艺》1979年二期)

父李任荣, 字华亭, 自幼勤读诗书, 知文达理, 写得一手好字。早年患肺病, 1888年5月, 冀东大地震, 因受惊吓病情加剧, 第二年病逝, 终年二十三岁。母亲周氏, 生下他一年多, 因感伤过度逝世。

“在襁褓中, 即失怙恃, 既无兄弟, 又鲜姐妹, 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狱中自述》)这“垂老之祖父”即李如珍。他读过书, 早年在东北开过杂货铺, 家中有田九十亩, 过继侄子李任荣为子。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 到了十八世纪的清朝中

期，已经腐朽不堪。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从此，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祖国的灾难日益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和其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革命运动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斗争精神。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国情，就是大钊同志的童年和他革命一生的活动舞台。

## 1890年—1894年（二—六岁）

大钊同志幼年，全靠祖父李如珍抚养照料，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祖父对他极疼爱，至四、五岁时，还不放他出去玩，每天带他在院子里种花、浇水、锄草、捉虫，有时还给他唱小曲、讲故事。

五、六岁开始，由祖父教字。用的是一寸见方的生字卡；串门、走亲时，也要他认读和背诵人家门上的对联。祖父对他管教极严，告诫他外出时不准看玩赌博的，更不准打架、骂人，否则要受处罚。这种严格的家教，对大钊同志的成长为人，影响很大。

## 1895年—1897年（七—九岁）

大钊同志七岁时，祖父把他送到庄西头老谷家私塾，跟单子鳌老先生读书。初入塾学，即跳过“蒙学”阶段，同较大的孩子一块读《四书》。

大钊同志读书，专心致志，才思敏捷，又肯于帮助同学读书破讲，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得老师喜爱，他小时的名字就是由单先生起的。大钊同志对这位幼年的蒙师，十分尊敬。后来大钊同志在北京工作时，还定期给他寄捐书报，关心单先生的进步。每逢假期回家，都要前去看望。

大钊同志在谷家私塾里念了三年书，学业良好，进步极快。单老师提出，他个人的学问已不能满足大钊同志的要求，请其祖父“另请高明”，从此，大钊同志转了学。

## 1898年—1899年（十—十一岁）

十岁时，按当地早婚的风俗，与本村赵纫兰结婚。

赵纫兰（1882—1933）为人贤惠，待人热诚厚道。在大钊同志求学时期，她在家服侍老人，操持家务，以典当挪借凑钱支持大钊同志上学。1920年随大钊同志迁来北京。从此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大钊同志牺牲后，她又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继承父志的重任。1933年在参加大钊葬礼后不久，含恨逝世，并葬于大钊同志墓旁。

1927年，大钊同志在《狱中自述》中曾两次提到夫人赵纫兰。

“……在永读书二年，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

服侍。不久祖父弃世……”。“……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

大钊同志离开谷家私塾，来赵家，随赵辉斗念书二年。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附于光绪皇帝的支持发动的一次变法维新运动。由于遭到顽固派的镇压，历经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运动终于失败。

### 1900年—1904年（十二—十六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提高，1900年，大钊同志又被送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宋举人家跟黄玉堂先生念书。（宋家是当地的名门大家，设有专馆。黄玉堂，乐亭县小圣庙村人，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

大钊同志读书很刻苦，在二十多个同学中，他是拔尖的，很得黄先生的赏识。

这时，大钊同志已经比较注意思索，开始萌发出一种雄心壮志。据老年人话当年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腊月傍年，大家谈论起清朝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的事来，引起黄先生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当黄老师讲了洪秀全主张妇女同样可以担任各种官职、参加科举考试，废除束缚妇女的恶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事迹时，大钊同志说：“洪秀全的很多主张不是很好吗，为啥还说他造反呢？！”又问黄先生：“太平天国有百万大军，占领了十一个省，怎么失败了呢？”最后他表示：我长大了要效法洪秀全。黄先生当即劝阻说：“汝勿言不能之，言欲求免祸先求慎言。”

“黄先生对李大钊这个得意门生要学洪秀全的事，难以理

解，但铭记在心，以后经常向人学说。”（刘荆山《李大钊同志轶事补遗》）

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五月，运动席卷华北，冀东各地也建立了义和团组织。

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出卖京津周围的军事控制权；在北京设立使馆区等，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之中。

### 1905年—1906年（十七—十八岁）

1905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在那儿我度过两载光阴。”（参见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革命文物》1980年第三期）

大钊同志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中学，课内主要还是念些古文之类的书，但开始接触科学，阅读过康、梁的文章，初步了解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眼界有所开阔。

这期间，正值清王朝复亡前夕，清政府的卖国求存，帝国主义的竞争瓜分，内忧深重，外患紧逼，祖国处在危亡之中。大钊同志痛感于这种“国势”的“陵夷”，怀着一腔“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激情“……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狱中自述》）

1905年8月，革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通过了该会的总章和宣言，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 1907年（十九岁）

祖父李如珍逝世。家境日趋破落，大钊同志面临着失学的威胁。这时，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去外埠求学。但大钊同志认为他作官的钱来得不正，断然拒绝。

### 夏

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

“祖父谢世，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当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非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狱中自述》）“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参见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还接触了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民主制度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等。他学习刻苦，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孕育着革命的志向。这是他一生学习求知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爱国思想发展的时期。

## 1908年—1909年（二十一—二十一岁）

作《登楼杂感》二首。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大钊同志最早的诗



作。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南方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等惨遭杀害，面对这种国破山河碎的现实，大钊同志“感慨韶华似流水”“青鬓无端欲白头”，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心情很急切。唯恐“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但怎样救国呢？心里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主见。所以不能不自叹“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了。思救家国，而无出路，这使他很苦闷。

1910年（二十二岁）

11月

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宪政。法政学校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为此举行罢课。大钊同志参加了罢课活动。

本月21日 天津《大公报》载“联合进行”报导一文，内有“旅津全国学界请愿国会同志会”，发电全国的电文，原文称：

“……鉴国势危急，非即开国会不能救亡。津全体学界停课，已举代表晋京请愿，特电贵省速起以为后援……”

又、云南、贵州、四川、新疆、甘肃、五省路远山遥，不能举代表联合，另发长电一道，原文是：

“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鉴东三省危甚，非即开国会莫救，奉津学界因请愿断指割臂者数十人，热血奋飞，感痛何似！现已一律罢课，一面求准督宪代奏，一面举代表晋京请愿，并组织同志会以为后盾，希转各界举代表晋京合作，乞明年召集至盼。

## 在津全国学界请愿国会同志会”

本月23日,《大公报》又载“请愿风潮略平消息”,内称“闻日前督宪陈制军,对于在津全体学界请愿国会之风潮,曾下一札,严斥巡警道无能,札中有‘行同聋聩,事前不能预防,事后又不能解散’等语。该道因两面不得讨好,已决意辞职。”

对这次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活动,大钊同志的老师白毓昆(字亚雨)认为: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要变法、维新、立宪,都是不可能的;请求清政府开国会,只是“与虎谋皮”。大钊同志对白毓昆老师的政见十分赞同。(白曾在上海参加同盟会,为开展北方革命工作,来天津在北洋法政学校和女子师范担任教员,是京、津、保同盟会重要领导成员。)

大钊同志对白毓昆老师非常尊重,课后常和同学一起邀请白老师讲评历史掌故,师生融融一堂,直至深夜。白毓昆老师对这位勤奋有为的学生,特别器重,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参见1980年第四期《革命文物》《李大钊的老师——白毓昆烈士》)

## 1911年(二十三岁)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大钊同志最初对这场革命寄予极大的希望。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成果,政局逆转直下。大钊同志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

本年,作《哭蒋卫平》七律二首。

(蒋卫平,是爱国志士,大钊同志的好友。约在1910年在

东北渡河时遭反动派暗算牺牲。)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哭诉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先烈。另一首《题蒋卫平遗象》大约也作于这年。诗沉痛悼念牺牲的亡友，抒发了悲壮的情怀。

本年春，清政府为挽救垂死的命运，决定这年秋季在永平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白毓昆为首的革命党人得知消息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策动在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待命的新军届时起义。他和一些同志打入滦州、永平一带的新军中去工作，奔走于京、津、张家口等地推动起义工作的开展。

9月18日，天津《大公报》载“立宪军成立”消息。

“探闻驻滦州之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于昨15日早八时在滦州迤北玉皇山庙内，召集全军官弁勇丁开大会，换白旗中红绦一道，命名为立宪军。”

## 1912年（二十四岁）

### 6月

写《隐忧篇》，发表于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三期上，署名李钊。大钊同志原热望辛亥革命能够“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但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紧步胜利之后，到来的是袁世凯的窃权。多灾多难的祖国如同“敝舟深泛溟洋……固犹在惶恐滩中。”接着指出：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六忧。

## 冬

去北京。应孙洪伊之约，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在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发生交往，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参见曹绥之、曹嘉荫：《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件存北京市档案馆）

年底，陈翼龙、曹嘉荫到天津组织建立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

## 冬末

作《岁晚寄友》五律诗二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江山虽“依旧”，但“风景已全非”，国家发生了沧桑之变，诗句流露着欢快之情。“慷慨思投笔”但又“艰难未去师”，同时也含有内心的隐忧。

本年1月1日 南京组织了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3日 滦州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王金铭为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部部长并暂兼外交部长。4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宣告独立；并发布檄文，声讨祸国殃民的清廷，号召同胞们群起杀敌，光复河山。

5日 滦州起义失败。白毓昆英勇牺牲。

3月10日 天津《大公报》载“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广告”：

“顷准学务公所函称，因津埠猝遇变乱，学堂应暂缓开学等因，所有本堂前次广告应暂行取消，一俟时局安全开学有期，再行登报通知，此布”

3月21日 《大公报》又载“追悼会将开”消息：

“中华民国同盟会诸君，发起追悼北方死难诸烈士，订三月二十四日假李公祠为会场。

烈士姓名

滦州：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总参谋白毓昆（白亚雨）……”

1913年（二十五岁）

2月

12日 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成立。成立时，天津警察所奉冯国璋之命加以阻止。大钊同志急来京，商量对策，终于托关敬恒向赵秉钧说明后，才得以成立。（参见曹绥之、曹嘉荫《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

4月

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

“他早期的论文，是发表在《言治杂志》上……开始是月刊，后改为季刊；中间还曾经因为嫌每月出版一期太慢，与在北京的同人合办过一个《法言报》……《言治月刊》出版了六期以后，改办《法言报》，大钊同志仍然是一个热心的参加者，而他这时发表的文章，郁癡先生说它是‘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汨汨，所以箴贬贖蒙，鼓舞群伦者。’……可惜他在《法言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参见贾芝“《李大钊诗文选集》后记”）

1日 在《言治》创刊号上，发表《大哀篇》，署名李钊。

大钊同志以痛切难抑的感情，抨击了卖国贼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表达了对祖国人民仍然蒙受苦难的深切关注。文章指出，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窃权卖国，“击柱论功于灿然国徽下矣。”他们敲榨民脂民膏，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而对人民却“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载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同期，还发表《弹劾用语之解纷》一文，署名李钊。

又，发表《筑声剑影楼纪丛——朱舜水之海天鸿爪》，署名李钊。

这是大钊同志编述的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客死日本的事迹。文章赞扬朱舜水的爱国思想，义风刚志，叙述了他与日人的交往，晚年的壮心，所留的遗物等，“拾零存遗”不失点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朱舜水的敬仰之情。

又，发表《更名龟年小启》，署名李钊。借“更名龟年”的“小启”，评述了卖国贼袁世凯独裁专权后的黑暗现实——“暴君歇，而暴民兴，天祸殷，而人祸极”，“盛世难期”，封建皇帝虽被赶下台，而中国人民仍然当牛作马，“而今而后，化猿化鹤尚不可知，则呼马呼牛亦惟漫应而已。”

## 5月

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二期上发表《暗杀与群德》一文，署名李钊。

又于同期发表《复景学铃君》，署名李钊。他以《言治》记者的身份复景学铃关于“征求朱舜水先生著作及手迹”的来函。

在复信中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已。……钊生当衰季之世，枪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神州光复，未有祭告，以慰英魂，而樱花三岛间，迺于去复举行舜水二百五十年纪念祭典，倾闻之下，欣痛交集，时披阅东报，见其关于先生轶事遗闻之记述，辄为译辑……陆续载之本报，以供众览，阐出存轶之责非所敢辞焉。”

又于同期发表《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主要介绍当时日本举行舜水祭典之时，考古学者辩论和质疑的一些情况。

## 6 月

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三期上发表《裁都督横议》一文，署名李钊。这是针对“暴汨恣睢，飞扬跋扈”的都督而发的。本文论述了裁都督之必要、时机和办法，以及善后等几个问题。大钊同志认为，解除军法，拥护宪法，巩固国权，伸张民权，整顿吏治，都不可不裁都督。

又于同期发表《论民权之旁落》，署名李钊。袁世凯窃居大总统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实行个人独裁，打击革命力量。于3月15日，指使其内阁总理赵秉钧，在沪宁车站暗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接着又向英、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指出：阴谋盗窃民权的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造成了中国“危机万状”，民权“旁落”，“民生益沦于涂炭”。

## 7、8 月间

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去北京。

他在用英文写的《自传》中说：“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

“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恰好在这时，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引自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三期十八页）

8月 社会党人陈翼龙在京被杀。这时，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也陷失败。时局的黑暗，使大钊同志极为愤慨和痛心。他迫切地期望找到一条拯救革命的出路。

## 9 月

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四期上发表《原杀——暗杀与自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等文章。均署名李大钊。

月初 离北京，返回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他携同学子默来到昌黎县的碣石山作旧地重游。这次重游，有和祖国暂时作别的深意。他们游遍了五峰山和附近各处，看了那里的名胜和秋景，特别看了水帘寺和玉液池；看了一些名人留下的诗文和刻石，抄了水帘歌和其他的诗，从碑文上研究了明末范志元将军扼守昌黎，抵抗清兵入侵的历史，还向当地群众了解了当年百姓坚守昌黎城的英勇事迹。

这期间，他留下子默在昌黎，自己回到大黑坨村家中小住，



后又返回同子猷继续游览。这前后两次在碣石山共住了十多天。

11日夜晚，日本帝国主义在昌黎车站枪杀了我五名路警：巡夫刘忠，警察杨相秋、王学儒、刘秉俊、刘金铭。对此大钊同志非常震痛。后来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常以愤愤难平的心情回忆到这件事，殷切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个“弥天耻辱”，“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就象那块碣石一样。”

中旬 由故乡回天津。

## 10月

翻译出版《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书。

抵津后，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狂热鼓吹瓜分中国之说，他与北洋法政学会同人“休于亡国之痛”立即将它翻译出来，并附“驳议”数万言“以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知耻知惧，竞奋图存。”该书出版后，“风靡一时，远及外国。”（《大钊同志五四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1957年4月27日《文汇报》）

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五期上发表《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宪法颁行程序与元首》。

## 11月

1日 在《言治》第六期上发表《文豪》、《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各国议员俸给考》、《游碣石山杂记》、《自然律与衡平律》跋等文章。均署名李大钊。

又于同期发表《吊圆明园故址》二首，诗前的小序抒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感慨：

“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岗，望圆明园故址，只

余破壁颓垣 峙于荒烟的蔓草间，欷歔凭吊，感慨系之。”

又《咏玉泉》、《有感》二首七言绝句也登在这期上。《咏玉泉》痛斥了清末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挪用筹建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罪恶。

以上几首诗，估计是在7、8月间大钊同志在京时所作。

## 冬

东渡日本。

行前写诗一首，载《言治》月刊第六期上。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  
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  
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南天动乱”指的是这年七月袁世凯派兵南下，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革命力量事。大钊同志正是在这种国势日非的情境下，只身东渡日本的。“去国徒深屈子恨”，此时的心境，如同两千多年前屈原出走郢都那样，是充满着无限的憾恨的。

“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警告全国父老书》）

《李大钊选集》)

冬，抵东京。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

本年1月24日 天津《大公报》载《中国社会党通告》，内称：

“……故特促北京部主任陈君翼龙来津重行组织，现已择定东马路中崇仁宫内为事务所……有志入党者，不分种界、国界、教界、党界，无论男女，均可随时到所签名入党。今订期阳历二月二日在河北李公祠内开成立大会，届时并请社会主义大家江亢虎、张继、丁义华、吴稚晖、卢信、陈游侠诸君莅场演说……。”

## 1914年（二十六岁）

初春，去“游就馆”参观。

“居东京，适游就馆，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 春

大钊同志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并开始研究马克思著作。“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开始的。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幸德秋水的著作，也给了他以较大影响。（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213页）

在东京，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早稻田大学，组织了经济学会，任责任干事。

这时，他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写了不少针砭时政，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封建军阀卖国行径的文章。

他在英语课上还写过一篇短文——《我的自传》，记述了自己从出生到去日本留学的简单经历。

## 6月

与在东京办《甲寅》的章士钊相识。章士钊回忆说：“1914年在东京办《甲寅》，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巽言覆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见章士钊为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作的序）

10日 在《甲寅》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风俗》一文。署名李守常。大钊同志所谈的“风俗”，实指国家和民族的世风国风问题。文章指出：世风、国风坏了，比亡国还可怕。他说：“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心死”、“亡群”就是国家和民族的世风、国风败坏。那样就会“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于禽兽……仁义充塞，人将相食。”

他抨击当时袁世凯窃权后“政如疾风，民如秋草”“盈廷皆争权攘利之桀……钩心斗角，诈变机譎……”。他最后希望举国上下一致努力“蔚成”一个好的“国风”。

又于同期发表《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一文。署名李大钊。这是他当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一篇论文。

## 11月

1日 在《中华》杂志上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署名李守常。

10日 在《甲寅》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国情》一文。文章指出袁世凯借《新约法》把总统的权力规定得同皇帝一样。这是其阴谋复辟坐皇帝的一个严重步骤。而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的《新约法论》和日本有贺长雄的倡总统内阁制之说，则极力为袁世凯准备称帝造舆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新约法》是袁世凯与美日反动派合谋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产物。

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袁称帝的先声，表现了大钊同志在政治上的深湛和远见。

## 1915年（二十七岁）

### 2月

当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在报上透露后，我国留日学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会上公推大钊同志为文牒干事，负责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

文章痛陈了甲午海战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况。“日人挟其战胜之余威，索我辽东半岛”，“《卡西尼中俄密约》之结果，旅大租于俄，广州租于法，威海租于英，胶州租于德。意大利闻而生心，亦欲据我三门湾”。庚子之后，帝国主义更加如“争食之饿虎”强行瓜分中国，“英之于西藏及长江流域也，俄之于外蒙、伊犁

也，日之于福建，南满也，法之于滇，德之于鲁也。或由战胜攻取，或由秘密缔约，或由清廷断送，或由列国协谋。”

大钊同志又从东西各国报章披露之十九条公布于众，并痛切指出：“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此日本乘机并吞中国之由来，吾人所当镌骨铭心，志兹深仇奇辱者也。”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四万万中华国民身上。“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他号召中国人民“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应当“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这篇通电发出后，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 4 月

发表《“中国国际法论”译叙》（由健行社发行）署名李大钊。

《中国国际法论》是日本学者专论外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租界问题的一本专著，这是与其他同学一道翻译的，他在译叙中说：“是为我国将来撤去外国裁判权，收回外国行政地域之考镜。”又慨叹“夏宇邦人，醉梦于燕幕鱼釜之中，既所在多是，其有聪明颖悟之士，亦且瘁心殚虑于内忧外患之间，皇皇焉奔呼救亡之不暇，更有何人专注于学术……究考吾国痛深切肤之国际关系者……”。“此书一出，更引起国人从法律方面对领事裁判权及租界问题的研究，以实现领事裁判权的撤销及收回租界的正义主张。”

又发表《启事三则》、再版《‘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蒙古及蒙古人》——蒙古丛书第一种、《世界风云与中国》。署名李大钊。

## 6月

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署名李大钊。

文章首先叙述了中日关系的痛史，告诉中国人民有三件奇耻大辱不可忘记：“曰甲午，曰甲辰、曰甲寅。甲午之役丧师割地，东亚霸权，拱手以让诸日本。甲辰之役，日本与俄争我满州，而以我国为战场……甲寅之役，日德构衅，以吾国山东为战场……竟欲演亡韩之惨剧于吾中国。此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

又根据报章披露的消息，揭露了日本与袁世凯勾结，强行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外交内幕，痛切指出：“延至今日，吾国竟屈于敌，震于其强暴无理之最后通牒，丧失国权甚巨，国将由此不国矣！”

在叙述了山东问题，南满问题、东蒙问题、汉冶萍问题、福建问题等五项悬案问题后说：“总之，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对于列国，则阴削其极东之势力，既得者使之减损，未得者予为防遏，得志则称霸东方，不得志则以我国为嫁祸之所。”极其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文章号召全国人民，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努力奋斗，“前途正自辽远。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

## 8月

1日 在《通俗》杂志发表《欧洲战事谈》。署名冥冥。

10日 在《甲寅》杂志一卷八号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署名李大钊。

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悲观失望，少数人厌世自杀。陈独秀于1914年冬在《甲寅》上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也流露了这种情绪。大钊同志在文章中善意地批评了他“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的错误。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鼓励我国人民要“精勤不懈”，不要因眼前的境遇而“过自菲薄。”他极力倡导“自觉心”，唤起人们的爱国精神，摒弃那种病态的“厌世心”。

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

他鼓励国人不要“自薄”要“惟有本其自觉力，龟勉奋进，以向所志”，“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又说：“吾民具有良知良能，乌可过自菲薄，至不侔于他族之列”，他认为死要死得有价值“且时日害丧，国耻难忘，充吾人之薪胆精神，迟早当求一雪，即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

这篇文章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处处激人向上，给人以积极影响。

9月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

12月2日 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帝制，自称“皇帝”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改国号为“中华帝国”。25日，蔡锷等人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纷纷响应。



1916年（二十八岁）

## 1月

留日学生总会，支持云南的“护国军”并代筹军饷；学生总会又推举大钊同志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民彝》杂志，开展反袁宣传活动。

月底 由日本横滨搭法轮到上海，联系反袁事宜。（参见《太平洋舟中咏感》前小序。载《言治》季刊第一册）

大钊同志在《太平洋舟中咏感》一诗中写道：

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 2月

中旬 在上海住了两周后返回日本。同几个朋友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在这里致力于反袁工作；研讨时局的发展变化。

## 春

再至江户，与同人一起，为即将返国的幼蘅饯别。席间，互

相写诗，表达他们改造神州，拯救祖国的理想和抱负。大钊同志也即席作诗一首赠幼蘅。这首七言绝句是：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幼蘅行未久，大钊同志又去江户送别朋友相元，也作诗相赠。诗中写道：

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  
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

这首诗讲了国内的反袁斗争形势，同时对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寄予深切同情。他自己和同辈们，则因没能改变这种黑暗现实而深感不安和内疚。（上述两诗均载《言治》季刊第一册）

此间，“神州学会”成立于东京。大钊同志是发起组织者之一。成员曾合影留念。（照片存北京历史博物馆）

## 5月

在《民彝》第一期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署名守常。

文章是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文章指出：大盗窃国“冯借政治之枢机”，“凡所施措，莫不戾乎吾民好恶之常……肆至披昌，民贼迭兴，藐无忌惮。……且复饰迹于祭天尊孔之典，匿身于微言大义之辞，以图压服人心，钳制人口”。

他赞扬了我国人民那种不惜流血牺牲，求得“民彝政治”的精神；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

最后他严正指出：“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只有这样“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

中旬 大钊同志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未等卒業即回到上海，参加反袁斗争。（参见5月10日、19日《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大钊同志抵上海后，曾写信给在东京的朋友，谈及他在沪的近况。信中说：

“……弟抵沪以来劳于酬应，未能裁笺候阅，殊以为歉。此间自溥泉公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非浅显也。昨济公接川陈二厂电，云川决于箇日（廿一）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传闻袁氏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仍非出于一战不可也。综述近况，以慰远怀。”

19日 在上海泰安里寓所与白坚武叙谈，同寓者李凝修、宋仲彬。此后22日、25日、26日、27日又与白坚武多次畅谈及出访。（《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1日参加第一次研究会，到会者还有孙伯兰、白坚武、王法勤等十多人。24日参加研究会第二次会议，孙伯兰到会作政谈。31日参加第三次研究会。（《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6 月

6日 晚同白坚武等小酌宴宾楼，又赴丹桂观剧。阅《新闻报》悉袁世凯病故。（《白坚武日记》）

8—11日 曾同白坚武访王宗周、耿鹤生。11日晚同白观剧丹桂第一台，看黛玉葬花。（《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1日 同白坚武等议北归事。（《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9日 同白坚武、霍例白谈文学。（《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7 月

2日 同白坚武、霍例白寻访章行严未得其住所。

5日 介绍白坚武与章行严悟谈。（《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大钊同志应汤化龙、孙洪伊之约，答应去京创办《晨钟报》

11日 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离沪北上。

到京后不久，曾写诗一首——《寄霍例白》：

一轮舟共一轮月，  
万里人怀万里愁。  
正是黯然回首处，  
春申江上独登楼。

## 8 月

1日、3日、13日 同白坚武访王立哉、张溥泉，访孙伯兰，谈某项教育。

15日 经大钊同志一个多月紧张准备,《晨钟报》创刊,他任总编。

在北上的轮船上,他就给报纸想好了“晨钟”的名字。以“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来。他在报头印一古钟图案。每天在钟上刻一条警句。第六号上的警句就是大钊同志常常吟咏的名句:“铁肩担道义”。

在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文章申明办《晨钟报》的使命,在于唤起民族的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他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放在觉醒的中国青年身上。

“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他激励青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

又于同日发表《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他说:“西南义师之兴,呜咽叱咤,慷慨悲歌,此国民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吾民不避此辛苦,断头流血,以从之者,则亦吾民欲得自由之努力矣。”

17日 发表《第三》,署名守常。

20日 发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署名守常。

22日 发表《介绍哲人尼杰》,署名守常。

29日 发表《权》,署名守常。

30日 发表《政坛演说会之必要》、《达科儿之‘爱’观》,署名守常。

31日 发表《倍根之偶像说》,署名守常。

## 9月

1日 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青春》,署名李大

钊。这篇文章是于这年春天在日本写的。它代表了大钊同志这个期间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峰，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

他以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论述了宇宙的无限性和其变化。从绝对方面说，宇宙“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又进而指出：“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这就是说，在无限无极的物质存在中，万物万象各异，都在运动转化，都有其自己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他列举了生死、盛衰、阴阳、消长、盈虚、吉凶、祸福……这些宇宙间事物的矛盾对立后，又把人生和无限的宇宙结合起来；教育青年们要珍惜青春，努力争上“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骨肉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他鄙弃那种慕权逐利之徒，说他们“如蚁之就膻，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大钊同志希望青年人要“自觉”，“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要“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造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从大钊同志的战斗一生看，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

这篇文章，可以称为大钊同志“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宣言

书。正象吴玉章同志说的那样：“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3—6日 和白坚武等一起讨论白坚武提出的几个问题。并和白一起访问秦立庵。（《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3日 发表《奋斗之青年》，署名守常。文章叙述了十九世纪世界著名的美国纽约脱利宾新闻社长霍例士，青少年时代艰苦奋斗的事迹，以鼓舞我国青年。

本文题目后附以“（一）大新闻社长霍例士”。看来大钊同志原计划在《奋斗之青年》总题目下，准备逐一向中国青年介绍一些奋发有为的人，后因很快离开《晨钟报》，未能如愿。

4日 发表《新现象》、《别泪》，署名守常。

5日 发表《祝九月五日》，署名守常。

7日 在老便宜坊宴请白坚武、高一涵、秦立庵、田克苏，并商谈《宪法公言》主旨等。

又访何海秋未得其住寓，晚与白坚武访孙伯兰略谈。

今日移居皮库胡同。（《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9日 发表《李守常启事》，声明离开《晨钟报》。

大钊同志在《晨钟报》短短的二十二天里，共发表了十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欧洲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倡导反封建专制独裁，揭露了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致招来研究系政客们的不满和阻挠，使他难以继续工作下去，终于离开《晨钟报》。

办报期间，曾与同人在中央公园合影。（照片存北京历史博物馆）

9日 离京返里。（《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0日白坚武发信催大钊同志来京。27日，接大钊同志自家乡来信，定于阴历初五（十月一日）回京。（《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10月

1日 返京。晚白坚武到皮库胡同看望大钊同志，并一起去羊肉胡同孙宅。（《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同日 在《宪法公言》第一期上发表《国庆纪念》一文，署名李大钊。

此文是为纪念“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而作。文章主要说“宪法”来之不易，是不少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说：“宪法是自由的保证书，而须从国民之血铃印始生效力，法兰西、美利坚莫不如此。”“吾国自革政以还，黄花岗上七十二英魂之芳骨固已孕伏自由之胚苗，厥后辛亥之役，癸丑之役，乃至今兹西南之役，其间义烈踵殉，宁止千万，而后共和之华始克畅育苗发于血光之中”，今天，“吾亿兆国民此艰难缔造之第五国庆日，犹得欢欣鼓舞于此神圣议会制度之声中。”今日的国庆纪念，可作为吾宪法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8日 晚同高一涵等至白坚武住处长谈。（《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10日 午前同白坚武到羊肉胡同，与孙伯兰略谈某议员接洽事。午后又一起去中央公园游览。（《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0日 在《宪法公言》第二期发表《制定宪法之注意》一文，署名李大钊。

27日 又11月9日，两次同白坚武访张溥泉。（《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30日 午后至白坚武处，并同至光明殿西口看房。（《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11月

2日 与白坚武谈论人生问题。(《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10日 在《宪法公言》第四期上发表《省制与宪法》，署名李大钊。

21日、24日 同白坚武访王从周、孙伯兰等。(《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12月

1日 赴中央公园参加黄兴和蔡锷的追悼会。(《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4日 晚为“法政学会同学恳亲会”开办，同白坚武一起向孙伯兰请款。

6日 同白坚武访周国屏、齐隐斋、郁宪章，然后至林质生家小饭。(《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7日参加“法政同学恳亲会”于丰泰楼的聚会。(《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10日 秦立庵、田克苏约《宪法公言》编辑同人摄影于同生照象馆。

同日 在《宪法公言》第七期上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署名李大钊。

11日—16日同白坚武等赴津，参加法政学校毕业同学欢迎会。(《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5日云南首义纪念日。与白坚武访刘任夫于恒发店，又同至中央公园看纪念会。此会为政学会所包办。(《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1917年（二十九岁）

这年上半年，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请大钊同志和高一涵负责起草地方自治法规，经三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

“那时，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这怎么行呢？一个人的主张是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我们把各报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报》。”（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340页）

### 1月

10日 在《宪法公言》第九期上发表《矛盾生活之二重负担》，署名李大钊。

15日 参加法政学会会议，议决出季刊事。（《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1日 午后，与白坚武、高一涵往南下洼，顺城根至先农坛散步，又回新华街至前门，至西河沿西海居用饭之后，在东升平沐浴。（《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3日 春节，午后与白坚武至厂甸，买油画猫四张，赠白二张，又至法政学会俱乐部。（《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4日 午后，在朝阳门竹竿巷住处接待白坚武来访，同寓者高一涵亦在。（《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8日 《甲寅》日刊创刊于北京。发表《“甲寅”之新生命》，署名守常。

在东京时，大钊同志就和章士钊有过交往。这时又应章之约任该刊编辑，到五月底，主要从事这项工作，这期间在该刊共发表了七十篇文章，均署名守常。

同日 午后参加法政学会《言治》季刊编辑部同人预商会。（《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29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调和之美》，署名守常。

30日 发表《孔子与宪法》。

31日 午后，同白坚武等出齐化门，回至东安市场，在会英楼用饭。游散终日。同行的还有质生。（《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 2月

1—2日 发表《真理》、《真理（二）》。

大钊同志要人们相信真理，不要信孔子之道和释迦、耶稣的佛教耶教。“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权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

4日 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本文与上月30日发表的《孔子与宪法》，对国会把“孔子之道”列入宪法一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将此“护符”列入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

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

要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还必须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宣传科学真理。他深刻地注意到，孔子虽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但从二千多年的我国历史上看，孔子却是专制君主所资利用的护符，“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里，大钊同志对孔子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说，孔子在其所生存的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肯定了孔子和其学说，在那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但是历代封建君主，为了他们统治的利益，利用孔子的学说将其偶像化，作为钳制愚弄人们的思想工具，则是另一回事。大钊同志反对的是后者，而不是笼统地反对孔子本人。他把历史上的孔子和后来被神化了的孔子作了区别。在批判孔孟之道的同时，又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给以恰当的评价。

又，在《甲寅》日刊发表《预定制宪期间案》，署名守常。

6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论收毁制钱宜有准备》，署名守常。同日（元宵节）并与白坚武、高一涵月夜漫步，畅谈国事。

（《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7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中国与中立国》，署名守常。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美决裂后，中国以“中立”自称，实则是“中而不立之中国”，“日俄战于满州，日德战于青岛”的事实，就是明证。“中立”是办不到的。

又，发表《回春之北京》。文章借今年春节小儿可以自由放爆竹一事，和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去年相比，说明“共和”比“专

制”好。去年“政象险恶”，“人怀戒惧”“大祸之来不知爆发于何时”今年不同了“此枯寂陈腐黯然阴霾之北京居然与勾萌甲圻蛰动昭苏之群生共呈回春之象焉。”

8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元宵痛史》，署名守常。大钊同志追忆“洪宪时代禁人说元宵二字，恶其发音与（袁消）相同也”。“曾几何时元宵二字昔曾禁人偶语，今则都成讖言，吾人可以自由享用于谈笑间，天复曩者之禁令矣。噫，是皆共和复活之所赐也。”

又，发表《日本之托尔斯泰热》。

9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署名守常。大钊同志就美总统宣布与德国断绝邦交一事，提请政府当局，对此不可不有所表示。他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海禁大辟，地土日削，国势日蹙，事事屈从列强的压力，“盖每出一事，无论彼屈我屈，一概由我称罪道歉，让人权利，赔人损失。行之既久，敷衍因循之习惯，遂成为第二天性，以为中国外交之政策，莫善于清静无为，任他列国相残，而我皆一视同仁，无偏，无觉、无德，无仇，庶几乎伏游岁月，不来意外之欺。而“今日世界潮流，风飏云卷”中国还要按过去的那样“与人无仇，与世无争”就是十分荒谬的了。

又，发表《我国外交之曙光》。

10日 与高一涵到白坚武处谈时局。（《白坚武日记》第一册）

同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黄金累累之日本》，署名守常。此文分析了日本黄金激增的原因。欧战前日本“现为之正货不过三亿四千万，今则滔滔滚滚，日益激增，已达于七亿之多，计每月平均纯增约二千三百万元，即一年约增三亿元……多金哉日本也。”

又，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文章说：“北京之生活，以人力

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也。”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是：“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道衢，尤胜转死于沟洫。京中人力车夫之所由日多者，乃概为救死问题。其他人道经济之说皆救死以后之事也。”文章还强调提出，在目前尚不能根本改变此种状况的时候，希望政府干涉车主，为人力车夫改善一些劳动条件，如风尘大时备口罩，冬时备手套，夏时备雨衣雨帽等，使那些“奔走劳瘁之车夫，稍受涓埃之保护，或足以聊慰其不平之情乎。”

这篇不长的文章，不仅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且倾注了对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

11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今后国民之责任》，署名守常。这是一篇时评，主要讲对外政策问题。“我国的外交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外交之制胜不在以其实力与德为敌，而在以其诚心与协商国中立国为友。此则吾国决定大计之唯一方针。”

又，发表《威尔逊与平和》，署名守常。这是大钊同志就美国威尔逊竞选总统所发的平和演说作的时评。

12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中德绝交后应注意西北》，署名守常。

1917年，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盗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这年春，北洋政府“对德通牒已交付德国”大钊同志预料到“德国若不与吾以满足之回答，则中德邦交必将断绝。”（后来果如此）那么中德一旦绝交，政府应注意什么呢？他提醒政府“所当注意者以西北为最要”。这是因为：我新疆、青海一带多是回族同胞的集居地，那里交通阻塞，于世界大势不易得明确消息；土耳其与德国为同盟国，“而以宗教之关系与吾国境内之回民有所联络，苟土以吾绝德之故而迁怒于吾，则必出其诡计以煽吾回疆。”他提请政府宜采取必要措施。大钊同志对于时局的深切关注于此可

见。

13日 晚，同白坚武等赴广德楼观剧。（《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14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战争与铜》，署名守常。

又，发表《德皇之欺世论》。借介绍日人木通口丽阳氏《日独握手论》一书的出版，提请国人读读这本书，警惕德皇威廉二世“欺世惑人”之说，注意时局的动向。

又，发表《爱国艺术家罗丹病笃》。介绍法国爱国艺术家罗丹的生平，表以悼念之情。

15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学会与政党》，署名守常。揭露有些政党，假借“学社、学会”的名义，竞相建立，“学会”成了“政党之假面”。

16日 发表《诗人达阿儿之行踪》。叙述诗人达阿儿游历世界的情形。

17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署名守常。这是一篇社论，认为“对德抗议之举，既已成为国家的行动”那就是一个“关系国家存亡之外交问题”了，他劝戒国人“不可资以为攻诘政府之柄”，更不要以此外交问题作为向政府“攘权之武器”。

又，发表《外交研究会》。申明“外交研究会”成立的宗旨和目的。

18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北美之风云儿》，署名守常。

介绍美前总统罗斯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德绝交后，表示要率其四子从军。这一消息使全美人为之大震。

19日 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署名守常。

21日 晚，同白坚武、张泽民访张新吾。（《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同日 发表《一致与民望》。

这是大钊同志在中德关系绝交前夕，“当此外交吃紧之际”吁请政府和国民要有对外一致之精神，万不可因此招致治政上的纷争，勿“着眼于政党”的攘权，要“注重于民望”的对外一致。

又，发表《极东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原是美国为抵制欧洲各国插手美洲而提出的外交方针。

“极东门罗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针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提出的。文章警告“极东门罗主义”宣传者，当“熟思”“审虑”提出这一宣言的后果。

22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议会之言论》，署名守常。

23日 同白坚武、克苏、质生、子超赴陶然亭散步、休息。

21—24日 连续发表《哭沈汉卿君》，介绍沈汉卿的生平事迹。

25日 发表《政论家与政治家（一）》

文章认为社会事业不外两途，即精神的方面和实际的方面。精神方面如哲学家、政论家……实际方面如政治家、实业家等等。然而不论做什么工作，要作得有价值，有意义，皆在其人。在其人是否充分发挥其天能，是否努力，他把这看作是“立宪国民之天职也。”

28日 发表《蔷薇缘欤？蔷薇恨欤？》

### 3月

2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政论家与政治家（二）》署名守常。

5日 发表《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问题》，对中德绝交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估略性的意见。

7日 发表《爱国之反对党》。大钊同志担心，中德断交会引



起国内政局的纷乱。他介绍英国“反对党”“之用于国也，固非在以攻击政府为能事，实立于援助扶持之地位，以为之辅佐者……”他进而要求北洋政府总统、总理以国家体面为重，速谋转圜之道，而利于外交之进行，免误事机。在野各政团亦宜以诚恳态度挽回此紊弊凌乱之时局，幸勿借题发挥，施其挑拨之伎俩，以图乘时攘权为快，则国家不幸中之幸……。”

8日 同白坚武访张树之，送别未遇，遂至东安市场掷地球。（《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11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立宪国民之修养》，署名守常。文章指出，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一入立宪之国”在下级国民中“亦知互相敬爱，斗殴争吵之声殊所罕闻”至于中流以上社会更应有“绅士之风度，其举措之不出法律范围之外”。

文章分析国人“受病之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尚情面不尚理也”；第二，“凡事好以腕力而争”，不依法律。特别是那些“位在军枢者”稍不如意，动辄以腔力从事，甚或“生杀予夺”。认为这是专制政治的余毒。要医治这些问题“惟在上流社会以身作则，而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来相劝勉”，依什么来修养呢？他提出：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均以此慢慎，上下都这样做，就会杜绝欧美那种“议场挥拳，白宫斗口之象”。

14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三），署名守常。

17日 早，在东城竹竿巷寓所接待白坚武。（《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同日 发表《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九）》

19—21日 连续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文章叙述俄国

二月革命的梗概。

21日 午后，同白坚武访何海秋。晚，又同访张新吾。（《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24日 发表《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25日 《白坚武日记》第二册载：“……午后同守常、泽民游公园，守常云：“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余甚以为然。……”。

同日 发表《面包与和平运动》。文章说：“交战国间之不能足食，大抵相去不远，和平之曙光，必将昭发于面包问题。果由是而能解旷古未有之战祸，吾人当为人类向面包而鸣其感谢，为之狂呼曰：‘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

27日 发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

29日 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论述俄国“二月革命”“其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

第一，认为“俄国革命之风云，即蓬勃于欧、亚连毗之城界，德国国民亦因之生绝大之觉悟。夫俄与德固世之行官僚政治最著之国也，今已不见容于其国民，然则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绝不许……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

第二，将“及于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他说：“吾国改建共和以来，国中犹有一部分人，对于共和政治深抱疑虑……。虽一再革命，国民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而此辈顽迷，终难使之觉悟。迩来复辟运动之说，虽属无根，然使国外政治之潮流，稍有倾向于‘官僚政治’之趋势，则此剪除未净之谬种，难保不附之以复萌。”他认为“俄人庄严璀璨之血”会“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至今亦可不尝试。苟尝试焉，必且撻国民之怒，抑之愈

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此则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又说：“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方案。

30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

这是针对日人和“今世列国”对于战争之错误观念而发的。他们认为战争是由人口过剩引起的。这种观点“根于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指出这是近世侵略家从马氏人口论中所找的口实。

大钊同志阐述了马氏人口论的要旨，指出了四点不完备之处，提出了引起战争的“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惟在被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销弥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他最后还附言：“余对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煞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

大钊同志由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看出了社会进化论有给侵略分子发动战争以口实的危险，这是他对社会进化论产生怀疑直至否定的思想转变的因素之一。

## 4月

1日 在《言治》季刊第一册上发表了《战争与人口（上）》署名李大钊。

又于同期发表《美与高》，署名李大钊。

蔡元培由巴黎归，来京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政学会欢迎会

中，演说欧洲战争，其中论述“美与高”一段，“尤为精辟”李大钊同志引了来。

蔡认为，一个国家的“美与高”民族性的形成，主要须有两个条件：“即境遇与教育是也”，“境遇属于自然，教育基于人为”二者缺一不可。“纵有其境遇，而无教育焉”，那么一个民族的天秉之灵能便不能得到发挥。“其特性必将湮没而不彰，久且沦丧以尽矣。”蔡着重分析了“吾之民族性于美与高今日果何有者？”从境遇上讲，我国山河壮丽，雄奇秀美，有肥沃的大平原，一泻千里的江河，众多的湖泊等；从历史上看，“文学美术名作辈出……长城连绵万里，至今犹为世所推称”。由此可知吾民赋有“美与高”的特性。那么，“以如此灵淑之山川，雄浑之气象，栖息其间之民族，当必受自然之影响，“美与高”当兼而有之的，为什么今天都“湮没不彰”呢？“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此江山耳。”蔡号召、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要深思这一问题，为吾民族的“美与高”而努力。

又，发表《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

又，于《言治》季刊第一册发表诗两首，“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前意未尽更赋一律”，署名李大钊。

又，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青年与老人》，署名李大钊。

1—2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最近奥国改变之颠末》

3—5日 发表《学生问题》与《学生问题（二）》。

7日 发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8日 发表《讲演会之必要》。

该文是为“神州学会”第一次特别讲演大会所作。陈独秀亦曾到会作题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之演说。

12日 发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16日 发表《大战中之民主主义》。文章介绍了民主主义在欧

洲和全世界，已经成为有滔天之势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形势。

17日 发表《真理之权威》。

他认为我们应当从客观实际出发去寻求真理，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求其真实之境”。“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他把追求真理看成是“人生最高之理想”他强调要敢于坚持真理和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不要因社会的非议而放弃或背逆真理。文章有一段至理名言：

“言论之挟有真理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感世之弊乃无穷焉。”

18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署名守常。

这是针对日本《中央公论》四月号所发《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而写的评论。大钊同志指出：谈“亚细亚主义”决不能抛开中国。“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之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他进而指出“日本国民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维护世界真正之道义，保障世界确实之和平！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于嫁祸全亚洲之同胞，则其唱大亚

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护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他在文中还激励国人，要“创造新文明，改造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他声称：我们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就是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吾人非欲对于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即势力之所许，亦非吾人理想之所容。”

19日 发表《不自由之悲剧》。

20日 发表《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就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因受贿案被黎元洪免职事所发的评论。

评论之一说：从财政当局的“受贿案”中，可看出共和立宪政治比君主专制政治要好。

评论之二是针对“受贿案”所涉及的两个“新人物”而引起的“新旧之争”发表意见。对所谓新旧人物作了具体分析，而后指出：“于今朝此后用人之准，仍以新者为宜，使不幸而作恶，国法俱在，舆论莫容，乃善恶之判，非新旧之争也。”

评论之三，驳斥了“世尝谓一国之政治、社会、风纪、道德经由革命一次即堕落一次”的说法。大钊同志认为：“革命屡兴之国，必为群治腐败之国，是其道德之堕落，不在革命勃发之日，而在专制积弊之时，革命之屡兴，正为罪恶积重之结果。”

21日 发表《罪恶与忏悔》。

22日 发表《简易生活之必要》。

大钊同志提倡人生应过简易生活，指出今日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过度”。衣食享受过度，戚友酬应过度，物质消耗过度，精神劳役过度等。“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解救的办法，惟有提倡简易生活。这样，“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仰俯天地之间，全无所愧作

也。”

23日 发表《中心势力创造论》。

这是大钊同志为《甲寅》日刊所写的社论。论述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才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就会“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指出，我国因无中心势力，故而分裂、散乱、难以统一。

24—25日 5月2日、5日发表《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

文章主要叙述和介绍了俄国革命爆发后欧洲各社会党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拥护战争，支持战争到反对战争，发动和平运动，提出为和平、自由、面包的口号。这个运动对俄国革命是一种支援，对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热烈地歌颂二月革命中高举赤旗的社会民主工党。关于德国，他突出地介绍了李卜克内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李卜克内西反对德国反动政府战争预算的理由书，德国的报刊被禁止刊载，大钊同志从英、日书刊中搜集资料，终于节译和引用了这个文件，着重介绍其中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人民求解放的问题。他赞扬李卜克内西和追随他的同志“为生平所持之主义”，“冒极酷之压迫”而不屈，英勇地“为一己之理想奋战”。

26日 发表《川局罪言》。主要评论川局“罗刘交哄，惨罹兵火”的罪责在谁。

29日 发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 5月

4日 《白坚武日记》第二册载：“……守常明日回里看细君病，约代为《甲寅》日刊作文，意绪纷冗，恐不能如愿也。”

5日 离京返里。他在《旅行日记》（载《甲寅》日刊9—11

日)中写道:

“昨晚八时三十五分离京乘京奉车返里。”“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军失败之地，白亚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比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如缀锦，更无何等遗迹可凭吊者，他日崇德记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象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正驰想间，曙光一线，滦州城已映入余之眼帘，更联想忆及辛亥之役，张绍曾将军拥一师之劲旅，虎踞此处，与关绥卿、兰天蔚二将军谋反取燕京……”

6日 晨抵昌黎。下车投大德增客栈，八时许雇骡车入碣石山。先至隐仙庵，遍览祠观神堂，又攀至韩文公祠，受到刘克顺老夫妇的接待，下午二时返大德增栈。看到冀东一带商人携眷去东北，大钊同志问明情况后很高兴，“国人多一个定居东省者，即日本人少一个侵入东省者。”“明晨南归，尚有陆路八十里，余容续陈。”

7日 返抵乐亭老家。

9—11日 在《甲寅》日刊发表《旅行日记》。

21日 发表《自由与胜利》。

23日 自乐亭寄信一封，载28、29日《甲寅》日刊，题为《乐亭通讯》。

信中说：“……吾友容君伯哥尝为余言，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以余之所经验者证之，诚为不谬。民国创建，吾侪以为数千年帝制由兹推倒不能复萌矣，而乡间父老独以为未安，谓不久将有皇帝出现，真主出现也，无何袁氏果称皇帝……”。

又说：“乡间大旱，麦苗均渐枯槁，面粉价陡涨……”。

30日 《白坚武日记》第二册载：“……守常久不来，殊形寂寞，恶耗频至，以国为殉，稽今政象，直有类于首长之屯据报



复，如斯之困，乃以民政闻无根本之洗伐，国人不知死所矣。”

## 6月

22日 自家乡返京。在家住了一个多月，与在京之白坚武常有书信来往。（《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25日 去天津访白坚武。第二天同白坚武一起访张溥泉。（《白坚武日记》第二册）

同日 《甲寅》日刊载《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教务长易人》的消息，系编者采访的，没有署名。文中流露了大钊同志对法政学校盛衰变化的感慨和对校长及教务长易人所寄予的期望。

## 7月

1日 张勋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大钊同志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他给友人革痴的信中谈及到沪后的情况：

“国变日别后，仓皇出京，未及走辞为歉！”

“南来栖迟沪滨，百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飘泊旅馆，暇时惟以读书自遣，尚足告慰耳。”

“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弱，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拒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拒者，盖无闻焉矣。前日不自禁，偶为《太平洋》作文一首，既而思之，又自深悔！以今日人之沉溺于利欲，逆耳之言，庸何能入？且以吾侪年轻性率，修养未充，诚信中孚，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诲人，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

.....

“海上无何机会。行严先生已赴日本。尊著与商务交涉事或可磋商，容日致函行严，如何再复。

匆匆不尽欲白

弟钊顿首”

（文操：《大钊同志五四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1957年4月29日《文汇报》）

12日 张勋复辟丑剧失败，段祺瑞再次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大权。

## 8月

6日 《白坚武日记》第三册载：收到守常信一封并诗一首。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此诗，后来载入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三册上。诗有序：“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偶沪上。惶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15日 在《太平洋》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辟伪调和》，署名守常。

本月间和白坚武有八次书信往来。（《白坚武日记》第三册）

## 9月

据《白坚武日记》第三册载：本月他们有四次书信来往，还为白

坚武订《太平洋》杂志。

11日 《白坚武日记》第三册载：

“接守常一函，介绍姚君祖义，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只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夜寐兴所构求之好消息，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可谓伤心见到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 10月

15日 在《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上发表《暴力与政治》，署名守常。

又，发表《此日》，署名L、S、C。

他说：“今日又为民国六年之国庆日矣。仆于此日，淹滞沪滨，散步江头，百感交集。……但一回溯此六年中，风尘瀕洞，戎马仓皇，此万众欢呼之国庆日，殆皆于风鹤中度之。吾民丁兹新旧嬗更之交，喘息未安，惊魂又丧，流离转徙，思痛抑且未遑，庸能忭欣鼓舞从容逸乐以为庆祝。此以知新生命诞生之难，而国民所以为之努力者，益不容稍息也矣。”又说：“仆尝论之，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他举了美国、法国和俄国“二月革命”的例子，告诫人们说：“此则国庆日者，乃新中华诞生之纪念日，非新中华长成之纪念日；乃吾民开始努力之纪念日，非吾民太平歌舞之纪念日；乃吾民勇牺牲之足庆，非吾民臻于安乐之足庆也。”

18日 赴宁（南京），住华洋旅馆，访白坚武，尽情交谈。

第二天又在这里接待白坚武。（《白坚武日记》第四册）

21日 与白坚武等赴金陵大学观看游艺会，“六师武技练习甚有可观。”

白坚武陪同见江苏督军李纯，接洽赴日事件。

与白坚武等八人郊游。（《白坚武日记》第四册）

22日 《白坚武日记》第四册载：“午刻留守常、新吾、何君饭。……督军请守常先回沪候行，送路仪百元。”

23日 与白坚武等游莫愁湖并观粤军烈士纪念碑，归途游胡园。（《白坚武日记》第四册）

下旬 返回上海。

## 11月

6日 据《白坚武日记》第四册载：守常寄来《太平洋》杂志一册。

9日 自沪赴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白坚武日记》第四册）

10日 在白坚武处午饭，午后在太平巷陈寓接待白坚武，又同至督署晚饭，准备北行。白坚武赠诗以敦其志：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白坚武日记》第四册）

11日 离宁北上。《白坚武日记》第四册载：“早赴华洋旅馆访守常，又同赴文德里访崔叔和、高质生。雨送守常北行到下关，路遇徐襄平，小聚瀛洲旅馆在宝记照象馆同摄一影，晚小饮致美楼。”

本月7日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 12月

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

## 1918年（三十岁）

### 1月

本月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

20日 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该会讲修养，尚进德，制订了禁弊条文，监督会员执行，如“不嫖、不赌、不娶妾”等。（《北大日刊》1月19、20日）

24日 发“图书馆主任告白”。内容：（一）向陶孟和先生表示志谢（他交来天津博物院陈列说明书）；（二）介绍天津博物院所藏图书的情况，请研究博物学的同人“往观”。（《北大日刊》1月24日）

本年1月 《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加到编辑部中。

大约这时与鲁迅先生相识。据鲁迅后来回忆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 2月

18日 和李辛白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并刊登启事与简章。“启事”说：

“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商清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附设一夜班于本校，业经校长认可，凡本校同人所介绍者均可入班。愿学者请至斋务课报名，以便克期开课。”（《北大日刊》2月18日）

据《白坚武日记》第五册记载，本月中，与白坚武有五次书信往来。

## 3月

1日 发《图书馆主任告白》。内容为：一是有关借阅化学书籍的规定；二是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了互相借阅书籍的规则；三是宣布“有愿将私有图书寄存本馆”供阅览的简章数条。（《北大日刊》）

4日 在《北大日刊》上发表《通信》。

“记者足下，友人张君国威原名国宾，富有牺牲，尝留学日本，习陆军，一日游‘游就馆’（在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中陈甲午、庚子两役，由吾国虏获之物品甚多）见而大愤，挥拳击毁之，为日人所捕，某公使敬其忠勇，为更名国威，仍令留学。辛亥事起，张君归沪，都率义军，厥功颇伟。民国建立后，复返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习矿科。卒业归国赴粤开矿，以诸多阻碍不克用其学，乃于去岁应沪上赴法华工之招，刻已抵法国矣。兹得其由法来函述华工状况颇详。特将原函录呈概要，请登入日刊，以

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介绍。余不白。

李大钊”

5日 《白坚武日记》第六册载：

“守常来函，云日本此次出兵，纯为干涉俄国民主政治，非防德，一面动摇吾之国体，裨为其保护国，以行其大亚细亚主义。一面扶助俄国王党重建帝制，然后与德和。而日、俄、德同盟之说或将实现云云，可谓见微。”

10日、11日、12日、18日 和白坚武有书信往来。11日，还记有何文册托守常转寄十余册梁漱溟近著的事。（《白坚武日记》第六册）

19—20日 《北大日刊》发表署名李大钊来信，报告他于15日，偕图书馆职员章君、邓君、盛君、商君等赴清华大学参观的情况。

## 4月

1日 发“图书馆布告”示知改定的开馆时间。（《北大日刊》4月1日）

11日、15日发“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共十四条。（《北大日刊》11日、15日）

14日 《白坚武日记》第六册载：“星期，守常来函，意绪殊恶劣，不胜家国之感。余前戏言，吾等无负于国家，国家殊负我等，惟向国家讨债云云，守常复言，国陷破产，债无处讨矣，以今象稽之，不能避也。”

15日 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今》。文章强调“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损‘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为后

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于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大钊同志告诫人们：“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我们要‘爱今’、‘惜今’，不要‘乐今’、‘厌今’。指出‘厌今’是‘复古倒退’；‘乐今’是‘不求进取’、‘安乐优游，没志向，没抱负’。”

18日 在《政法学报》第二期上发表《强力》(致高元君)，署名守常。

24日—27日和白坚武有四次书信来往，议时局，并赠《新青年》一册。

## 5月

15日 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新的！旧的！》署名李大钊。

本文以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他列举了种种新旧相杂的事，针砭时弊——建立了民国，但仍有清室；制定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但却又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力禁重婚，但又许纳妾等等。

这一切是为什么？“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要改变这种“矛盾生活”，“分立对抗的生活”，他把希望寄于青年人身上，他说：“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这就是他的号召。但是这种“新



径路”，“新生活”，大钊同志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来，只是在他认真探讨和研究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经验之后，才找到了一条真正的救国之路。

24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编目室启事》，其中提到大钊同志捐赠图书——“‘学艺’第三期一本”。

28日《北大日刊》载，斋务课报告“捐助校役书费清单”，其中“李大钊先生捐票银叁元。”

## 6月

3日《北大日刊》载：“进德会”报告评议员和纠察员当选名单。大钊同志当选为该会纠察员。

5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告白”。

同日下午二时，在北大文科第一教室参加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会议，他有两项提议：

“（一）改会名为‘有不为会’，讨论结果赞成者少数，又以仍用旧名付表决，赞成者多数。

“（二）又以纠察员之职任与其职任之履行颇不易做到，提议废除纠察员之名。座中讨论时有提议以被举之纠察员改为评议员者，以举手表决之，赞成者大多数作为通过。”

此次讨论会还“议定本会刊行杂志一种，大约每季一出，定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当即推定编辑四人：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康白情。”（《北大日刊》7月4日）

30日“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大钊同志为发起人之一，会议决定设立临时编译部，推举大钊同志为主任。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说，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本月和白坚武有五次书信来往。寄给白坚武《新青年》一册。白坚武寄给他《神州学丛》一本。

## 7月

1日 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七篇文章。

《调和誉言》，署名守常。这是他用哲理来探讨人生和社会的文章。他指出：“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

《调和之法则》，署名李大钊。作于1917年春，曾寄登在日本东京出版之《神州学丛》。

本文提出“言调和者”须知之三大法则：

(一) 须知调和之机虽启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

(二) 须知新旧之性质本非绝异也……；

(三) 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调和之德也，夫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署名李大钊。他认为东西文明根本不同之点，在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

《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署名李大钊。是对《太平洋》杂志一文的答辩。

《胡适“美国的妇人”跋》，署名守常。这是对胡适“美国的妇人”这篇演讲词(在女师讲)所加的跋语。他认为在《言治》季刊发表这篇演讲词：第一，可以扩充通俗文学的范围；第二，可以引起国人对于世界妇人运动的兴味；第三，可以为本志开一名家讲坛的先例……。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署名李大钊。这是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十月革命的论文。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一革命的历史意义。他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还针对当时的混乱报道，告诉中国人民勿为“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雪地冰天两少年》，署名剑影。

4日 午后3时，在北大校长室参加进德会会议，讨论会章中八条戒律问题。6日，进德会公布了这八条戒约：不嫖、不赌、不纳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北大日刊》7月4日）

9日 下午应约参加本校编译会茶话会，欢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先生，并参与商定蔡校长和李石曾提出的创办“世界图书馆”事。（《北大日刊》8月17日）

15日 在《太平洋》第一卷第十号上发表《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署名守常。

30日 北大进德会启事第七号，公布了改定的戒约办法和遵守戒约的人，其中有李大钊。（《北大日刊》7月30日）

同日 介绍黄开山过宁，与白坚武会谈。本月和白坚武有四次书信往来。白曾寄给他“葫芦行”白话诗一首。（《白坚武日记》第七册）

## 8月

暑期返里。

8日 《北大日刊》载殷汝耕7月24日自日本寄给大钊同志的一封长信，回答了图书编目及购置保管书籍之办法等事。

19日《白坚武日记》载：“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为记之”。

三首“山中即景”诗是：

(一) 自然的美 美的自然

绝无人处 流水空山

(二) 人在白云中 云在青山外

云飞人自还 依旧青山在

(三) 一年一度果树红

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

忆否春雨梨花白

前两首经修改刊载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

这天的日记中还有《悲犬》诗一首：

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

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

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

本月和白坚武有五次书信往来。寄《新青年》一册给白。

## 9月

10日 发“图书馆主任告白”申明不外借贵重书和虽属普通书但“版次不同者，亦只出借其旧版”的理由。（《北大日刊》9月10日）

14日 发“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各职员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

25日 午后3时，在校长室参加编译处会议，到会者还有陈独秀等共十三人。（《北大日刊》9月27日）

本月19日，毛泽东为了组织和促进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带领一批湖南青年第一次到北京。

## 10月

本月 图书馆迁往新址——北京沙滩大街路北（现在的五四大街西端）的那座四层的红砖大楼即北大第一院。红楼的第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分为二十一个书库，六个阅览室。都是经大钊同志亲手安排的。东南角上一连两间的房间，为图书馆主任室。外间作会议室，内间作主任室。

3—5日 《北大日刊》连载大钊同志送来的歌谣三首：

一、瘦马拉搭棚，糠饭秕子活。

附注：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工活，亦秕子之类也。

二、春鲞秋鱮，白眼割谷。

附注：乐亭滨海产鱼。鲞、鱮、白眼皆鱼名。春时最肥美者为鲞，秋时为鱮，割谷时则为白眼。

三、不剔辫子没法混，剔了辫子怕张顺。

附注：入民国来，乡间盛传此谣，张顺殆张勋之讹。剔字当是剃字之音转。

14日 《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从14日起，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办公。

16日 《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

“本馆第一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二十九号室。专备阅览中外杂志之用，现已布置完竣，由十六日起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启室办公，晚间暂停，此告”

20日 《国民》杂志社成立。大钊同志应邀担任该社的指导，并经常给《国民》杂志撰写文章。（许德珩《五四前的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

22日 《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通告自即日起，一概在新舍办公事。

26日 《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告白》。告知本馆第二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三十一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可随时入览。

本月 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毛泽东来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和大钊同志一起工作了四个多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埃德迦·斯诺谈话中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西行漫记》）

## 11月

13日 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图书馆主任告白》

冬 “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340页）

12月

8日 北京大学《新潮》杂志社成立，“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

该社“敦请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为顾问，所有本志印刷、登广告、发行及其他银钱出入事项，即由两主任分派出版部杂务课、会计课、事务员执行之。”（《北大日刊》）

6日 《北大日刊》上载《庶民的胜利》，并标明“李大钊主任在中央公园之演说”。

不久，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这两篇论文，是大钊同志在当时所谓欧战胜利的庆祝中作的，提出和解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欧战结束究竟是什么人的胜利。指出欧战的结束并不是协约国的胜利，我国军阀更不必以战胜国自居，欧战的结束，是十月革命的结果，是“庶民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他在讲演中说：“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们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

这样战胜。”

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又说，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陀罗慈基（托洛茨基）郭冷苔（俄国Bolshevik政府里的一个救济部总长）的功业；是列卜涅西·夏蝶曼的功业；是马客士（马克思）的功业。”

大钊同志预言，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统统都要被摧毁、扫除，“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号召中国人民要向十月革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

这两篇文章表明，大钊同志在这个时期，已经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而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同日《北大日刊》又载“图书馆编目室启事”：

“顷承

本馆李主任捐赠本馆：

今井博士建国后第一册

国耻之一 一册

民彝第三号 一册

言治第二号 一册”

22日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每周评论》创刊。该刊可称是《新青年》的姊妹刊。《新青年》每月一期，主要刊登长篇论著。《每周评论》每周一期，侧重时评，刊载多是短文，反映国内外形势比较迅速及时。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

大钊同志为创办《每周评论》不惜辛劳。曾参与创刊的张申



府回忆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号编好，当夜就由李大钊与我，同到宣外大街印刷地点（即北京《晨报》所在地）从事校对，直到深夜四点，校完印好，二人各携一张，欢喜地走回宣内西单西各人的寓所……。”尔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五十五篇文章。

在《每周评论》上大钊同志不断地对重大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在这个刊物上用的笔名是“常”、“守常”、“明明”、“冥冥”等。

23日 《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申明借书要及时归还事。

27日 白坚武收到大钊同志信一件、《每周评论》一册。（《白坚武日记》第八册）

本月 写了《跋〈国体与青年〉》一文。发表在1919年1月16日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第一种《国体与青年》上。书的作者曾琦，把“共和”当作“世界最良之国体”，号召青年为此而奋斗。所谓最良之“国体”，实际上是一个旧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大钊同志针对曾琦的上述说教，写了这篇“跋”文。

他告诫青年，不要把民主仅仅当作自己一国的事。他说：“我们拥护民主，不是单管国内的事，不管国外的事，就能成功。必要把世界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民主作世界的民主的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还指出：“我们要求民主，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须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他把“世界大同”当作青年的最终奋斗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但是，在目前“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因而“我们民主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即便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民主若已获

得，紧接着社会主义”。这里明确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下一步是社会主义。这是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本年 还写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没有发表。

这是一篇最初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述俄国文学，特别是俄国诗歌与革命关系的文章。原稿中有“今请先论其诗歌”的话，这说明大钊同志原计划全面介绍俄罗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篇文章只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评述了从十九世纪到十月革命胜利这个时期的俄国诗人。从普希金起，到平民派大诗人涅克拉索夫，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赞扬了他们同情人民、反对暴君、献身社会革命运动的自我牺牲精神。文章还提到了高尔基。文章最后说：“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

1919年（三十一岁）

1月

1日 作《新纪元》一文，发表在1月5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号上，未署名。

文中指出，1919年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这是“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洗出的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

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本文表明，大钊同志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这个潮流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的东西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15日 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游艺大会筹备会保管字画部职员。（《北大日刊》1月17日）

19日 在《每周评论》第五号上发表《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面包问题》，署名明明。

前两篇文章都是说的自杀问题。当时，对自杀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是“壮烈的行为”，有人则认为是“罪恶的行为”。大钊同志说：“以我看来，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它的原因。”

在《面包问题》一文中，大钊同志指出了欧战后的日本人民“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贍，子弟不能教育”的贫困现状，说明日本的“政治问题”就是面包问题。

21日 北大游艺会以大钊同志为职员的“保管字画部”在《北大日刊》发表启事：

“本部此次请求闾京收藏家将所有精品送到游艺会场陈列，业蒙多数允许，届时必能汇为大欢，兹特再请

全校教职员同学将家藏古字画择优借下，本部当妥为保管，决不损坏，将来备有薄酬以答雅意，此启。”

同日 《北大日刊》发表“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纪闻”一

则，内称该协会于去年12月21日假本校文科事务室开成立会，大钊同志出席了这个成立会，并被推举为协会的中文书记。

22日 留由津来京的白坚武在家住宿至27日。这期间与白坚武谈论最近的局势并陪同访问各方朋友。在这之前的2日、9日、21日与白坚武有书信来往。（《白坚武日记》第九册）

25日 《北大日刊》刊登“学余俱乐部徵求会员启事”，大钊同志是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

同日 《学生游艺大会筹备会记事》称：游艺会为陈设京津收藏家之名画，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又于贵重室中，划出一间，以安置不交厂肆经手之品。

26日 在《每周评论》第六号上发表《政客》、《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情乎？》、《乡愿与大盗》、《放弃特殊地位》等文，署名明明。

在《过激乎？过情乎？》一文中，痛斥中国的反动派企图阻遏革命的洪流，诬蔑进步的举动为“过激”的胡言乱语。

《政客》和《国民仲裁》是讥讽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政客们，是一批“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的人。

《平民独裁政治》是在俄、德社会革命以后造出的一个新名词，大钊同志认为此言“是非逻辑的”，“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化为平民。”

《乡愿与大盗》一文开头就说：“中国一切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搞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放弃特殊地位》一文，就日本《万朝报》主张日本应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发表的随感。他劝告日本不要步德国的后尘，“就为日本自身计，也是放弃的好。”

27日 午后3时，参加学余俱乐部，在北池子盔头召开

的发起人会议，修正了学余俱乐部简章（《北大日刊》1月29日）

29日 《北大日刊》刊登了一则“马寅初启事”，公布了学校同人送胡适之母的聘仪费细表，其中大钊同志赠交票五元。

30日 发《图书馆主任布告》申明春节和游艺大会期间闭馆事。（《北大日刊》1月30日）

本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议只准中国代表二人出席。是日与会者为陆征祥、王正廷。21日，徐世昌正式委任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为出席巴黎和会全权委员。这次会议很快就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分赃会议的性质。

## 2月

1日 在《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署名李大钊。

本文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实际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他还明确指出要“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中国和亚洲，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结成大联合，从而“益进入类的幸福。”

明确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的方针和“帝国主义”的概念，在我国论坛上这还是第一次。当然他所提到的“世界联邦”等思想也还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却反映了他主张一切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朴素的理想。

同日在《新潮》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署名李大钊。

本文论述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的“联邦”，是今后各国及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人类如何打破种界、国界走向

世界大同提出了设想。

7日 帮助《晨报》付刊进行改组。改组后增加“自由论坛”及“译丛”两栏，以广泛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晨报》1月30日）

7—8日 在《晨报》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署名守常。

本文指出欧战后，由于俄国和德国的革命发端，接着蔓延于中欧，将来势必形成全世界的社会革命潮流。

14—15日 在《晨报》发表《劳动教育问题》，署名守常。

本文提出要关心劳动人民的“劳动教育问题。”他说：“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般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

15日 在《新青年》上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署名李大钊。

本文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问题的现状，提出了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既要打破“男子专断的社会”，又要从根本上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非把这个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男女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16日 在《每周评论》第九号上，发表《祝黎明会》，署名明明。

在日本曾有一个大正（1912—1926）德谟克拉西运动。这一运动的理论指导者，是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吉野作造。“黎明会”就是在他的影响下产生的。

吉野作造1906年—1909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教书，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大钊同志的老师。1918年11月吉野先生不畏

强暴，在两千多名学生和群众的支持下，与右翼军团主义团体“浪人会”进行公开辩论，影响颇大。此后，日本相继出现了“黎明会”、“新人会”等进步团体，形成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的高潮。

《每周评论》创刊后，曾赠吉野，并在第五期上载有吉野来函，希望彼此声援。第七、九两期又曾连续报导了吉野领导成立“黎明会”的情况。本文和同期发表的《黎明日本之曙光》(署名T、C生)就是专为此写的。

《黎明日本之曙光》一文指出：“黎明的曙光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希望两国人民握起手来，使“中国的黎明”和“日本的黎明”相互辉映，造成“东方黎明。”

(编者注：《黎明日本之曙光》是一篇“东京通信”，叙述了“黎明会”1月18日在日本神田青年会开第一次讲演会的情况，甚为详尽，作者似身临其会，故疑此篇非大钊同志所作，在此存疑，待进一步考证。)

同期的《每周评论》还发表《秘密外交》一文，署名明明。

文中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应该要求两国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密约在平和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里秘密作鬼……”

同期《每周评论》又发表《罪恶之守护者》，署名明明。

本文是借助日本学者永井柳太郎漫游中国所发的感想写的随感。

20—23日 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署名守常。

本文揭露了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村的野蛮统治，号召城市有知识的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到农村去，“同劳动阶级打成一气。”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

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这是青年的责任。”

21日 《北大日刊》第一版刊登了北大出版部代售各种书籍及杂志目录广告，其中有李大钊和张润之合著的《中国国际论》一书。

23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号上发表《死动》、《普通选举》两篇随感录，署名明明。

文中指出，“日本的浪人会，专去逆着世界大势作那拥护国体的运动”，“评家说他们是‘死动’不是活动”，“我想这种死动几乎遍中国都是。”

大钊同志指出，“到了今日，没有普遍选举，还称得起是个共和国么？”

约在这一期间，大钊同志曾有四封给李辛白的信件：

### (一)

辛白兄：

上海有位日本人佐原葛介君愿订《每周评论》，自第一号起长期续订，报费若干，开单寄去，他必照数汇来，他的住址开在下面：

上海虹口密勒路六号佐原葛介（殿）

弟 钊

### (二)

辛白吾兄先生：

郭梅仙寄来邮票三角奉上，乞即照寄。外有殷汝耕君住址一纸望收存。由第一号起按期赠报一份，以吾社拟请殷君任驻东京



通信员也

此颂

春禧

弟 判 二日

日本东京四谷区南寺町廿三番地井上寓殷汝耕。

(三)

辛白先生：

同文待印周报，木版尚未取来，昨日派人去取，彼未等回信。现在号房没有上街的人，今晚又非用不可，乞我兄设法差人到晨报去取，取到即交同文。

此问近安

弟 判

(四)

辛白吾兄先生：

乞检出第一号至第九号的《每周评论》二份，寄赠东四四条胡同张岱杉先生，以后按期续寄

此颂

刘安

弟 判

3月

2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一号上发表《光明与黑暗》，署名明明。

本文借用一位艺术家的话，把工农劳动大众的活动比作光明，把那些不劳而获的军阀、官僚称之为黑暗。

同期上又发表《过激派的引线》，署名冥冥。

文章指出“过激主义种子，实在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才生产的。既有这个种子，那社会上的一切不平、不安稳、不公道的事体，就是他的肥料。既加了肥料、又要他不生长，那可有点办不到。所以世界政府中的顽固党，都怕过激主义，但是都在那里培植过激主义。”

7日 在大钊同志的指导下，由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发表征集团员启事。（《北大日刊》3月7日）

9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二号上发表《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署名明明。

文中反映了唐山煤矿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连人世间的空气阳光都享受不到，“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更成为问题的是，那里约有八九千工人，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

《每周评论》于同期转载林纾反动小说《荆生》，同时刊载大钊同志针对《荆生》所写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署名守常。

大钊同志对林纾之流“顽固鬼祟”的行径予以有力抨击，他说：“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这时，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迅猛展开，针对封建卫道者的攻击，《每周评论》于十七、十九两号集中刊载“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

林纾对大钊同志的文章十分害怕和不满，曾专门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载3月18日《今言报》），其中的一段是：“全国父老以子弟托蔡，愿蔡留意以守常为是。”

10日 《北大日刊》载“新闻研究会启事”。

“本日晚七时半，本会敬请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在理科十六教室演讲。会员诸君务早到会为幸。”

14—16日 连续在《晨报》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署名守常。

本文继上月23日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之后，再次号召知识青年“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与劳动群众“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

16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三号上发表《强权主义》，署名明明。

文中指出，“东方的德意志军阀崇拜者又讲什么‘强权主义’，这恐怕又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相”。

同期又发表《小国主义》，署名明明。

同日 出席在北大理科第一教室召开的“学余俱乐部”成立大会，大钊同志被选为庶务干事。（《北大日刊》3月18日）

19日 在《北大日刊》上发表《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鄙人事忙，不胜庶务干事之任，乞另选，此颂公安。”

20日 《北大日刊》刊载李守常、陈独秀等人，为李辛白先生父丧捐赠赠仪的启事。

23日 五四时期重要社团之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正式成立。

其宗旨为：“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该团以讲演

做为宣传新思想主要方法，其活动范围最初局限于城内。自1920年4月起，团员开始赴工厂、农村进行讲演宣传活动，尤其在推动长辛店铁路工人活动方面，成绩卓著。邓中夏为该团发起人之一，并长期主持该团工作。讲演团至1925年底尚未停止活动。（参见《北大日刊》）

28日 在《晨报》上发表《现在与将来》，署名守常。

本文痛斥了那些丧失人性的军阀强盗，卖国官吏、时髦政客种种恶行，他们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只有“生活的现在”，“却没有真正人生的现在。”

## 4月

6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发表《统一癖》、《白人阀》、《混充牌号》，署名常。

前两文中，大钊同志指出：“中国人说到国家组织，最怕联邦妨害了统一；说到道德，最愿把孔子拿来定为国教，去统一人心。”真是无独有偶，“日本人也是常讲统一！真是东洋人的通癖了，可是中国人的威信统一，武力统一，已经把整个国家弄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

当时日本有人提出“要打破白人阀！”大钊同志认为：“首创‘打破白人阀’的黄人，必须先把自己在黄人中占的贵族地位抛弃，然后才有讲话的资格。”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野心。

《混充牌号》一文说：“世间有一种人物、主义或是货品流行，就有混充它的牌号的，纷纷四起。”文章进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打着“民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牌号，招摇撞骗，推行其侵略主义。

9日 《北大日刊》载《国吏编纂处启事》：

顷承…李大钊君惠赠：湘灾纪略一本；醴陵兵燹纪略一本。

13日 在《每周评论》十七号上，发表《解放后的人人》，署名常。

20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八号上，发表《宰猪场式的政治》，署名常。

文章指出，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黑暗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

同期上又发表《汽车与邮片》，署名常。

24日 复函白坚武“指陈当世政治太涉书生理想，终不能如彼之易耳。”（白坚武曾在16日写信给大钊同志“道近状并言和会之失望”（《白坚武日记》第九册）

27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九号上，发表《废娼问题》的社论，署名常。

大钊同志指出：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

他盼望中国主持正义的男子和那自觉的妇女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废娼”的大运动，并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本月 5日 北京政府为防止“俄过激内煽”，决定：“一由沿边各省区酌布戒严令；二商旅孔道设军警检查所；三外部暂停发内地汉、回赴新传教护照。”

上海军警联合会策划防止“过激派”办法，决定“严查轮站，禁止入境”。

7日 《晨报》报导，京学界开会讨论对俄问题，到会者有二十九校代表。

“自俄国劳农政府通牒我国表示退还俄国在中国所得之权利

后，北京学界异常欣喜，特于昨日召集临时会议”议决如下：

一、派北大、一中两校代表赴部探询此事之真相，如果劳农政府有此决心，应请外部向劳农政府表示亲善之意；

二、由北京学界全体具名致电劳农政府，请其从速实行退还，如该政府能完全实行退还之各项，即当表示中国国民对该政府有根本承认之意；

三、呈请政府速决定对俄方针。

## 5月

1日 在《晨报》付刊“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发表《五一节 MayDuy 杂感》，署名守常。

文中指出，这个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 (Direct Action) ——告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满怀喜悦地展望说：“直到世界同胞大家觉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的欢喜！”

2日 《北大日刊》载“徐宝璜启事”

内称：本校同人送马寅初先生太夫人之贻仪、李辛白先生封翁之贻仪，其中李大钊送现洋二元、票五元。

4日 为抗议巴黎和会蛮横决定承认日本掠夺我国在山东的权益，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游行示威运动。

大钊同志是这次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所指导的几个社团的骨干人物都是运动中的骨干，如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许德珩、罗章龙、张国焘、段锡朋、罗家伦等。当天，当大钊同志得知学生三十一人被捕后，作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与学生联合会一起营救被捕学生。

“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

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大钊同志》）

运动扩展到全国以后，各地代表纷纷赶到北京，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交流情况，确定斗争的目标和坚持斗争的办法。在斗争紧张的时刻，大钊同志连星期日也守在他的办公室里。同时还派遣学生骨干去各大城市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到了“六三”以后，运动进入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新阶段。（参见许德珩、罗章龙关于“五四”的回忆；贾芝：《李大钊战斗的一生》）

9日 早8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下令惩办爱国学生，遂以“奉职无状”辞职赴上海。

北大学生得知蔡校长辞职离京消息后，立即全体集合，议决致函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付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

同日 晚8时，北大教职员开全体会，议决举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等赴教育部，要求付增湘设法挽留蔡元培。

14日，徐世昌迫于形势，正式发布慰留蔡元培指令。

18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署名常。

本文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提出“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说：“强盗政府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巴黎和会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他进而指出：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曹、章、陆这些卖国贼，而是整个“强盗世界”，

我们要本着“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

26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上发表《黑暗的东方》、《太上政府》、《第五师军人》，署名常。

文章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特点：“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赞扬了近畿第五师军人胡龙舒等一万零八十名的通电：“除国贼，……御外侮……愿以铁血为后盾。”“象这种爱国自卫的精神，断断不可以拿干涉政治的话责备他们。”

29日 《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告以暑假临近，为清理图书停止借阅书报事。”

## 6月

1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四号上，发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社论，署名常。

这是一篇重要论文，开头就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大钊同志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

他说：“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它的原素仍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它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他认为：“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



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

他指出：“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

最后，大钊同志“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11日 在北京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个《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陈在散发《宣言》时被北洋政府逮捕。

《宣言》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五项：“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同时声明：“尚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等人，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24日 《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宣布暑期内图书馆的开闭馆时间。

29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上，发表六篇随感录。题目是：《牢狱的生活》、《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改造》、《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如何》，署名常。

他在这些短文中，激昂愤慨地说：“今天（二十八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前的哭声。”

他尖锐地嘲讽那阴一面阳一面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道：

“昨日（二十七日）巴黎的白宫宴会，法总统举觞祝贺威尔逊及各代表。我不知那位威先生在那庆祝伪和平的席上，如何下咽，感慨如何？”

本月 27 日 午后 2 时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北京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代表等共四百余人，前往新华门请愿。要求徐世昌认可三事：“不保留山东则和约决不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徐拒不出见。持至深夜，全体代表遂露宿门外。

28 日 天津代表亦加入。午前 10 时，徐始传代表十人入见。代表提出要求后，徐笑语含糊。陕西学生代表屈武愤而高呼：“同一亡国，不如不签。”徐竟叱之。屈武遂以头撞柱，流血昏厥。徐遽起入内。各代表被卫兵挟持而出。

同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举国人民严厉督责下，拒签对德和约。当日，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祖四人联名将拒签事电告徐世昌，并再次自请“开去差缺，一并交付惩戒。”

## 7 月

1 日 五四时期最大社团之一——“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筹备，在北京回回营陈宅宣告正式成立。总会设北京，另于会员较集中之南京、成都两地设立分会。会上根据大钊同志等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于成立当日，创刊《少年中国》月刊，作为该会机关刊物。大钊同志被举为编辑主任。（《少年中国》一卷一、二期）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 1918 年 6 月 30 日，到 1925 年底因社员发生分化而停止了活动。先后加入学会的有一百二十多

人，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尚德、刘天章、田汉等都曾是该会会员。

6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九号上，发表《赤色的世界》、《最危险的东西》、《光明权》、《我与世界》、《阶级竞争与互助》，署名守常。

《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根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告诉人们，阶级竞争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现在是处在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这个最后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一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就要到来了，“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

13日 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忠告黎明会》、《黑暗与光明》、《真正的解放》、《战栗》、《万恶之原》、《灰色的中国》、《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署名守常。

在《真正的解放》一文中，他写道：“真正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头上的铁锁……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

20—21日 离北京回故乡

行前收到《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这一期载有他写的《日本人听着》一文，署名守常。

同期还刊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大钊同志当晚8时乘火车，翌日清晨到达滦州。经滦州时又情不自禁地忆起滦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白亚雨等烈士。

在滦州雇一小舟顺滦河南下，黄昏后到达家乡。在家住两三日，带一个孩子由陆路来到昌黎五峰山，过昌黎站时又想起日本军队在这里无故惨杀五名中国铁路警察的事件，他认为这也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山是碣石山的一部分，离昌黎车站十余里。骡车行至山

下，然后扛着行李步行上山，正遇微雨，山景格外新鲜，走了约四里许到达韩公祠。大钊同志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左右，由看守祠宇的刘克顺老夫妇照顾他们的生活。（李大钊《五峰游记》载《新生活》第二、三期）

在五峰山，作诗三首，载9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三期。

《岭上的羊》一诗，描绘了攀援于云山雾岭之上的黑白羊群以及从天际传来的羔羊的“咩咩”的鸣叫声，寄予了对善良的弱小者的深切同情，蕴藉着对邪恶的强暴者和压迫者的斥责和仇恨。

《山峰》、《山中落雨》是作者耳闻目睹自然景色的艺术结晶，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热切关怀和血肉相联的深情厚意，也表现了他豁达的革命襟怀和坚贞的品格。

在五峰山上，写给法政学校的老同学郁癡的信中说：“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啜食之。泉之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奉午仰吸，倏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清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煞也。名山攀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函中，余不白。此致

宪章兄

弟钊顿首”

（此信载1959年版《李大钊诗文选》）

（编者注：从信中可看出，大钊同志还作一首长诗放在给天问（即郭厚庵，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的信中，现尚未觅得此信，此诗。）

## 8月

15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寄若愚、慕韩》，介绍他在五峰山的生活情况并邀他二人前来同游。原文是：

“若愚、慕韩两兄：

我到山中已将旬余，未能修函来告，实以交通不便之故（此间离城十里许，到京只须一二日，惟此十里许之交通甚缓）。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怀抱如楼，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何此一游？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车费三等乘现金四元余即足，到此生活甚简，弟可作主。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

弟 钊白”

大约也在此时，还有给小峰的诗一首，

“小峰弟正之：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来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李大钊”

（载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17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寄自五峰山。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割裂问题与主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打着所谓反对空谈主义，要研究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幌子，反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他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大钊同志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驳斥了胡适的观点。他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共同的运动。……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大钊同志公开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他针对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咒骂，进一步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大钊同志进而驳斥了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在一定的时期中，“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都解决了。”这就说明了革命的必要，从而否定了改良主义的道路。

大钊同志与胡适这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表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

下旬回到北京。

月底 《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 9月

11日 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图书馆主任告白。”

15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署名李大钊。

大钊同志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他再次号召青年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到农村去为创建“少年中国”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21日 应“觉悟社”邀请赴天津讲演，与周恩来等会见。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们邀请李大钊同志来‘觉悟社’指导，李大钊同志对于我们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出版《觉悟》非常赞许，并给了我们许多鼓励和指示，嘱咐我们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提议我们进行分类研究学术工作。”

（刘清扬《觉悟了的天津人民》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同日 在《新生活》第五期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署名孤松。

本文指出：新生活的创造必须要有新的政治和社会，这不是市民们单独能争得到的；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二十条“可以办到”和“应该要求”的条件，以排除这“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的北京市民生活。这些条件有市民对税关调查监督、废除租房要三个月押金的

习惯，多办图书馆，多设劳工教育机关、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院等。他为北京市民提出的这些要求，是意味着向反动统治的有力斗争。

25日 与蔡元培等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为北大朱蓬仙（宗莱）教授病逝，同人发起致送赙仪事。

28日 在《新生活》第六期上发表随感录四则、（署名孤松）谚语二首和白话诗——《欢迎仲甫出狱》（署名守常）。

《大笑话》，嘲讽政府怕“联合会”这几个字，所以图书馆联合会在教育部立案也被批驳。

《难兄难弟》，讽刺中日两国政府为防止过激思想而做的一些蠢事，真是难兄难弟的国家。

《赤色青色》，指出世上的军阀财阀怕“赤”，中国的官僚政府怕“青”。

《秘密……杀人》，记的是他上月下旬自五峰山下山时的所感。当时“瘟疫正在猖獗”，一路上“村里尽是哭声，村边都是新塚”而反动政府的官吏“都严守秘密”，听任人民的死亡。大钊同志质问当权的官吏：“瘟疫是自然的恶呢，还是人为的恶呢？很是一个疑问。要说是自然的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

《欢迎仲甫出狱》，大钊同志以欣喜的心情欢迎陈独秀出狱，以热情洋溢的诗句赞扬他“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并告诉他：“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谚语二首：（一）雁叫一声，穷汉子一惊。（二）高粱晒红米，鳞膀（鱼名）不给你。

本月 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至11月出版的第六卷第六号续登完）

这是一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论文。他首先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



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文章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他还指出：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是以其特有的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用以论证和阐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预言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起，最后又“根据这个预言，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

这篇长文，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好教材，影响很大。

大钊同志在我国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是相当困难的。当时他只能从日文和英文的马恩著作和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中了解马克思主义，而帝国主义者、军阀势力及其文人则百般攻击、歪曲，再加上人们思想上的各种曲解、附会，在这种条件下，大钊同志能够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把握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很不容易的。这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同月 经大钊同志等营救，陈独秀出狱，并写诗《欢迎独秀出狱》（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

## 10月

6日 在《新生活》第七期发表《新鲜名辞》、《圣人与皇

帝》和《黑暗运动》等三篇短文，均署名孤松。

《圣人与皇帝》，一文，指出：袁世凯坐皇帝和张勋复辟，都先大搞尊孔祭孔，“圣人”孔丘被用作野心家们复辟君主制的工具。

《黑暗运动》一文痛斥了那些复古派暗地里所搞的活动为“黑暗运动”。

同日 与马叙伦等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为庆祝双十节，举行本校教职员全体公宴事。

10日 在《新生活》第八期上发表《文治国庆》、《武装祭孔》、《面包运动》、三篇随感录，署名孤松。

《文治国庆》一文指出，“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的很苦”，好容易盼来了挂“文治主义”招牌的总统，以为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了祭孔，国庆不阅兵”，而已。

《面包运动》一文说：“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尽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

同期还刊登了《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一文，署名守常。

第八期《新生活》出版日，正值民国八周年国庆。而民国的国庆又叫双十节，这期封面就印了个连环式的双十字，这篇感想便由此而生。封面还印了博爱，自由、平等、牺牲八个字。大钊同志称之为四大精神，认为这是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也就是建立民国的基础。

同日 在大钊同志到工人中去的号召下，由北大学生发起，北京五千多大中学生捐款买了十七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等字样，把全市分成二十个区，每区一队学生，带着两大车面包，沿途分送给劳动者，同时散发了三十万张传单和进行演讲。（《新生活》第九期）

12日 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五

四运动”，不仅仅是“爱国运动”而且是“实现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并鼓舞人们说：“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

该演说词刊登在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二卷一号上，署名李大钊。

15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妇女号）上发表《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署名李大钊。

文章详细论述了妇女解放与民主的关系，大钊同志指出：“有了妇女的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因为：“第一，一个社会里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排出于社会生活之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民主的精神。”“第二，讲民主，应包括男女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民主，因此，两性之间的民主，比什么都要紧，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了。”

21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教务长，庶务主任，图书馆主任、仪器室主任参加评议会，但无表决权。（《北大日刊》10月23日）

26日 在《新生活》第十期发表《时代的落伍者》，署名孤松。

又发表《应考的遗传性》，署名孤松。

本文沉痛地指出：封建的“残酷制度”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一种不自然的弊病——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人们不能讲“发自我本心的话”，事事要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

又发表《双十与五四》、《东西村落生活的异点》，均署名孤松。

大钊同志以美国和中国的村落作比，找出三个异点：美国村落有图书馆、邮局、礼拜堂；我们家乡的村落有子曰铺、鸦片馆、庙宇。

28日 《北大日刊》刊登“图书馆主任布告”通知旁听生带证据来图书馆领取阅书证事。

## 11月

1日 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一首。

2日 《新生活》第十一期发表《时间浪费者》，署名孤松。文中指出，时间的浪费就是生命的牺牲。

又发表《妨害治安》。大钊同志质问当局：“到底谁妨害谁的‘治安’？”“我们大多数人的‘治安’并不太奢，并不过分，也只求个穿衣吃饭而已。”倒是反动政府打着“妨害治安”的幌子，剥夺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又发表《出卖官吏——蹂躏人格》、《死》、《寺内死了》、《掠夺物产的遗迹》，均署名孤松。

15日 《北大日刊》刊登“图书馆主任布告”：“近来发见数种杂志里的重要论文被人撕去，此类事惟有请阅书报者自重。”

16日 在《新生活》第十三期上发表《鼓吹共产主义》、《那里还有自由》，署名孤松。

文中痛斥反动当局借“鼓吹共产主义”的罪名封禁印刷物，他们的约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中国人民哪里还有自由！

又发表《圣裔的恤金》、《联人社会》，署名孤松。

18日 《北大日刊》刊登“图书馆布告”一则，告以增加阅览室、调整阅览地点。

19日 与蔡元培等在《晨报》上发表“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23日 在《新生活》第十四期发表《被裁的兵士》，署名孤松。

本文借裁兵问题揭露统治者招兵是为捞官、刮钱，一旦官到手、财发足、国库空，便又裁兵，但兵士的生活却从不过问。

又 发表《归国的工人》，署名孤松。文中提醒政府那些从海外归国的华工，怎样安插他们是一个大问题。

又 发表《一个自杀的青年》，署名孤松。

他以悲愤的心情喊出了：“社会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有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30日 在《新生活》第十五期发表《“五星联珠”、“文运大昌”》、《一心一德》、《用民政治》，均署名孤松。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文中说：“近日观象台有人报告说：‘五星联珠’的天象，主‘文运大昌’”，“他们并引据历史说，‘汉高入关时，五星聚东井’、‘宋艺祖开国，五星聚奎’的故事，来证明从明年起，要‘文运大昌’、国家富强”了。大钊同志在这里指出，他“担心着又有‘入关的汉高帝’、‘开国的宋艺祖’了。”而“我的担心，却又不是从‘天垂象’看出来的。前些日子，地上忽然铺了黄土，孔庙忽然开了大门，我就早有这个忧虑了！”

“用民政治”是山西阎锡山的“特别发明”，“在‘民治’的国家，有人出来要行‘用民政治’，这不但可以令人奇怪，并且觉着危险万分。”

同日 在郑伯奇写给孟寿椿的信中提及，他曾写信给大钊同志，“请他约些同志审定有价值的著作在报章上发表，使这班新进的青年，不要再入歧途。”并谈及大钊同志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长，他的朋友多是大学教授，办这件事是很容易的。（《少年中国》一卷十一期）

30日 在北京国立女高师参加李超女士追悼会并发表讲话。（《晨报》12月1日）

月末 在《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 12月

1日 在《新潮》第一卷第二号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署名李大钊。

大钊同志在本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回答了什么是道德，有没有万古不变的道德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他指出“道德是一种社会的本能”它必将适应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动而变动，因此“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变革。”这样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人们要求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又 发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署名守常。

2日 在《北大日刊》发表图书馆主任布告：本校学生如有要京师图书馆优待券者来本馆报名，以便汇齐函索。

4日 《北大日刊》发表图书馆征求五四前后各处定期出版物启事，指出：

“五四前后各处刊行之定期出版物骤然增加，为出版界开一新纪元，惜本馆所收甚少，且多苦于无从（缺字）本校同人或校外人士有以此类出版物慨捐本馆，俾供众览者，最所欢迎，如蒙随时代为搜集尤所感祷，敬告。”

7日 在《新生活》第十六期上发表《中日亲善》一文，署名守常。文中指出所谓“中日亲善”实则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这是针对当时发生的福建事变而作的。

又 发表《裤子》、《主义》署名孤松。

8日 在《批评》半月刊第四号上发表《欧文的传略和他的新村运动》，署名李大钊。详细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一生的

主要活动。

同日 《北大日刊》发表本校布告称：本校总务处经校长评议会通过之试行章程，委任委员六人，大钊同志为六委员之一。

11日 《北大日刊》消息，大钊同志委任为图书委员会委员。

12日 在《北大日刊》以图书馆主任名义发表布告：“阅览书报诸君，幸勿在各阅览室内吸食纸烟，以防火险并重公众卫生，此告。”

同日 在《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署名李大钊。

文章指出：“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另一方面又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排外主义”或“锁国主义”，对于“欧美的人民”我们并不排斥。“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对于一切愿意以平等的态度相处，“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兄弟。”他深信腐朽的帝国主义，终归要灭亡。

大钊同志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教育和鼓励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同日 参加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会上决定于15日各校全体停职，展开索薪斗争；并推举大钊同志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13日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讲演。发表在《平民教育》第十号，署名李守常。

14日 在《新生活》第十七期，发表《什么是歪史》，署名孤松。

本文揭穿总统下令说某人作的元史是“名山盛业”，“应列入正史”云云，是借政府的权力“以文饰文治的昌运”，这无异是“侵犯人民的著作自由权出版自由权。”

又 发表《禁止说话》，署名孤松。文章痛斥某督军禁止白话文，无异于禁止说话，这比秦政还要残暴。

21日 在《新生活》第十八期发表《互助》、《工读》(一)、《工读》(二),署名孤松。

在《工读》(一)(二)中,他引导人们要耕读作人,除工作外,还要学习,懂得作人的道理。介绍世界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工人们每天在八小时、六小时工作之外“还要读书”,“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28日 在《新生活》第十九期发表《物质和精神》,指出:教育家是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但却必须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这篇三言两语,是配合当时教育界的索薪斗争而作的。

又发表《生活神圣》,指出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是光明磊落地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常的事。

又发表《大联合》一文,大钊同志希望在“五四”、“六三”全国学生大联合和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大联合的基础上,盼望全国“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本期发表上述几文,均署名孤松。

本年 大钊同志给胡适一信,提出: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的革新奋斗,要仿照日本的“黎明会”,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一面走。

## 1920年(三十二岁)

### 1月

1日 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署名李大钊。



文章在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变动的决定作用后，作了如下的结论：“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象征。”“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又 在同期《新青年》上，与蔡元培、陈独秀等十七人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并向该团捐款十元。（《北大日刊》1月20日）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19年底，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工读主义团体。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偶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

4日 在《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发表《什么是新文学》署名李大钊。

文章指出，新文学必须扎根于深厚土壤。那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

壤、根基。

同日 在《星期评论》第三十一期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署名李大钊。

大钊同志把在美国产生的宗教新村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乌托邦派的学说，客观地介绍给当时的知识界。

同日 在《新生活》第二十一期上发表随感录三则，署名孤松。

在《又是一年》一文中，他勉励青年，不要做新时代的落伍者，要为“不断地创造新生活”而努力。

《忏悔的人》，称颂了忏悔的人——“从罪恶里逃出来的。”他认为这种人“对于罪恶的本体和自己堕落的生活都有一层深严而透彻的认识，以后任是罪恶怎样来诱惑他，他绝不会再上当了。”对这种人应是“十分尊敬”的。

《哭冯国璋》，用辛辣的讽刺概括了冯氏的人生。大钊同志指出：“除去汉阳的焦土，新华宫的残梦，”以及累累黄金之外，冯国璋的一生“还有什么！”

15日 在《解放与改造》第二卷第二号，发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署名守常。

文章阐述了从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大联合）发展的经济原因。

18日 在《新生活》第二十二期发表随感录《低级劳动者》和《整顿学风》，署名孤松。

前文有力地抨击了那些自命为绅士的人对“工读互助”的仇视和反对。指出：“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后文针对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门的当权者，慑于“五四”以来学校中日益发展的新思想，“乃妙想天开，说要整顿学风，”而作。

同日 毛泽东再次到达北京，直到4月11日离京去上海。在

京期间，大钊同志等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联系，并且商讨了赴俄勤工俭学问题。（参见“毛泽东给陶毅”的信）

20日 与马叙伦等发起组织“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并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

“启事”说：本会宗旨“在于本互助之精神，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补助大学之发展。”

21日 出席北京大学教职员大会，并被指定为由十一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委员，筹划有关事宜。（《北大日刊》2月10日）

25日 在《新生活》第二十三期上发表随感录三则，署名孤松。

《真是梦话》一文，再次强调了新潮流的不可阻挡。

《特别体恤》一文严词驳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付岳棻给北大校长的复信。指出：“教职员的精神上知识上比你丰富的多，恐怕你老先生配不上开导他们呢！”“公家给的薪水，是他们高尚劳作的代价，是他们当然的权利，谁配对他们说‘体恤’的话！国家银行发出的纸币不能兑现，他们忍受好几年了。他们真是‘特别体恤’了你们！”

《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下旬 写信给白坚武，为天津工科大学关闭一事，托白设法维持。（《白坚武日记》第十二册）

本月 护送陈独秀经天津赴上海。当时，他们化装成下乡的商人，坐骡车抵达天津，然后乘船赴沪。大钊同志一直把陈独秀送上船后才放心离去。（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送走陈独秀后，大钊同志到特别一区（即旧俄租界）与共产国际驻天津联络员取得联系。因敌人注意，随乘车返京。

本月 在大钊同志影响下，北京部分学生到唐山调查矿工的

生活，提出了改革包工制度的建议。（《晨报》1月14日）

又，另一部分学生深入到北京洋车工人住宅区调查。洋车工人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震动。（《晨报》1月26日）

## 2月

2日 午后4时，参加北大第三次总务会议。讨论与商务印书馆订购印刷机合同及改组《北大日刊》、确定各部的职权界限等问题。（《北大日刊》3月26日）

7日 出席北京大学教职员临时委员会，被选任交际。会议决定每日下午6时至7时开全体委员会，从8日起在总务处行使职务至正式会成立为止。

另，大钊同志等草拟的教职员会组织大纲印发给教职员征求意见。（《北大日刊》2月10日）

8日 在《新生活》第二十五期上发表随感录三则，署名弧松。

《山穷水尽的青年》一文赞扬了青年那种“在无路的地方寻路”的精神。

《精神解放》一文指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的解放”。

《好一对兄弟国家》一文，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两国反动政府。

本月 “少年中国学会”决定重组《少年中国》编辑部，由大钊同志等五人负责编辑工作。（《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

同月 北京政府内务部查禁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十二种书籍。但事与愿违，禁令的公布，反而促使广大进步青年更加注意这些书籍。北大一个学生著文讽刺说：“本来对于新思想的书籍，

因为不知书名，无法购阅，所以毫无研究。自经该部热心介绍著者及书名详披报章以后，即速按名购置，现已应有尽有，终日寝馈相伴，读得津津有味。……”(《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三号)

### 3月

7日 出席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会议推举大钊同志等十一人担任筹备选举委员。(《北大日刊》3月12日)

13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常会。会议推举大钊同志负“月刊”稿件的发稿责任。(《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期)

15日 午后4时，参加北京大学第六次总务会议。会议通过了李辛白提议的几个人事的任用。(《北大日刊》3月27日)

19日 午后4时，在总务处参加图书委员会会议。(《北大日刊》3月17日)

22日 午后4时，参加北京大学第七次总务会议。会议通过了大钊同志关于补刻刘申叔先生四种遗著的建议，讨论了暑假留校生的住宿费问题。(《北大日刊》3月27日)

23日 《北大日刊》二版报导：大钊同志以职员身份当选为“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委员。

同日 大钊同志等二十七位筹备选举委员致函各当选委员，通知他们正式当选。(《北大日刊》3月23日)

本月 在几经酝酿、讨论之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黄日葵、高崇焕、王有德、吴汝铭、李俊、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范鸿劼、宋天放、范齐韩。(罗章龙、朱务善等的回忆)

同月 在大钊同志到工农中去的号召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

团”接受了当时在团里负责的邓中夏的建议，决定今后活动范围，除在城市讲演外，注重乡村和工场讲演。不久他们和长辛店工人史文彬等商议、决定在长辛店找一间固定的房子，作为讲演和进行其他活动的场所。（《北大日刊》8月16日。）

## 4月

1日 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上发表《都市上工读团的缺点》，署名李守常。

9日 与胡适、徐彦之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一则。

“启事”说：“现在有一些学生。想实行半工半读主义。用他们的劳力来帮助他们求学的费用。各机关的人，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人，并请说明工作的种类和工钱的数目。我们可以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

20日 下午4时。在总务处参加图书委员会会议。（《北大日刊》4月16日）

21日 下午3时，“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开第二次讲演会。由李石曾讲“中国少年与社会新潮流”。大钊同志在“工读互助团”第二组（女子组）作讲演后，又赶来参加并讲了话。他首先介绍了上月14日宗教问题讨论会的情况；接着，对“学会”提出了希望，勉励大家更加努力地新文化运动，发动全体中国少年担负起改造社会之责。（《晨报》4月23日）

28日 下午4时，出席北大第九次总务会议。讨论“平民教育讲演团”请求学校津贴以及其它问题。（《北大日刊》4月29日）

30日 作《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发表在8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上，署名李大钊。

大钊同志在这里所指的光明运动，就是中国、朝鲜、日本青

年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共同反抗世界的强权主义。

月底 收到陈独秀 26 日自上海发出的信，征询关于《新青年》编辑出版的意见。此信由胡适保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本月 第三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及库兹涅佐娃、萨赫雅诺娃、马马也夫和翻译杨明斋等来中国。在北京，他们首先找到了大钊同志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一起讨论了建党问题，大钊同志还召开座谈会，举行欢迎会、讲演会。

据罗章龙回忆：由大钊同志召集与国际代表座谈的人员，大多是五四运动期间成长起来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维经斯基在离京前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共产国际讲话，并正式宣布那天参加会议者为共产党员。大钊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这就是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最初形成。随后，维经斯基等由大钊同志写信介绍到沪会见陈独秀。

同月 大钊同志邀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在北大图书馆聚谈纪念五一节的筹备事宜。这是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会上推举大钊同志撰写纪念文章，其他同志也各有分工。大钊同志的文章印成了小册子，在长辛店、北京大学五一纪念会上散发，同时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地。（参见罗章龙《亢慕义斋回忆录》）

上旬 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了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5日发出）全国各团体、各报纸纷纷发出通电和文章，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的心情，表示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中苏关系。

## 5月

1日 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五一” MayDay运动史》，署名李大钊。

文章详尽地叙述了“五一”节的历史，各国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各国“五一”纪念活动的情况。同时指出中国到了今天，“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同日 上午9时，大钊同志出席在北大二院礼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到会的校工和学生达五百多人。会上还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天津《大公报》5月2日)

当天 邓中夏等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讲演，并散发《宣言》。何孟雄等八人，分乘两辆汽车，沿途高呼口号，散发《宣言》，遭军警拘捕，两周后放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景山之东》)

7日 下午4时，在北大总务处参加图书委员会。议决七项。

(一) 予算案内之添置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

(二) 图书部应设购书课。

(三) 整理日报目录，添购南方各报。

(四) 建议总务处组织消防队以防火险，并从速建筑图书馆。

(五) 纸片目录，每类应编总号数。

(六) 各研究所阅览室书籍均归图书部登录编目。

(七) 订购书籍之函件，应编号存底。



同日 公布了图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北大日刊》5月10日)

8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常会。

13日 在《新生活》第三十七期上发表题为《红萝卜党》、《乱七八糟》两篇随感录，署名孤松。

16日 在《晨报》上发表时评，题为《国民公报案判决感言》署名明明。

大钊同志驳斥了北京政府大理院对《国民公报》的判决，对所谓“妨害治安”四字提出了质疑。

22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常会。关于学术谈话会的办法，会议决定由每个会员自认学术研究书籍，然后在学术谈话会上作出报告。大钊同志自报研究的著作是：古里大森《政治与群众道德》。(《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

同日 《北大日刊》公布黄辉华追悼会捐款清单。大钊同志捐现洋一元。

28日 以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名义，发布进行彻底清查所有图书的通告。(《北大日刊》5月29日)

本月 陪同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张藩臣参观北大图书馆，并招待一切。(《北大日刊》5月29日)

## 6月

18日 《北大日刊》三版公布大钊同志捐赠给北大图书馆的杂志目录。日文者有《太阳》、《支那》等二百六十七册。中文者有《雅言》《楚宝》、《寸心》等三十册，另有小册十七册。

20日 在《新生活》第三十八期上发表《自然与人生》，署名孤松。

这是“清明节”前后他在乐亭老家见闻的感想。通过四件

事，揭露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给予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以极大的同情。

23日 《北大日刊》刊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讲习会简章。”一则。

简章说：“本会以利用假期讲习图书馆学，谋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为宗旨。从“8月2日起，23日止，每日上午8时至11时为讲习时间。

讲习会聘请大钊同志等五人为教员。

24日 《北大日刊》公布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各组委员姓名表，大钊同志为文书组委员。

同日 总务会议决定27日（星期日）午后4时在本校第一院三十六教室开委员大会，讨论本会事务。

29日 上午9时至11时，在北京美术学校讲演“群众心理和群众道德”。（《晨报》6月20日）

## 7月

1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第一次年会）。会议内容有：①主席陈清报告一年来会务；②选择评议员；③讨论会务；④康白情报告赴日与日本“新人会”接洽情形；⑤欢送袁守和、张中府、周炳琳、康白情出国留学。（《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

2日 图书委员会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要求各任课教师速将填好的购书单交到图书主任室，然后汇综统一购置。

8日 北大评议会“特别会”全体通过，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从这时起，大钊同志在北大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记录”第二册）

9日 上午9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修改教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会议。

“修改教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4月30日评议会派定朱锡龄、陶孟和、陈大齐、俞同奎、胡适、贺培之、马寅初等人组成，6月22日增派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等加入。（《北大日刊》7月7日）

12日 催促张国焘赶快离京赴沪与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建党工作，并说：“近来陈独秀来信，表示要大干一番。”（张国焘《我的回忆》）

16日 蔡元培发布启事：本校因扩充图书仪器设备，拟向国内外募集款项，定于19日（星期一）上午8时在第一院接待室，邀集各行政委员长及总务委员讨论进行办法。（《北大日刊》7月19日）

21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常会。会上宣布评议员选举结果。大钊同志当选为评议员。（《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

同日 《北大日刊》公布“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入会办法和干事名单。总干事为蔡元培，大钊同志为调查部主干。

28日《北大日刊》登的刘俊“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中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地想办法改良，而且还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请校内几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员，帮他设法改良。……”

本月 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作了有关报告。这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本月 14日“直皖战争”爆发。18日皖系失败。19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引咎辞职”。北京政府通缉安福祸首，解散安福俱乐

部。从此，北京政府受直奉两系军阀控制。

## 8 月

1 日 同蒋梦麟、高一涵、胡适等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宣言》。认为：“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也“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提出：①废止 1914 年 3 月 2 日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②废止 1914 年 12 月 4 日公布的出版法。③废止 1914 年 4 月 2 日公布的报纸条例。④废止 1919 年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⑤废止 1914 年 3 月 3 日公布的予戒条例。⑥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宣言》还强烈要求：①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等自由，不得在宪法外再设立限制的法律；②立即实行“人身保护法”；③组织公民选举监督团”。

3—4 日上午 在北京高师举办的图书馆讲习会上讲“图书馆教育”（《晨报》8 月 8 日）

这次讲习会，听讲者百余人（内有女子十余人），多系各省和各校选派来有志于研究此项工作者。《晨报》报导此消息时，称之为“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新纪元。”

5 日 上午 8 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总务处参加行政会议。（《北大日刊》8 月 4 日）

14 日 上午，在北京高师举办的“图书馆讲习会”上介绍北大图书馆之沿革及组织。（《北大日刊》8 月 21 日）

16 日 上午 9 时，参加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的茶话会。出席的有：“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天津“觉悟社”、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共二十余人。“觉悟社”社员刘清扬报告开会宗旨，邓文淑（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 and 经过；周恩来发表演说；各团体代表相继各有所

述。大钊同志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辞，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17日 在《晨报》上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署名李守常。

文章颂扬了民众力量的伟大和不可战胜，宣称民众是永久的胜利者，并认为国民大会的意志，可以改变现政府的政策。

18日 午后1时，出席五团体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召开的联络筹备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大钊同志、张申府、陈愚生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会议议决成立一个“改造联合”的团体。（《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19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茶话会。陈愚生报告18日开会情形，接着，大钊同志发言指出：本会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入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20日 介绍日本“亚细亚学生会”旅行团与北京学生联合会接洽，并于下午1时在北大二院开茶话会。（《晨报》8月24日）

同日 与蔡元培等十三人发表启事，提倡临时国民大会，希望以此来解决国事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公布了“临时国民大会提案”：

- （一）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
- （二）肃清祸国党孽，禁止启用复辟帝制犯。
- （三）裁减军队，废除督军及与督军同等制。

- (四) 凡国民应享之一切自由权利禁止侵犯。
  - (五) 实行地方自治并得由各地方自行编练民团。
  - (六) 公布国家会计，禁止秘密借款。
  - (七) 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
- (《北大日刊》8月21日)

这个提案与《争自由宣言》都切中时弊，对于揭露黑暗，动员人民起了很大作用。

下旬 回原籍接家眷。(《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本月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根据当时的形势，大钊同志与白坚武的往来比较多。8月4日，“寄李守常快函一件，并附介绍吴子玉一函”。8月13日，“李守常来函一件即复一函，促则民照预约进行。”8月18日，“接张则民自京后闸三十五号（大钊同志住址）来信告京情，即复一函。”9月16日，白坚武到北京“寓李守常处，”到10月初才离去。在半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和吴佩孚另一幕僚孙汉忱等多次在一起郊游、吃饭、交谈。(《白坚武日记》第十四册)

## 9月

月初 大钊同志携家眷回京，住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三十五号。从此，全家定居北京。(《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

14日 《北大日刊》第三版上刊登邓中夏、罗运璜等致图书馆长一封信，对图书馆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16日 和蔡元培等三十人发表“启事”。发起组织“北京大学赈灾会”，并附认捐办法：教职员交会计课代收；学生交斋务课代收。

“启事指出：‘今年北方旱灾异常重大，灾区有五、六省之

广，灾民有数千万之众，无衣无食，道僵相望，瞬届寒冬，苦痛尤甚。窃思此等难民同属国民分子，坐视不救，夫岂人情。同人等念责任之所在，特组织斯会。”（《北大日刊》9月23日）

关于这次灾情的严重性以及全国各地募款救灾情况，各报从1921年1月起均有较详细的报导。大钊同志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的赈灾会”则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团体，并发动青年学生进行广泛的宣传募捐活动。

17日 《北大日刊》报导，大钊同志和陈启修等人举办了一个“现代政治”讲座。内容主要是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及中国劳工状况等。

同日《北大日刊》报导，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中说：一年来，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都已办得很有成效，与从前学长制时代大不相同。

18日 参加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常会。会议改组执行部和《月刊》编辑部，公推陈清为执行部主任、邓中夏为付主任，苏演存为编辑部主任、黄日葵为付主任。（《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

同日 参加北京大学评议会临时会，通过大学暂行章程。

大钊同志从本年下半年起被选为评议员（《北大档案》、《北大日刊》10月14日）

29日 介绍胡适与白坚武交谈。（《白坚武日记》第十四册）

月底 张国焘自上海回到北京，向大钊同志汇报他与陈独秀谈话经过。大钊同志当即表示，“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第二天写了表示赞成的信寄陈独秀。此后，多次与陈独秀通信，讨论建党中的各种问题。

（张国焘《我的回忆》）

本月6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茶

话会通过《改造联合约章》草案，

其他四团体“对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也都讨论通过。这两个文件接受了大钊同志的建议，号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以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同时，提出“到民间去”作“社会实况之调查”、“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五期）

## 10月

1日 《北大日刊》报导，大钊同志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以后又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设“社会主义”。还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课程。

同日 应韩国代表濮某及军人金某之请，与白坚武等一起在北京什刹海会贤堂会见濮、金。（《白坚武日记》第十四册）

6日 下午4时，在北大行政会议室，参加图书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设立教员阅览室事。（《北大档案》）

15日 《北大日刊》代北京地方服务团公布捐款名单，其中大钊同志捐现洋四元。

16日 上午9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新选出之评议会会议，确定了本届的组织，通过了校长提出的各组织委员名单。大钊同志为图书委员。（《北大日刊》10月18日）

17日 在《新生活》第四十一期上发表《变革的原动力》署名孤松。

文章指出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和俄罗斯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



同期《新生活》，还发表随感录《人治与自治》，署名孤松。

文章针对当时正流行的“某省人治某省”的运动而作。他说这点算是有一点进步的动机了，可惜只脱不尽人治的观念！为什么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省自治呢？为什么还要一个本省的人来治大众呢？”

中旬 天津“觉悟社” 谌小岑到京找大钊同志，要求介绍经苏联到德国做工去。后来大钊同志让张国焘通知谌，先回天津找张太雷，成立S.Y.天津小组。不久，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大钊同志关怀下成立了。（谌小岑《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

25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常会。讨论了会务。（《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

29日 以图书主任名义发表关于旁听生借书问题的启事。（《北大日刊》10月30日）

本月 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同年11月底定名为“中共北京支部”。它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骏等十一人。稍后陆续加入的有：吴汝明、李韶九、江浩、邓培、史文彬、宋介、李梅羹、朱务善等。此外，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人也曾参加这个小组，不久即退出。

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做了以下几件事：

(1) 办《劳动者》、《工人周刊》，出版《工人的胜利》、《五月一日》等小册子，并与其他团体合办《黎明》杂志。

(2) 举办工人补习学校。

(3) 成立工会——工人俱乐部。

(4) 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5) 派人指导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的工人运动和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6) 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斗争。

共产党小组经常开会的地点是大钊同志的家里或办公室。成立会就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周子信《北京共产党小组》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后，大钊同志仍主要以合法的社会身份进行活动。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加强对上层人士的工作。

(编者注：对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时间，最初的成员都有谁，其说不一。编者认为从酝酿到正式成立应有一个过程，当事人的回忆都有道理，但为求统一起见，应以文字根据为准。故我们把十月作为正式成立的时间)

## 11月

7日 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创办《劳动音》周刊。邓中夏负具体编辑责任。他在《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的发刊词中说：“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而食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识 and 善良的方法，作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这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

《劳动音》出版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广泛流传开来，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12月间，每期已销售到两千多份。(《晨报》12月21日)

8日 下午4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第六次图书委员会会议，讨论续订和添订杂志等事，其中规定大钊同志负责审定日文杂志。(《北大日刊》11月8日，《北大档案》)

10日 根据第六次图书委员会会议的决定，以图书主任名义在《北大日刊》上发布布告。

布告规定：学生务须携带借书证方能借书，学生译书不得借用馆中图书。并对在图书馆无理取闹者提出了批评。

25日 下午4时，参加北大第十八次总务委员会议。讨论有关学生津贴，口试成绩的效力以及校役夜校等问题。（《北大日刊》11月26日）

28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全体会员及来宾十余人，在北大第一院第二教室开学术谈话会，大钊同志讲演“自然与人生”。还讨论了邓中夏提出的《罗素·勃拉克与中国婚姻问题》。（《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

本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到会约四十人，公推高尚德为书记。（张国焘《我的回忆》；《北大日刊》10月28日高尚德启事）

## 12月

1日 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署名李大钊。

文章认为只有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写出正确的符合事实的历史，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2日 和费觉天、郭梦良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在4日的《北大日刊》上公布了该会的简章。

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采用互助的办法来研究并传布社会主义思想。以便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争取更多同盟者。其方法：一是文字宣传，二是口头讲演。文字宣传主要是编印社会主义丛书，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和发表社会主义论文。

7日 参加北大临时评议会。议决对欠薪的发放原则、学生对图书馆建议的处理办法及有关考试制度等问题。（《北大档案》）

8日 下午4时，参加北大第十九次总务委员会。（《北大日刊》12月10日）

9日 参加第七次图书委员会。会议决定：①续订与增订杂志的办理法。②对借书超过期限者应按不同情况，采取罚金、停止借书权及停止学生资格等措施。并由大钊同志等定期起草公布。（《北大档案》）

13日 参加第八次图书委员会。议决：①通过修正的借书章程；②各系购买书籍，由该系教授会开单交图书主任提交图书委员会审查；③各系研究所陈列之书籍，概不出借；④与美国接洽交换书籍事，请校长正式委托袁同礼为本校图书馆代表。（《北大档案》）

19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第一次宗教问题讲演大会。讲演者，周作人、王星拱。北京会员及听众数百人参加。（《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

大钊同志不但自己著文批判宗教，揭露帝国主义借宗教对中国进行侵略，而且还组织领导了“非宗教大同盟”的运动。

“少年中国学会”以后又组织了三次讲演大会，并出了三期“宗教问题”专号（即《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八期、第十一期，第三卷第一期）。

23日。参加北京大学评议会常会，讨论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等事项。（《北大档案》）

本月 陈独秀曾写信给大钊同志，商量是否应陈炯明之聘去广州任职，大钊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陈独秀去广东领导教育工作，有两个作用；（一）可以把新思潮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发起共产主义者组织。于是，陈独秀在12月16日夜乘船离沪去广州。（见茅盾、张国焘回忆录）

本年，任北大教授后，印发如下讲义：

## 一、《唯物史观》：

1.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2. 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
3.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4.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反映；
5.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7.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

## 二、《史学思想史》：

1. 史观；
2. 今与古；
3. 鲍丹的历史思想；
4.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5. 韦柯及其历史思想；
6. 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7. 桑西门的历史思想；
8.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9.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0.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其中有九篇曾在期刊上发表过。

据罗章龙撰写的《亢慕义斋回忆录》中说：‘入学后，选听守常先生的《唯物史观》。他的讲义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讲得有系统有条理，联系中外数千年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每次讲课座无虚席，还有不少立着听讲的。’

本年 大钊同志曾派陈为人等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联系，指导那里的工作。王尽美、邓恩铭也经常到北京，和大钊同志联系，请教在山东如何开展革命运动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

在大钊同志的指导下，这年，济南共产党小组成立。（周子信《山东共产党小组》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

## 1921年（三十三岁）

### 1月

1日 北京共产党支部在长辛店机车厂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分日校、夜校两部分，日校招收工人子弟入学，一般工人在夜校学习。

1920年冬，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支部为了深入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派邓中夏等负责此事，经过与史文彬等几个工人磋商，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由北大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捐了一些钱办起来的。除一、二名固定教师外，北京支部的党员几乎都去讲过课。

11日 《北大日刊》刊登“新知书社”招股广告。大钊同志的图书主任室是十三个募股经收处之一。“新知书社”附属于北京大学“新知编译社”。

15日 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自由与秩序》，署名李大钊。

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者要求个人绝对自由、不受社会制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所谓个人，本来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17日 下午4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图书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讨论各系购买图书经费之分配及权限问题。（《北大日刊》1月22日）

20日 《北大日刊》刊登袁同礼自美国给大钊同志的信。信中对美国出版物之多，极为欣赏，认为许多书籍极有价值，北大图书馆应购置，并附了书目。

这封信是1920年12月9日写的。信中还提到1920年11月曾给大钊同志写过一信。

21日 《北大日刊》报导：“罗素学说研究会”定于23日晚7点在欧美同学会，继续讨论“社会主义何以不能实行于现在的中国？”为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了题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大辩论。这次辩论会连续举行了几天。参加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大钊同志被邀请为裁判员。会上发言踊跃，争论激烈，最后大家静听了大钊同志的发言。他首先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阐明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如由封建制度一定转变为资本主义一样，是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他说：“比如，雏鸡在孵卵以前，尚在蛋壳以内，到孵化成熟后，雏鸡必破卵而出，这是必然的道理。”大钊同志最后说，赞成派如果拿唯物史观来说明问题，那就容易驳倒反对派了。他还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就会有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对胜利的信心，号召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24日 公布北大评议会通过的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图书馆为此发出通告，要求全校教职员学生按新规则办事。（《北大日刊》1月25日、28日）

27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召开的临时会议。会议决定月刊编辑部转沪，由左舜生负责。（《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八期）

本月 写信给胡适，反对改变《新青年》的编辑方针。

1920年12月底，胡适在《新青年》编辑部内制造分裂，妄图改变《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他写信给陈独秀，并征求大钊同志等人意见。他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f Russia》（《苏俄》，在美国纽约出版的进步杂志）的汉译本，主张改变杂志内容，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并把编辑部移到北京。大钊同志坚决反对胡适的阴谋，主张《新青年》照原样办下去，不改变它的性质和内容。宁肯分裂，决不停办。鲁迅在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

“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

结果，胡适的目的没有达到。（《北大档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 2月

2日 下午4时，参加北大总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校内各机关聘用事务员及书记需经三个月试用期的规定。（《北大日刊》2月4日）

3日 出席北大图书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北大档案》）

4日 以图书主任名义在《北大日刊》上发表通告一则。

19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召开的常会。讨论邓中夏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并作了相应的决定。会议还决定“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演讲，以备吾人参考。”（《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九期）

20日 在《新生活》第四十五期上发表三篇随感录：《民众的新年》、《近来的倒戈运动》、《堕落的法兰西文明》，署名孤



松。

本月 11 日，上海《新青年》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捕房以“言词过激有违租界章程”为由，强行封闭。17 日，北京政府电令江苏省长查禁载有“过激党”宣传文字之书刊。19 日，北京政府参陆处令查禁北京、天津、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地俄国共产党设立之机关，并通告各地取缔共产党的宣传。24 日，内务部又通电各省严防“过激党”及无政府主义印件。

### 3 月

5 日 在《新生活》第四十六期上发表三篇随感录：《北京贫民生活一瞥》，《黄昏时的哭声》，《山西》，署名孤松。

前二文，都是反映北京贫苦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同日 在北京《益世报》“女子周刊”栏内发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署名李守常。

这是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的讲演稿，由均一笔记。讲后，把讲稿及所有英、日文参考书交给均一，整理后又经大钊同志看过，从 2 月 19 日起在“女子周刊”上连载，到本日已连载三期，但全文未完。大钊同志认为“参政问题”和“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是现代妇女问题中三个主要问题。

6 日 下午 1 时，出席在北大二院由“新知书社”召开的募股人大会。在会上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大钊同志被推举为总务股委员。（《北大日刊》3 月 8 日）

上旬 大钊同志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据郑州市“二七”老工人姜海世回忆：“1921 年 3 月的一天，正要脱棉衣的时候，学校（工人夜校）的老师说：‘你们明天换换衣服，北京

来的一个大员要和你们见面。’大家都很纳闷，问这位大员叫什么名字，老师说：“不要问名字，叫他李先生”，我悄悄地问老师，他说：“我告诉你，可别对别人讲，这个李先生叫李大钊”。第二天，李大钊老前辈就到学校来了，戴顶黑礼帽，穿件大夹袍。他对大家讲了话，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字，两个字一连就是‘天’字。‘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他还说：“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工人们听了很高兴。不久，郑州铁路工人也组织起了工人俱乐部。”

12日 下午4时，出席在北大第二院召开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大会。会议讨论教育经费问题。决定自14日起暂行停止职务（罢工），并要求政府于直辖各铁路收入项下，拨付积欠（自去年11月起已三个半月）及国立八校常经费。会议选出郑寿仁、陈世璋、马叙伦，王绍瀛，王星拱、陶履恭、何基鸿、周象贤、顾兆熊、谭仲逵、李大钊等十一个委员，执行上述决议。（《晨报》3月13日）

13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举行的改选会。①执行部主任邓中夏因赴保定任省立高师国文教员，改推苏甲荣任执行部主任；②推左舜生任评议部通信员。（《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

邓中夏在保定任教期间，受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京支部的委托，在师生中开展了大量工作，建立了革命组织。（《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三期）

15日 上午10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二十余人，在北京美术学校开会。会议决定先组织“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当场票选马叙伦为主席，并成立了办事机构，确定了各股人选。大钊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推选为新闻股干事。

会议还决定：①要求政府规定实际款项，作为教育基金；②要求清偿积欠薪俸；③应尽快发布宣言，说明此次罢工理由，以免外间误会。（《晨报》3月16日）

16日 午后2时，出席在北大二院召开的共青团特别会议，会上选举何孟雄为华京代表，出席4月份召开的少年共产党国际大会。（《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会议还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全文如下：“诸位同志们：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我们在三月十六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达得很快。

我们的报告将用种种可能的方法，送达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总局或东方局。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  
北京共青团上”

18日 下午1时半，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在讨论了各项问题后决定：①成立“教育基金委员会”；②在停止职务期间，各校之图书馆、图书室及学期毕业考试，春季旅行等一律暂时停止；③复函学联，表明不达目的决不上课。（《晨报》3月19日）

20日 在《评论之评论》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署名李大钊。这是写给费觉天的一封信，公开发表时由费觉天加了标题。由地主买办阶级代表、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张东荪等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论战”，在知识

界影响很大。他们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来反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其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先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谬论，在北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有市场。北大等学校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与辩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钊同志不但参加了讨论，而且认真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此文就是从经济上驳斥“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这一论调的。他指出，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但“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虽不象欧美、日本，有发达的产业经济，但中国“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而“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所以，中国非“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

本月在《曙光》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与《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署名S.C.。

前文，通过介绍苏联的情况，着重用实例驳斥所谓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振兴实业的谬论。同时，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角度，加以论证说：“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以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大钊同志的结论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指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能“有所附托”。“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它“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可以“与各国C派朋友相呼应”。（“C派”，共产党的代称，）最后大钊同志号召“中国C派的朋友“赶快”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

北京共产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一起投入了这场有历史意义的战

斗。

21日 下午1时半，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出版《半周刊》，自本星期三起，每周三、六各发行一次，并设发行、印刷两部于北京大学，大钊同志等三人担任编辑。（《晨报》3月22日）

同日 在《民国日报》付刊“觉悟”上发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署名李大钊。

这是一篇讲演稿，由李林昌笔记。文章详细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这对于当时知识界正确地理解十月革命和劳农新政府起了积极的作用。

23日 下午1时半，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本会组织大纲。大纲说：本会由“国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八校教职员代表组成”。“本会议以联络上述八校教职员，谋巩固教育根本为宗旨。”“列席本会议之各校代表人数不限，但有发言权者每校三个，表决权每校一个”。（《晨报》3月24日）

30日 出席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三院召开的第四次大会。这时已有团员五十五人。根据大钊同志的提议，决定实行执行委员制，设立事务所——即团的机关，并在所内置油印机等，印刷宣传品，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会议还决定应多吸收工人和中学生入团，并派团员四出联络。会议选举大钊同志为执行委员。（《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档案》）

## 4月

6日 下午4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十

一次会议。（《晨报》4月7日）

同日 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一院召开的执行委员会。议决六项：（一）筹备五一运动；（二）刊行一、二种小册子；（三）委托团员分任职务；（四）调查北京之平民学校及平民讲习所，设法使之社会主义化；（五）讲演会之筹备及如何研究社会主义。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档案》）

7日 下午4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由于政府对教职员之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决定总辞职。当场通过了辞职书、通电及宣言等文件。（《晨报》4月8日）

8日晚，“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在李大钊同志住宅举行谈话会，欢迎上海会员恽震、吴保丰。（《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

恽震后来对这次谈话会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认为李大钊同志出语诚恳忠实，与人和蔼。会上既谈了会务问题，又谈了社会上青年的婚姻和自杀问题，谈至十一点半始兴尽而散。（《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九期）

同日，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十三次会议。（《晨报》4月10日）

14日 出席“新知书社”在乾面胡同三号总社召开的创立会。到会股东百余人，大钊同志当选为监事。（《晨报》4月18日）

24日 下午2时，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的第五次大会。张国焘首先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议决的事项：①修改章程，请大会通过；②五一运动小册子《五一日》已印二千本，明信片式纪念品已印一千张，皆应于30日前分发各工厂；为要求8小时工作制，星期休息工薪照发以及要求加薪的传单，也应于5月1日散发各处；③团的机关暂设在平民讲演所内办公；④陈述到天津、唐山等地联络经过，决定5月1日再由北京派出代表携带印刷品辅助进行；⑤长辛店拟5月1日开工团成立

大会，希望多派些同志去帮助。

接着，讨论如何营救押在黑龙江陆军监狱已十余天的京、津、沪赴俄十三名同志。一致同意大钊同志提出的托黑省友人设法营救的办法。所需经费，除到会同志认特别捐外（大钊同志当场签了十元），每个团员分担二元，再募捐一部分，最后由大钊同志包足所缺之数，以求尽快将人救出。

最后会议推出七人组成“五一运动委员会，”分头办理有关事项。并选出三人赴长辛店，二人赴唐山。（《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档案》）

25日 下午2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大钊同志在会上被女高师推举为代理有发言权的代表，并接待北大毕业同学会派来的代表，随后向会议转达了代表的意见。（《晨报》4月26日）

26日 下午2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第二十三次联席会议，大钊同志代理主席并主持会议的进行。（《晨报》4月27日）

27日 下午2时，出席并主持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第二十四次联席会议。（《晨报》4月28日）

29日 下午2时，国立北京八校在女高师召开学联临时会，招待八校校长及辞职教职员代表，讨论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大钊同志出席了这个会议并代表教职员在会上发言，说：教职员现在辞职中，原不能过问，唯以公民资格视之，亦何忍教育破产，故校长团方面提出于政府之说帖，要求筹定基金，乃基金未筹定之前，不能中断交通部特别协款之办法，同人亦表示赞同，故若政府能依次进行，并正式经国务会议通过而宣布于世，同人亦必不坚持索欠。（《晨报》4月30日）

30日 《晨报》六版报导：5月1日为劳动纪念节，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于是日下午1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开讲演

大会，担任讲演者为北大教授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诸人。

## 5月

1日 在大钊同志直接关怀下，长辛店一千多工人隆重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并正式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参加大会的，有市内工人，还有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而来的工人。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晨报》5月2日）

《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报导了长辛店工会成立消息，并称赞“办会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2日 下午2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并主持会议的进行。（《晨报》5月3日）

4日 上午10时，女学界联合会在女高师大礼堂开会，纪念五四运动二周年，大钊同志到会并发表演说。

同日 在《晨报》上发表《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的短文，署名李大钊。

文章强调了不应只把“五四”当作爱国运动纪念日。因为这一天，学生们用一种直接的行动，反抗强权世界，它与“五一”劳动节有同样的意义。

同日 下午2时，出席并主持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以上见《晨报》5月4、5日）

6日、10日、11日 三个下午出席并主持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晨报》5月7日、11日、12日）

13日 下午2时，出席并主持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二十九次常会。决定全体代表出席第二天由学联召开的协商会，地点在女高师。（《晨报》5月14日）

18日、20日 分别在上下午召开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



联席会议，均由大钊同志主持。20日的会议上，在讨论了国务院第九百六十一号公函（函意国立八校没有开课，教员薪俸停发）后，决定履行18日通过的宣言，实行第二次总辞职。（《晨报》5月19、21日）

20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在大钊同志住宅召开临时会议。出席者除大钊同志外，尚有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等八人。

会议就会员易家铨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决定由执行部批准他在以前提出的退会要求。（《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一期）

28日 下午2时，出席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第三十六次联席会。会议决定大钊同志任《半周刊》总编，并加派六人分任其事。（《晨报》5月29日）

31日 上午10时，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五十余人，又赴教育部索欠，并在陈、任二司长接见时，与马叙伦，谭熙鸿先后发言，申述理由。但至下午4时仍无结果。（《晨报》6月1日）

同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在城南公园召开的饯别会。出席人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饯别赴德留学会员沈怡，赴美留学会员孟寿椿、并摄影留念。（《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一期）

上半年 继续发展与鲁迅的友谊。从《鲁迅日记》中看出。1—5月，他们之间有多次书信往来。

## 6月

8日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百余代表及学生数百人，冒雨至教育部，在新华门遭到军警毒打，当场受伤师生达数十人。大钊同志亦被打昏过去。这就是新华门前的“六三”惨案。

“六三”事件震动了全国，各地除发出声援电外，京内外大中小学生有的罢课抗议，有的组织街头演说，揭露政府摧残教育。八校长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也不断开会，商量对策，并正式向地检厅控告总理靳云鹏、警察厅长殷洪寿、教育部次长马邻翼。其间，孙中山致电八校教职员，请南下就职。电报说，在北京政府之下，“决无教育发展希望，况复摧残至此。”

在这种情况下，逼使军阀政府不得不考虑一个善后办法以结束这一风潮。（见《晨报》6月4日起各日有关报导）

13日 《晨报》二版刊登由大钊同志主编的《半周刊》上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最悲痛的最紧要的一件事实》。文中说：“本会议主席马夷初君，自受伤入院后，愤政府之摧残教育，虐待士类，刀刺枪打之不足，复以医院为囹圄，断绝交通，严重监守，待同人等受伤代表，俨同已决之死囚。已于前数日起断绝饮食，决心自杀，当时看护代表及马君家属苦劝不纳，现已陷于危急之境，不知同人中有何善法以劝慰马君否？临书悲愤，用告同人。”

26日 《晨报》六版刊登李大钊、陈独秀等十五人署名的启事，题为“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启事说：“新时代丛书是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所不可少的知识，每册约三万字。在读到为什么起意编辑这个丛书时，指出：①普及新文化运动；②为有志研究高深一些学问的人供给下手的途径；③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

28日 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被推为出席29日各团体联席会的代表。（《晨报》6月29日）

29日 原定在北京高师开各团体联席会，因军警干涉而移某校开会，到会十一个团体。

大钊同志在会上发言说：“教职员前因所处地位的关系，以索欠为一种手段，社会一部分人的观察，对于此点，颇不明瞭，马

邻翼亦误会教职员为争欠薪，而不知此外尚有教育经费巩固之一大目的。至于“六三”事件，所以在法庭起诉，实因政府欲假法律为利器，教职员不得已而以此手段对付之。在现政治下之法律，非国民起而拥护之，难望其有独立精神，今日多数团体主张从法律解决，应当注意。”（《晨报》6月30日）

本月 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乘船抵上海，后又到北京，与大钊同志等晤谈几次，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党员都同意这个建议。（参见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

本月 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遣张太雷等参加。

## 7月

1日 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上发表《俄罗斯的去及现在》，署名李守常。

文章客观地介绍了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列宁。

4日 出席并主持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第五十四次联席会议。大钊同志报告有关情况，会议讨论决定三件事：①对清华因援助八校而罢课一事，派代表去清华接洽，求得妥善解决。②安徽学生姜高琦在此次风潮中因伤重于7月1日殒命，应电吊唁。③筹划教育基金。（《晨报》7月5日）

15日 上午9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临时联席会议。在讨论有关问题后，即与王兆荣一起去高师，把教职员开会情形，向学生临时联合会作了介绍，希望学生方面采取一致行动。（《晨报》7月16日）

20日 在北京陶然亭会葬陈愚生夫人金绮圆。（《吴虞日

记》)

24日 午前10时，北京政府派王芝祥在化石桥尚志学会正式慰问教育界。到会者有：八校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二十六人；学生联合会代表何玉书等二十八人；蒋梦麟等七校长；调停人范源濂、汪大燮、张一麟，各方都有代表发言。随后去医院慰问马叙伦等。（《晨报》7月25日）

28日 上午9时，参加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讨论通过复职宣言。

又，八校长通电全国，自28日起八校恢复原状，9月1日开学并即招考新生。

又，教育部训令第二二一号：以二百万元的盐余作学校准备金，为应急之用。

又，教育部函复调停人：国务院4月30日阁议第一条——自4月份起，各校每月经常临时各费二十二万元，本部即查照办理。（《晨报》7月29日）

至此，历经四个多月的教育风潮暂时告一段落，大钊同志一直辛勤操劳在斗争第一线。

30日 上午9时至11时，在北京美术学校，作题为“社会与个人”的讲演。

这是国立八校发起的公共学术讲演会，由各校教授轮流担任，以弥补学生停课期间的损失。（《晨报》7月30日）

本月 23—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代表共十三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广州陈公博、包惠僧；上海李汉俊、李达；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张国焘、刘仁静；东京周佛海。另外，国际代表马林、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23—29日共开过五次会，首由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继之

讨论党纲和今后工作。

30日，在开第六次会议时，因法国巡捕侵扰，会议未能进行。遂于31日转移浙江嘉兴南湖开第七次会议，通过党纲，研究今后工作，选举中央机构，宣布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本月北京党组织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创办了我国早期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

该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着重报导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极力鼓吹组织工会。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共产党》月刊称赞它“办得很有精神。”因此，创刊不久，销数增至二万份。

本月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成立宣言，指出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联合起来的总机关。”1922年7月18日，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以后迁北京，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邓中夏任总主任。同时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分部，《工人周刊》即成为总部的机关刊物。

## 8月

2日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周太玄。介绍赴法的林宝权、苏梅入里昂大学时给予照顾。

16日在北京长美轩与蒋梦麟、吴虞，马叙伦等晤谈。（《吴虞日记》）

19日下午3时，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到会共六十多人。会议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大钊同志是二十五个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举为中文干事和研究员。（《晨报》8月20日，《吴虞日记》）

## 9月

1日 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各向本校教职员大会辞去代表职务。由新当选的代表继续工作。(《晨报》9月3日)

14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谈话会。会上宣布第三届(1921年7月—1922年7月)评议会选举结果，大钊同志等被选为评议员。会议推举杨锺健为执行部主任，陈仲瑜为副主任。(《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四期)

30日 《北大日刊》二版刊登本校消息一则：“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派遣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到中国研习汉文，并研究汉文书籍编目方法。经金陵大学校长鲍文介绍到北大图书馆，时正值罢课期间，由图书主任李守常先生导观各书库，并请卫德转达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卜提问博士，把他们的书目片子送给我校一份，并请向施文葛博士索要汉文书籍编目法一部。”

同日 又刊登卫德给大钊同志一封信，译文如下：

“守常先生赐鉴：今夏道出燕京，各承指导，又蒙示以藏书，甚感甚感。随即致函国会图书馆馆长卜提问博士，转达足下拟索取该馆目录卡片之感意，想彼现已有报命矣。至该馆中文部主任施文葛处亦已去函，请其将中文书籍编目法函致尊处，藉备参考。至尊处所有祁君著之中文书籍编目法，曾蒙允借给敝处一用。兹特请敝馆主任具函奉借，务希慨允，一俟评本告竣，立即奉还。此颂公绥。

卫德谨启

1921年9月17日

同日 《北大日刊》一版发布图书部通告二则：

(一) 限10月1日前交还所借之书，逾期者必须交纳违约金，(二) 本学年学生借书证，自10月11日起颁发。

本月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欧洲考察教育和募集图书馆基金回到学校，全校教职员召开欢迎大会，大钊同志出席并一起合影。(照片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 10月

15日 下午3时，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十二次总务会议。(《北大日刊》10月21日)

20日 在图书馆办公室，与来馆借书的吴虞、顾颉刚晤谈。(《吴虞日记》)

同日 北大图书部根据校长本月8日布告精神，公布了因违反借书规则而停止学生资格和停止借书权一年者的名单。(《北大日刊》10月21日)

本月 9日，“少年中国学会”杨锺健等三人，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谈话会，商讨整顿月刊。20日杨锺健等六人在北大地质研究会开“少年中国学会”常会，决定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分别由邓中夏、黄日葵筹备。(《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五期)

本月 11日，北京大学在第一院举行开学典礼。

蔡元培讲话指出：“要研究高深学问须具有两种精神：一是活泼进取的精神，一是坚忍耐劳的精神。”胡适讲话说：“以后中国的前途有许多的风潮，诸位要打定注意，不管国亡了，天倒了，我们只管研究我们的学问。”

## 11月

2日，下午4时，北大本届（1921—1922）评议员选举结果在第二院揭晓，大钊同志继续当选为本届评议员。（《北大日刊》11月3日）

4日 下午1时至4时，约请范时训、李中安、王文生、李逢时、张国祥、聂思敬等谈话。（《北大日刊》11月4日）

9日 下午4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本届第一次评议会，并当选为评议会书记。会议通过了有关议案。（《北大日刊》11月7日，《北大档案》）

13日 出席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常会。内容有：①决定努力执行上次常会决议；②宣布社会主义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不日即可成立；③催促《会员通讯录》早日出版，并号召会员多为月刊写稿；④邓中夏畅谈南游、西游的感想。（《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五期）

邓中夏同志受北京党组织委派，暑假中去四川讲学四十多天，宣传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新思想。他的讲学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重庆二女师的学生，为反对封建教育，曾掀起了“择师运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三期）

14日 下午4时，参加北京大学第二十三次总务会议。对法文系学生提出的核减书价的要求，经研究未能照准。（《北大日刊》11月16日）

16日 出席在北大二院地质研究会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常会。会议内容有：①杨钟健报告会务；②两个研究会必须组织，但文学研究会可暂缓。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研究题目由邓中夏拟定，每月开报告会二次；③张申府声明出会，议决将原信交“会员通讯录”发表；④沈懋德建议出版“婚姻问题专号”



《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六期)

17日 《北大日刊》四版刊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是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京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决策。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1920年3月秘密成立后，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促成党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一年多来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迅速发展，北京已建立两个党支部。为了在学生中更加有系统、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组织决定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学生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

“启事”说明了宗旨、学习研究的方法，并公布了六条规约。

“研究会”公开后，会员曾发展到二、三百人。京外也可以通信加入，还在工人中发展会员，著名的工人领袖邓培、史文彬，王荷波、孙云鹏都加入该会。

研究会成立后，主要有以下一些活动：

一、搜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书籍，有汉、英、俄、德各种文字的书报杂志达数百种之多。

二、组织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上举行。

三、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书籍、论文。

四、主办讲演会，每月月终举行一次，李大钊、陈启修、顾孟余、陶孟和、高一涵、鲁迅等都曾到会讲演。

五、进行理论研究。后来固定为十个小组专题研究。

第一组：唯物史观；第二组：阶级斗争；第三组：剩余价值；第四组：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第五组：社会主义史；第六组：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第七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第八组：俄国革命及其建设；第九组：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第十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

中国。

“研究会”还利用一些纪念日开展宣传活动，同时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如组织非宗教同盟、反基督教同盟、民权运动大同盟、妇女协会等。在斗争中还向各地输送干部近百人。

（参见《北大日刊》1922年2月2日，范体仁、罗章龙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研究会”设有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所藏书籍均有此印章。据罗章龙回忆，大钊同志常到“亢斋”与大家谈诗论道。（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载1979年《湘江文艺》第十一、十二期）

本月 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必须办定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在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等地，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S、Chen

## 12月

1日 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署名守常。

1918年，美国设有图书馆专业的学校已有十七处。该文介绍了这十七处学校成立的略史、开设的课程以及对图书馆员的要求。大钊同志认为我国图书馆应向先进国家学习，加强自己的训练，故在文章结束时写道：“前月我在女高师国文部讲演这个问题，很引起他们兴味，……后来国文部主任胡小石先生和国文部该生倒很想添设这门功课，可惜中国现在研究此种学问的尚少，教员实不易得人。”…大钊同志为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曾化费了大量心血。

8日 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公开信，全文如下：

“本校教职员诸君公鉴：敬启者，本校教职员推出之临时委员会，自从大多数委员相继宣告辞职后，几乎无形消灭，对内对外均无从负责。现在教育经费又生问题，若不将此若有若无之临时委员会告一结束，恐致有误进行。兹定于本月10日（星期六）下午2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本校全体教职员谈话会，俾弟等得以报告经过之情形，而张先生亦得以讨论善后之办法。事关公共，敢希贵临。

王绍瀛、周象贤、王星横，李大钊同启。”

14日 出席北大评议会本屈第三次会议，讨论研究所的组织大纲，以及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等问题。（《北大档案》）

15—17日 《晨报》副刊连载《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署名李守常。这是大钊同志在北京中国大学的讲演，由甘塾仙记录。

16日 上午8时，出席在北大第二院会议厅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会，他与蔡元培都讲了话。

会议选举了职员，讨论了会务。会后合影留念。（照片存中国革命博物馆；罗章龙《亢慕义斋回忆录》）

22日 上午9时至12时，在北大第一院第三教室，讲现代政治课，题为“工人的国际运动”。（《北大日刊》12月21日）

23日 北大图书部通告：停止出借和续借图书。（《北大日刊》12月24日）

本月 孙中山在桂林会见马林。

马林是由大钊同志介绍，由张太雷同志陪同去会见孙中山的。双方谈话非常融洽，马林建议两件事：（一）要有一个联系各阶级、特别是联系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孙中山表示完全赞同。（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同月 京内外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华盛顿会议”（“太平洋会议”）的无理决定，提出：反对会外交涉；取消二十一条；无条件收回山东权利；满蒙领土完整；反对四国协约等正义要求。

## 1922年（三十四岁）

### 1月

8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今与古》，署名李守常。这是他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讲演，由吴前模、王淑周笔记。

文章批评了崇古派的“黄金时代说”，鼓励青年“要拿新的来创造。”他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代子孙得有黄金时代。”

14日 北京大学图书部通告各院典书课的有关事项。（《北大

日刊》1月16日)

18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现代的女权运动》署名守常。

文章指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亦是妇女解放的时代。”要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而现代女权运动的主要要求是：①“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机会；”②“职业选择的自由”，并同类工作同等报酬；③民法上，妻在法律前应与以法律的人格完全地位并民法上的完全权能。刑法上，所有歧视妇女的一切条规完全废止。公法上，妇女参政权；④须承认妇女在家庭的、社会的、工作的、高尚价值与把妇女排出于各种男子活动的范围以外生活的缺陷、粗劣、偏颇与单调”。

文章特别强调推进劳动妇女运动，只有如此，全妇女界的地位才可以提高。

24日 下午4时，出席北京大学总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今后本校聘用书记采用公开招考的办法，各用人单位将报酬、办公时间、资格程度等登本校日刊。（《北大日刊》2月1日）

根据这一规定，2月1日《北大日刊》上刊登一个图书部聘用书记的启事。

25日 下午2时，出席北京学界集股赎路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办事细则和宣言，并决定春节那天，分别前往东安门外，前门大街、厂甸、城南游艺园、新世界等处进行宣传。

北京学界赎路集金会是23日成立的。会长是蔡元培，大钊同志被推举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其余各界都有类似组织，设想用募集来的款子赎回胶济路权。（《晨报》1月25、26日）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应邀在春节期间到厂甸、新世界、城南游艺园进行广泛的宣传讲演。（《北大日刊》2月11日）

30日 在《学艺》第三卷第八期发表长篇论文：《论自杀》，署

名李守常。

文章在研究了自杀的种种原因、动机、方法、场所以及宗教家、哲学家的自杀观以后，大钊同志指出：“自杀实受自然的社会种种影响，而不全然是任意的行为”，因此，“自杀实有救济的必要”，其办法是：“先使他个人品性的力量健强，”“抛弃厌世的人生观”，然后“大家一同来改造这缺陷的社会。”

本月 14日《晨报》报导：北京印刷工人冯江顾等，联络同人、拟组织一印刷工人联合会，本互助之精神，求工艺之进步，共同抵制资本家的虐待。同时发表《警告印刷职工同人书》及《印刷工人联合会简章》。这是党领导下北京印刷工人运动史上破天荒的行动。

本月 15日，在北京西城某校，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二周年纪念会。青年学生到会数百人。会上报告了二人的历史接着自由演说。讲演者都号召大家发扬两烈士的革命精神。（《晨报》1月18日）

本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王尽美、邓恩铭等参加。

这次大会在列宁领导下，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

## 2 月

4日 在《北大日刊》发表图书主任通告一则，要求报名应聘当书记的人于6日下午2至4时到图书主任室面试。（《北大日刊》2月8日）

9日 上午9时至11时，在北大第一院第三教室继续讲“工人的国际运动”。这一讲直到3月2日才结束。（《北大日刊》）

11日 出席北大评议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的规划。大钊同志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委员长由所长蔡元培兼。（《北大日刊》2月15日）

12日 上午，北大同学新闻记者同志会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开成立会。大钊同志应邀到会，并发表讲演。

讲演指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而社会是复杂的，“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加以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希望北大同学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接着他批评了胡适的错误观点。指出在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但是应该的，而且完全可以做得很有成效，决不象胡适所讲的只是为了填补新闻纸。（《晨报》2月14日）

17日 下午3时，参加北京学界集金赎路会在美术学校召开的各股委员联席会。到会委员共三十多人。会议决定通电国内各地教育界，请其从速组织赎路团体。并通电国内已成立之赎路团体，各派代表，6月以前齐集于适当地点共同组织发起会。

会上还决定由交际股分头联络京内各赎路团体，一起进行工作；由宣传股前往各校讲演，劝其认股。（《晨报》2月18日）

18日 午后3时，在北大一院研究所参加国学门全体委员会。会议讨论设立特别阅览室问题。大钊同志说：图书委员会对于研究所提用书籍曾议决两种办法：（1）复本可借；（2）单本照借书规定办理，限两星期归还。

会议由蔡元培主持，出席委员还有顾孟余、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北大日刊》2月17日、27日）

19日 下午1时，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举办的讲演会上作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地点在北大二院大讲堂。

这篇讲演，刊登在2月21日至23日的《晨报》上，署名李大

钊。

讲演开始大钊同志说：“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接着，着重讲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最后，他希望通过这次讲演，“能够引起点兴趣”，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并把成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

25日 下午2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评议会。（《北大档案》）

28日 参与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并委托北大总务处代为办理捐款事宜。

当天《北大日刊》刊登该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今年俄国有这样大的天灾，各国均已发起救济的义举，派人到灾区放赈去了，我国人最富于慈善心，凡是亲仁善邻，救灾恤患，一切美德，从不让人独步的，所以同人等也发起了一个救济俄灾的团体。……”

本月 为营救北大学生陈德荣，写信给北大总务主任沈士远，并请蔡元培保释。最后于3月7日以北京大学名义写信给京师地方检察厅请其释放陈德荣。（《北大档案》）

同月 8日，由共产党员邓中夏，朱务善等创办的“校工夜校”正式开学，学生约五十人，都为北大出版部印刷工人及新知书社印刷工人。暂设英文AB班及工人常识班。（《晨报》2月10日）

### 3月

1日 下午4时，出席北大第二十九次总务委员会议，讨论学生因家庭困难，暂缓交纳学费问题。一致认为，对确实困难



者，可予特别宽容，由校长宣布准其缓交至春假时止。（《北大日刊》3月4日）

4日 下午，出席在北京美术学校召开的学界赎路集金会全体委员会。会议议决：①私立学校亦可加入本会；②确定各校认股数字；③反对胶济路督办；④零星股以五元为一股，不足五元者可几人合一股。（《晨报》3月5日）

5日 在《新生活》第五十五期上发表《胶济铁路略史》，署名孤松。

这是大钊同志为配合当时全国捐款赎路运动而写的。他详细叙述了胶济路的历史，揭露了德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8日 下午4点至5点间，约请要求工作的陆侃如到图书主任室谈话。（《北大日刊》3月8日）

9日 晚，给在沪的白坚武拍电，有要事相托，并说明已托陈独秀去接洽。（《白坚武日记》第十八册）

13日 与王星拱、王绍瀛、周象贤等四人在本日《北大日刊》上发表紧要通告，向全校教职员报告本月10日参加八校联席会第一百十三次会议情况，并要求于本日下午4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全体大会，讨论联席会作出的两项决议和一项提案。

同日 出席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由胡适起草的“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会议通过了这个条例。（《北大日刊》3月20日）

20日《晨报》四版刊登“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21日和22日《晨报》七版续登完）

这个组织是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大钊同志是这个统一战线性质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它的不少成员是党、团员中的活动分子。

非宗教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分会，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对帝国

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予以揭露，迫使一些教会学校不得不改变那种强迫学生做礼拜及禁止爱国运动的状况。（参见罗章龙、范体仁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23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黄庞流血记序》，署名李守常。

1月份，黄爱、庞人铨在湖南长沙第一纱厂的罢工中为军阀赵恒惕杀害。此文就是为当时出版的《黄庞流血记》一书写的序。

序言指出：黄、庞的死，是死的有意义的，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示无限的敬意！”“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业！”同时要记住：“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25日 出席北京学界集股赎路会在美术学校召开的全体会议，赞成组织各团体联席会，以便共同讨论，分头进行。（《晨报》3月26日）

同日 午后3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本届评议会第十次会议。会议议决案共七项。第一项是设立“学生事业委员会”。大钊同志被推举为该委员会委员长。（《北大日刊》3月28日；《北大档案》）

## 4月

1日 在《晨报》上发表《失恋与结婚自由》，署名守常。

文章在批评了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后指出：要懂得“恋爱不存，婚姻自解的”道理，“至于那些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最后他希望“多情男女郑重着些，失恋的人自少。”

2日 在《晨报》发表致记者的一封信，署名守常。

信中对《失恋与结婚自由》一文中某一具体事实作了说明，充分表现了大钊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

4日 《晨报》三版刊登由大钊同志主稿，有十二人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

宣言以说理的态度，阐明非宗教者的严正立场。（《吴虞日记》1922年4月1日）

9日 下午1至5时，出席“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讲演大会，到会者中外人士约千余人，肖子升主持会议并致词，大钊同志等相继发表演说。（《晨报》4月10日）

同日 在《北京周报》第十二号上发表《宗教妨碍进步》，署名李大钊。

文章阐述了为什么要组织“非宗教同盟”以及为什么要首次把矛头对准基督教。

12、14日 《北大日刊》刊登大钊同志向北大图书馆再次赠书五十三册的消息。

28日 与王星拱等四人在《北大日刊》发表启事，再次声明速开全校大会，改选代表出席八校联席会。为此，29日北大教职员临时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作出决议：①旧代表每人再轮流出席一次联席会，次序是：李守常、周象贤、王星拱、王绍瀛。

……

本月 9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加入者一千八百余人，到会者一千五百余人。北京来宾有邓中夏、陈为人、朱务善、贺昌等，还有郑州、陇海、新德、江岸、信阳、京绥、京奉等地区、路段代表。（《晨报》4月10日）

本月 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

## 5月

1日 下午2时，北京高师工学会，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三团体，共同在高师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到会五百余人。

大钊同志出席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主要内容是：

(一) 五一运动史概略：叙述了五一纪念的由来及美国五一运动的经过；法、德诸国对于五一运动的表示；日本、中国近来重视五一纪念的情况；俄国劳农政府纪念五一的特色。

(二) 工学主义与五一纪念。劳动乃愉快的非痛苦的，自由的非强迫的。学界人士以求学之暇从事作工，乃尊重劳动之表示；工人以作工之暇，从事学习，乃人类应享之权利。工学打成一片，乃为人类极轨。同时，阐发8小时工作及8小时教育之原理及其利益。

会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散发了有关纪念五一的传单。（《晨报》5月2日）

同日 在《晨报》副刊（五一纪念专号）上发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署名李守常。

文章首先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站起来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接着，阐述为什么要工作8小时和修游8小时的道理。最后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具体奋斗目标：

### (一) 关于外交者

- (1) 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
- (2) 要求与劳农俄国成立商约并即正式承认其政府。

### (二) 关于内政者

(1) 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一律改为国军，实行裁兵；

- (1) 主张开国民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
- (3) 反对以人民为牺牲的内战的战争。

(三) 关于改善工人境遇者

- (1) 8小时工作，额外工作加薪；
- (2) 假期停工给薪；
- (3) 男女同工同酬；
- (4) 含有危险性的工作应该格外优待，如矿、路、电等，
- (5) 取缔童工；
- (6) 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

4日 下午4时 出席在北京高师举行的纪念“五四”三周年大会。到会千余人。大钊同志等在会上发表演说。

在会场上散发了“学生联合会宣言”。(《晨报》5月5日)

5日 出席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的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会议于当天下午1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北大日刊》5月3日)

6日 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纪念号)上发表《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署名守常。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的经过及其结局。

10日 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非宗教同盟成立大会，到会五百余人。共产党员范鸿劼任主席，会议通过了章程。大钊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与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三十多人一起被推举为干事。(《晨报》6月19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上范体仁回忆)

同日 下午4时半，参加北大总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

论学、宿费未交学生的处理办法。(《北大日刊》5月11日)

14日 《努力周报》刊登《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组织“好人政府。”

此文由胡适执笔，有蔡元培，陶行知等十六人签名。《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曾转载。大钊同志也参加了签名。

本月 17日下午4时，北大教职员临时代表团在第一院接待室开会，确定本校参加索薪团的名单及人数，定期参加八校联合索薪斗争。(《北大日刊》)

本月 蔡元培决定将在直奉战争期间组织起来的保卫团改名“学生军”，并统一制服、编制与操练。这一办法后来推广到其他各校。(《晨报》5月21日)

## 6月

7日 赴保定，与吴佩孚晤谈两日。

5月22日，大钊同志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到保定会见吴佩孚，并同白坚武作主义上的深谈。7月15日至18日此人又到洛阳再次与吴佩孚、白坚武会谈。接着8月21日新俄代表越飞又派参赞到洛阳与吴佩孚、白坚武会谈。(《白坚武日记》第十八册)

当时，吴佩孚正企图收买人心，所以在和大钊同志会谈后，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党和大钊同志充分利用这个通电，又利用吴佩孚与交通系的矛盾，利用他想控制铁路的野心，建议吴佩孚的亲信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上派一密查员。建议被采纳后，大钊同志便派遣共产党员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等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分别在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陇海等铁路上从事革命活动。

大钊同志自始至终直接领导这几个同志的工作，去之前亲自

谈话，交代任务，指示工作方针，解决思想问题。要求半年以内各路上扎下工作根基；同时要提高警惕，对吴佩孚不要存幻想，做到第一，不要“赔本”；第二，把革命种子散布在铁路工人中开花结果。以后，又不断找这些同志汇报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当这些同志与铁路当局发生冲突（大小十余次），大钊同志都设法予以解决。既保护了同志，又使得工作进行顺利。

经过同志们的努力，铁路工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京汉路在年底前就成立工人俱乐部十六个之多。（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回忆李大钊同志》；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载《先驱》第九号）批判当时存在着的几种对时局的错误主张，同时提出十一项具体主张和办法。其中也批评了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主义。”

当张国焘把中央的这个文件带到北京，大钊同志看后，表示完全赞同，后来他又向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分发了这个文件，并郑重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当即获得多数人的谅解和支持。

（张国焘《我的回忆》）

18日 参加非宗教大同盟在北大第二院召开的第一次干事会，到会二十余人，大钊同志等八人当选为常务干事。

会议讨论决定了五项工作：（一）召集全国非宗教团体开总同盟大会（二）办月刊；（三）定期讲演；……由常务干事分任其事。（《晨报》6月19日）

该同盟在本月出版《非宗教论》一书，收集三十多篇论文，多为名人所作，有几十万字。这是反映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革命文献。大钊同志的《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文就收集在这本书中，署名李守常。

大钊同志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宗教实是思想自由的障碍，其本质就是不平等；尖锐地批判了基督教在“博爱”的口号下所

兜售的“不抵抗主义。”号召无产阶级摒弃不抵抗主义，向那些压迫者、剥削者作坚决的斗争。

20日 下午4时，出席北大教职员临时代表团会议。会议推定何基鸿等五人为本期出席八校联席会议之代表。（《北大日刊》6月23日）

24日 《北大日刊》二版，全文刊登大钊同志等十人签名的一份悼词，题名为《谭陈纬君夫人行状》。

本月2日 徐世昌退出北京，黎元洪来京接任。从此，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晨报》）

## 7月

1日 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上发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署名李守常。

文章阐述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2—3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第三次年会。大钊同志与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沈昌、陈仲瑜六名未能出席会议的北京会员，联合向年会提出一个书面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提案批评了会员中存在的所谓“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明确指出：“不干涉政治”就是“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提案对年会的影响很大。由于共产党员高君宇的努力，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本会对时局的主张”，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十一期）



5日 下午4时，出席北大总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确定了暑假各机关办公时间，新学期收费办法以及对未归还图书、仪器之学生的处置办法。（《北大日刊》7月8日）

14日 出席北京教育会召开的临时评议会。会议专门讨论京都自治问题。认为这对于教育前途关系甚大，应该表示本会对自治的主张。为此，决定发布宣言，并成立研究编著部和执行部。大钊同志被推举为研究编著部成员。（《晨报》7月15日）

本月 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钊同志没有出席大会，但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口号。

## 8月

1日 参加北京大学季刊编辑员讨论会。议决如下：

（一）本校发行季刊四种：（1）自然科学；（2）社会科学；（3）国学；（4）文艺。自本年8月起每季出一本，每期页数各组自定。

社会科学组由蒋梦麟、顾孟余、李守常等组成。

国学组由蔡子民、顾孟余、李守常等组成。

（《北大日刊》8月19日）

同日 《晨报》二版刊登“女权运动同盟启事。”启事说：本会自本星期起特请……李守常……等陆续讲演，……凡热心女权运动者均可莅会听讲，地点：北京石驸马大街女高师。

“女权运动同盟”是在大钊同志热心支持下，由北京女高师

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晨报》本日三版全文刊登该同盟宣言。

中旬 北大等校师生召开欢迎会，欢迎苏俄代表越飞来华。会上大钊同志发言，表示了中国人民对苏联和十月革命的向往，感谢苏联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在华一切特权。（《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

中旬 赴上海。在沪期间曾写信给胡适。全文如下：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而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明日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关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 李大钊

20—22 日间 在杭州参加为时两天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者还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尚德、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议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姚维斗、丁则勤《马林在华活动纪要》；张国焘《我的回忆》）

23 日 与林伯渠一起会见孙中山。随后又进行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有时“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狱中自述》；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此后孙中山即赞成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

24 日 “民权运动大同盟”在京湖南会馆开成立大会，到会四百余人，大钊同志等十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发行

《民权》周刊。

“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首先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以及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范体仁回忆）

25日 介绍越飞与孙中山会晤。（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下旬 应邀在沪中华职业学校职工教育馆，作关于“青年问题”的公开讲演。（《民国日报》9月2日）

本月 据上海《时报》载，陈独秀于本月9日在寓所被法捕房拘捕，抄走书籍杂志，并定18日审判。15日《晨报》三版刊登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署名的“为陈独秀被捕事警告国人”宣言书。19日《时报》称，陈独秀已于18日判决取保释放，罚款四百元，销毁查抄之书刊。

本月 17日《晨报》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主任邓中夏起草的“劳动法纲要”，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劳动立法运动。

## 9月

月初 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一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张国焘：《我的回忆》）

8日 自沪抵洛、11日晨由洛返京。其间与白坚武畅谈申江近情及南北政情，游览了元铁木耳坟。（《白坚武日记》第十八册）

24日 《晨报》六版刊登大钊同志等十四人署名的“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全文如下：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

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劼、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 10月

7日 《北大日刊》一版刊登李大钊等十四人署名的启事，定8日午前10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讨论10月10日为促进裁兵而开展群众运动问题。

9日 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去洛阳，与吴佩孚“握谈颇欢洽。”当晚，大钊同志与白坚武谈北京情况。10日午后，同张溥泉，白坚武等游关陵龙门香山寺，“登临尽日，夕阳归来”。11日陪同张溥泉离洛，吴佩孚、白坚武等至金谷园车站送行。（《白坚武日记》第十八册）

14日 上午10时，北京七十二个团体代表蔡元培、邓中夏等为请愿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向黎元洪递交请愿书。（《晨报》1月15日）

密探员载德的探报说：“据近日民权运动大同盟中人，尚不满意酌量修改治安警察条例，拟日内召集大会进行，以达全部废止，并由李大钊起草全文，再请愿于参众两院，今正联络研究系及民党议员代为主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五期）

17—18日 北大少数学生因反对收讲义费而大闹会计课，不听劝说，蔡元培愤而辞职。蒋梦麟，沈士远、李辛白、冯祖荀等也以“领导无方”同时辞职，北大全体职员则发表一个暂停职务的宣言。

大钊同志发表了《李守常启事》：“鄙人已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此白”。（《北大日刊》10月19日）

25日 下午4时，参加在北京大学大礼堂召开的全体教职员学生大会，蔡元培首先讲话，宣布复职。大钊同志亦讲了话。

（《晨报》10月26日）

同日，《北大日刊》刊登蔡元培及北大职员复职的启事。

本月 中国共产党在沪之中央机构先后移到北京，直到“二七”惨案后撤回上海。

本月10日 中共北京地委印发两种双十节文告：《中国共产党敬告劳动者》和《中国共产党敬告国人》，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和帝国主义、军阀斗争（原件存“革命博物馆”）

本月23日 唐山开滦五矿三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以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党组织领导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罢工。

罢工后，矿局以重金贿赂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率领保安队，残酷镇压。

中共北京地委，劳动组合书记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做了大量工作，扩大宣传，进行募捐，并通过上层关系，联络一部分国会议员，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惩办杀人凶手杨以德，扩大了罢工的影响。

这次罢工坚持了二十天以后，不得已于11月16日开始逐渐复工。

## 11月

2日 下午4时，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公布本届（1922—1923）评议员选举结果。大钊同志继续当选为评议员。（《北大日刊》11月3日）

7日 下午3时，在北大三院，参加由北京各团体发起的苏俄革命纪念会。大钊同志被推为主席，并发表讲演，题为“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

讲话分述四点：(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接着发言的有各方面代表多人。最后全体起立三呼苏俄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同日 在《晨报》副刊（俄国革命纪念号）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署名守常。

文章号召：“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同时严肃地提请全国人民注意对俄外交问题，要求“即日无条件承认劳农政府”，“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以上均见《晨报》11月8日）

15日 下午4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会议。（《北大日刊》11月17日）

19日 北大、法专等校一部分学生，发起一个学生读书会，午后2时半在中央公园开董事会，讨论读书方法，到会五十多人。

读书会分为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经济五组，每组有导师一人或数人指导，会员可自由选组，每周至少开研究会二次。

大钊同志等被聘为导师，并在会上讲话，对学生读书会热烈支持，并表示自己也乐于加入。（《晨报》11月21日）

20日 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图书部主任通告：因图书部组织有变动，自本日起暂停出借图书，以便清理。

23日 下午5时，在北大第一院接待室，参加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北大日刊》11月23日）

本月 陈独秀、刘仁静等离京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 12月

1日 在《晨报》付刊“创刊三周年纪念号”上发表《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署名守常。

文章指出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就是新的国际共管，“列强间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极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

2日 在《北大日刊》一版登启事一则：

“鄙人已辞图书主任职，同人如有关于图书部的事件，乞与图书主任皮皓白先生接洽可也。”

大钊同志任北大图书主任五年之久。

5日 《北大日刊》一版刊登通告两则。

其一：校长办公室秘书职务已请李守常教授担任，本月5日起到室办公。

其二：各评议员于7日午后4时半到第一院接待室开会。

7日 《北大日刊》四版公布北大第二平民学校募款结果，大钊同志捐款四元。

8日 下午4时半，参加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会第三次会议，被指定为招待股主任。干事有谭熙鸿、丁燮林、李四光、沈兼士，沈尹默、胡春林、徐之杰。（《北大日刊》12月9日）

16日 上午10时，在北京中国大学哲学读书会，讲演“社会问题与政治”。全文发表在29日《民国日报》副刊上，署名李大钊。

文章认为：“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

17日 在《北大日刊》发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感言》署名守常。

文章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29日 下午4时半，在北大经济学会第六次公开讲演会上，作“社会主义的将来”的讲演。

31日 《晨报》五版报导正太路工人开工盛况的消息。

正太路罢工是14日开始的，提出九条要求，取得完全胜利后，于27日复工。这天，石家庄全体工人游街庆祝，手执“罢工胜利”“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啊！”等旗帜。

正太路工会是大钊同志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本年 曾给周作人一信。

“启明先生：

Malon 与他的 Integral Socislism，我从经济学字典上查得一点，兹译出寄上，供参考。

弟 大钊

1923年（三十五岁）

1月

11日 上午9时半至11时半，在北大第一院第四教室，为社会系讲“印度问题”。（《北大日刊》1月9日）

15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高师礼堂，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大会。大钊同志出席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同时发表演说的还有瞿秋白、蔡和森等。（《晨报》1月16日）



16日 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上，发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署名李守常。这是大钊同志为“北大经济学会”所作的演讲。

本文扼要地概述了社会主义下经济组织的一般情形。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给人们以必然能够实现的确信。“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在这里，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前提。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组织，首先是使生产和交换机关社会化，把资产阶级的企业、矿山、银行、运输业及商业等收归国有，实行国营。国家“依极经济的组织和方法”，充分利用天然资源，合理使用资金和劳力，采用先进技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他强调要以对事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统治，在各个领域集中专门家的智慧进行指导。

18日 本月中旬，北京政府任命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激起广大师生无比愤怒，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驱彭运动，矛头直指军阀政府。

蔡元培于本日在《京报》二版发表辞职启事。声明：“为保持人权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决定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宣布决不与彭允彝合作。

同日 大钊同志出席北大评议会召开的特别会议。讨论关于校长辞职后的应急办法，议决暂以评议会名义维持学校事务，至校长去留问题解决为止。（《北大档案》）

又 大钊同志联络北大教授蒋梦麟、顾孟余、马叙伦等二十人，以全体教职员名义上书大总统，“请予罢免教育总长彭允彝，并乞慰留北大校长蔡元培以维持教育而弭学潮……。”（《北大档

案)》

19日 下午北大学生约千人,与法专、医专学生一起赴众议院要求勿投彭允彝票,遭警察毒打驱散,伤二百余人,重伤五十余人。(《晨报》1月20日)

晚7时 出席北大评议会举行的第二次特别会议,讨论学生被打事件,推举代表慰问受伤学生,决定经法律手续办理此事件。(《北大档案》)

又 北大全体教职员为这次学生受伤事件发表了宣言。(《北大日刊》1月23日)

24日 下午在校长办公室为受聘到南洋中学任教的王其新、王培椿、杨兴栋办理关系、转交川资。(《北大日刊》1月24日)

26日 下午4时半,出席北大评议会召开的第三次特别会议。(《北大档案》)

同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发表。

越飞来华后,经李大钊、林伯渠联系安排,本月16日以养病为名赴上海。22日前往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中山寓所访问并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及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于本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二、“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等等(参见姚维斗、丁则勤:

《马林在华活动纪要》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本月 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之第十五种,写作《平民主义》,署名李守常。

本书介绍了关于平民主义的一般知识。首先指出所谓“平民主

义”，也就是被译为“民治主义”，“唯民主义”，“民本主义”等等称为“德谟克拉西”的民主主义。这种思想已成为风靡世界绝大的潮流。

接着指出所谓“平民主义”，它不是封建专制的统治，亦不是少数人的寡头独裁统治，而是充分尊重人民，发挥人民在国家事务管理中的主动性的多数人的“自由政治。”

大钊同志特别强调“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然而，要真正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

本月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莫斯科返回北京，曾与大钊同志等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讨论。

马林于 22 年冬第三次自中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工作。共产国际遂于本月 12 日通过《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尤其是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决议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决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姚维斗、丁则勤：

《马林在华活动纪要》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 年第三期）

大约在本月底马林返回北京后，大钊同志曾约集中共北京区委的负责人在苏俄使馆开会讨论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参加会

议的有范鸿劼、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刘仁静、包惠僧等七、八个人。会上对两党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和方式方法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内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在它的干部中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实行国共合作会失掉党的阶级立场，妨害党的纯洁。马林发表长篇演说，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做说服工作。大钊同志支持了马林的意见，他说：“我同意马林同志所提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重要性的说法，也同意同志们所提出保持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意见。可是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过，如果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关于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的方式方法问题那倒比较容易商量。”大钊同志的意见受到马林和与会同志的重视。（参见姚维斗、丁则勤：《马林在华活动纪要》《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同月 给周作人信一件。内容为：

“起明吾兄，昨接胡小石先生由武高来函云寒假时当地教职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嘱转请吾兄及爱罗先珂先生联袂一行，一切旅费均由该会供给，弟亦拟前往一游。务希俯允，并转约爱罗先珂先生，如何盼覆。

弟 李大钊

本月，中共北京区委曾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总结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会议鉴于大钊同志将在寒假应邀赴武昌讲学，对他离京期间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并指定罗章龙为临时负责人。（访问罗章龙记录）

## 2月

月初 离京赴武汉讲学。

4日 下午7时至9时，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之邀，在寒假演讲会上，发表题为“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的演说。

演说介绍了当代世界的四种妇女运动，即一、宗教的；二、母权的；三、女权的；四、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性质和情况，指出我国女权运动的目标是要实现妇女在宪法上之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废除民法上之亲权、财产权之不平等规定；争取女子有同受教育的机会和职业平等权利……，坚决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纳妾，为此妇女必须结成坚固的团体，联合一致，在打倒军阀、争取民权的运动中，实现妇女的解放。（《江声日刊》2月5日）

同日 京汉线爆发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

早在建党前后，大钊同志就在铁路工人中进行了长期的大量工作。至22年底，京汉线工会组织已经遍及全路，先后有十六个分会建立。在此基础上，劳动组合书记部遂决定于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军阀吴佩孚竟用武力横加禁止，为此全路工人在“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下，于本日开始举行总同盟罢工。

7日 反动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长辛店、汉口等沿路各地，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造成震动全国的“二

七”惨案。总计死四十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入狱者六十余人，被开除流亡者一千余人。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壮烈殉难。

其时大钊同志正在武汉。他对这次罢工极为关注，曾会见罢工的领导人陈潭秋、施洋等。他为工人的流血牺牲、为林祥谦、施洋等人的罹难，承受了巨大的悲恸。

事过一年，大钊同志追溯道：“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他又说：“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会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李大钊选集》499页）

据朱务善回忆：“1923年2月初，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我以北京学生代表名义到武汉，在这里我通过陈潭秋、夏之栩诸同志的关系，找到守常同志，此时守常同志在武汉各大学讲演唯物史观。我见到他时，他的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以前变黑了。他正和李汉俊一起，大概在谈论‘二七’惨案的情形。见我去了，他很关心地向我说：‘我正要找你……’，‘你们在武汉的活动，政府早已注意，昨晚传说有逮捕北京学生代表的消息，应该当心一些……’随后我们也参加了守常同志和李汉俊同志的谈话。我们详细分析了“二七”事件的经过，守常同志很愤慨地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的意见，派我们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回忆守常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9日 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向北京巡阅使王怀庆发出“关于侦查李大钊在北大组织革命机关，宣传共产主义”的密电。内称：“李大钊在该校内设有秘密机关，传布过激说……”要“密饰干探，切实侦查，……密达政府，依法惩办。”（《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1025）90）

12日 在《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今”与“古”》一文，署名李大钊。

本文指出，人类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产生了古与今的问题，随之也就出现了怀古派与崇今派的对立与论争。

大钊同志认为对怀古派的批判，实质上是要把人类从死人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对现在和未来充满信心，以不断推动历史前进。他不赞成怀古派那种“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终生沉缅于对过去的怀思的悲观主义论点；而赞美崇今派向上、进取、有作为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决不是退落的，而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不断高升和前进的。

本月 在《申报之最近五十年》上，发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署名李大钊。

本文是应《申报之最近五十年》编辑黄炎培之约，为纪念《申报》五十周年所作，原定题目为“五十年来世界的劳工运动。”大钊同志在此写了与《申报》同时诞生的巴黎公社的历史。

本文对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巴黎公社的产生和它的伟大业绩做了评价。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尝试。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巴黎公社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荣胜利。同时，也叙述了公社的失败及公社失败后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指出了法国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令人痛心的教训。

同月 京汉路罢工爆发后，党领导各阶层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

“民权运动大同盟”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通电全国援助此次罢工；（二）组织“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进行筹款及援助工人事宜；（三）派代表慰问工人；（四）发布传单。（《晨报》2月7日）据8日《晨报》报导，“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已经正式成立，通讯处设东城银闸胡同十三号。

惨案发生后，八校教职员曾召开临时会议，发表了宣言。“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分赴各地声援罢工。赴武汉代表朱务善、缪伯英等，在武汉招待二十余团体，控诉军阀枪杀江岸工人并决议发出通电。（《晨报》2月12日）

在京的议员百余人，也于众院小议场开会讨论当局镇压工人的横暴举动。在他们提出的“解决铁路工潮建议”中，包括有：惩办凶手；承认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权；承认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被害工人遗族和受伤工人等项内容。（《京报》2月14日）

### 3月

5日 《时事新报》刊登“北大旅沪同学会启事”。通知旅沪北大同人的地址，其中有陈独秀、徐新六、李守常、顾颉刚、叶圣陶等。所载李守常的地址是：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张春木转。

是时，大钊同志已自武汉转抵上海，曾居孙洪伊处。“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发布了对李大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通缉令，不久中共中央和马林等都由京迁回上海。为此大钊同志这次在上海滞留时间较长。（参见姚维斗、丁则勤：《马林在华活动纪要》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

12日 在《时事新报》之“合作”周刊第三期，发表《马克思经济学说》一文，署名李守常。这是大钊同志在上海的一次演



讲，由孙席珍笔记。

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并指出，为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必须系统的开展对《资本论》的研究。

14日 据《吴虞日记》记载，“谭仲逵交来‘世界周刊’社社员名单一份”，大钊同志为十八个会员之一。

23日 北京党组织以各界人士名义在师大风雨操场，隆重举行追悼施（洋）林（祥谦）大会，出席千余人。大会指出：“二七”烈士是为四万万国民争幸福、争自由而死的，我们应当用革命的方法，继续诸先烈，奋斗争自由，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最后通过四项决议：（一）恢复解散的工会；（二）抚恤被难家族；（三）恢复因罢工被捕者的自由；（四）惩办祸首。（《京报》2月24日）

本月 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爱国运动，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继续霸占旅大，要求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条。26日，北京各界四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四项决议：（一）国民自动收回旅大，宣布二十一条无效；（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内政外交诸问题；（三）宣布北京现政府之罪状；（四）与日本绝交。会后冒滂沱大雨游行三小时。（《晨报》3月）

## 4月

15日 在上海大学作题为“演化与进步”的演讲。17日《时事新报》“学灯”第六期，报导了这次演讲的消息并概略介绍其内容如下：“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我们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象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做人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

在前面迎着我们的。人类是有进步的，不是循环而不进步的。即就文艺论，也不是今下于古的，所以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的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

17—19日 在《新民意报》付刊“星火”上，发表《史学与哲学》，署名李守常。这是在复旦大学所作的演讲，由黄维荣、温崇信记录。

演讲阐述了史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并着重说明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及研究史学和哲学对人生的影响。

18日 在《向导》周报第二十一期，发表题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的文章，署名T.C.L。

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确定之后，便采取积极的步骤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钊同志此文便是应这种需要而写的。

文中指出，国民党只植根于海外华侨和南方的广东一省是很不够的，为了反抗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必须展开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文中批评了“国民党不太看重民众的势力”的错误，指出国民党应该适应这种需要，倾听民众的呼唤，树起旗帜来，把反帝反军阀的民众——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向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因此“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

本月 在沪期间，与邵力子一起介绍杨钟健加入国民党。（《杨钟健自传》）

月底 离沪返京。

## 5月

1日 在《晨报》付刊上发表《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一文，

署名：T, C, L。

本文介绍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指出工人的国际联合，是现代各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为对付资产阶级的联合而组织的。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如普法两国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巴黎公社，各国资产阶级联合镇压俄国苏维埃）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工人国际联合的目的，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通过阻止本国执政者的干涉，支援在别国兄弟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则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战争，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本文还介绍了工人国际联合的团体，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活动。

同日 北京党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一”国民大会。到会团体有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少年中国学会等四十余团体及高师、北大等三十余学校，约计五、六千人，韩麟符为主席，何孟雄、高尚德等十余人发表演说。

会议通过五项决议：（一）拥护工人集会结社及罢工之自由，恢复被封工会；（二）推倒张内阁并严惩张绍曾、刘恩源、彭允彝、程克等误国殃民应得之罪；（三）革除国会中被政府收买之不良分子；（四）请国民一致努力收回旅大及片马；（五）严惩“二七”屠杀祸首。（《晨报》5月2日）

4日 在《晨报》发表《纪念五月四日》一文，署名T.C.L，这是大钊同志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所作的讲演。

文中指出，“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他勉励青年说：“民国到现在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为此青年们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组织民众，以为达

到大革命之工具；”第二要反对军阀政府，“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

10日 《北大日刊》第一版刊登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

17日 在《北京周报》第六十六号上，发表《实业改造的中心势力》，署名李守常。

本文就“临城事件”，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所谓裁兵，不过是空谈而已。指出要真正做到裁兵，必须铲除军阀，从根本上改造国家。而要获得国家的根本改造，必须有一个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正在酝酿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22日 京师地方检查厅为调查李大钊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向北京大学发出公函。

内称：“据警察密报，五月十日下午八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北大楼第二教室开秘密会议，有李大钊、王文彬、刘仁静等约四十余人。公推刘仁静为主席，张国焘为书记，首先报告本团近增团员计各校二百五十余人，皆谋主义之发展，改造社会，拥护工友，推翻军阀为目的……”（内务部档案(121)3496；京师检查厅公函十二年函字第七二七号，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十五册）

28日 《北大日刊》第三版刊登江西心远大学募捐经募人李畧华鸣谢启事。内载李大钊认捐十元。

31日 曹靖华于本日写给大钊同志信一封，拜托帮助联系转学事。（信存《北大档案》）

## 6月

12—20日 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钊同志出席。

大会代表三十人，代表四百三十二个党员。会议的中心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钊同志在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也指出，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大会采纳了李大钊及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大钊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议之后，他应邀继续与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对外政策诸问题。（《狱中自述》）

## 7月

中旬 离广州返抵北京。

28日 在陈醒农家与吴虞等人晤谈。（《吴虞日记》）

## 8月

本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桑西门的历史观》，署名李大钊。

文章介绍了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同月 收到鲁迅惠赠新出版的《呐喊》一书，甚为高兴。曾与子女谈论这本书的价值，尤赞扬书中的《阿Q正传》写得好，要孩子们认真阅读。（《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六期）

## 9月

9日晚 出席北京大学在第二院召开的欢迎苏俄代表加拉罕

大会。《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北京周报》1923年第八十期)(日文版)

16日 在《北京周报》第八十期发表《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一文，署名李守常。

本文主要报导和评论了苏俄代表加拉罕来华的情况和即将举行的中俄会谈的形势。最后指出当时可能出现中、日、俄三国关系接近的趋势，但没有展开论述。

同日 《努力周报》第七十期发表《“大国民”的外交》一文，署名S.C。

据《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一文的末尾交待，本文系上文的姊妹篇，中心是分析中、日、俄三国关系，尤着重于对日本的分析。他估计日本经历东京大地震这一“天灾地变”的打击，有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变动，成为中、日两国接近的媒介。提出了“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来欢迎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事实证明，这种分析是不正确的，东京地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

关于中俄关系，大钊同志正确地指出：“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文章最后指出：“国人近来常说国民外交”，但是，“没有国民的政府，那有国民的外交？”

本月 大钊同志曾有两信寄胡适。

其时胡适正在编辑“世界丛书”，大钊同志为蔡和森同志所著《俄国革命史》一书，能在丛书中出版，特致函胡适。（胡适当时住杭州西湖烟霞洞养病，信自北京石驸马后闸三十五号寄出。

第一封：

适之吾兄：

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如何？盼你赐覆。校中已决于九月十日举行开学礼，但上课恐须至下月了。

弟 李大钊

第二封：

适之吾兄：

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他同原稿送交先生，如能收入“世界丛书”，即希示复，以便转达和森。

弟 李大钊

（信存《北大档案》）

10月

初旬 在北京会见鲍罗廷。

鲍罗廷奉苏联政府之派于9月启程来华，任驻广州常设代表。在他南下经北京时，首先会见大钊同志，就国共合作事交换了意见。（姚维斗、丁则勤：《马林在华活动纪要》载《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

19日 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着其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五期）

25日 《北大日刊》第一版报导，北大校评议员选举已于24日下午3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当众开票，李大钊当选。另有顾孟余、王星拱、李煜瀛、马叙伦等十五人当选

同日 《北大日刊》第二版刊登注册部布告（四）：“李大钊先生因事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这是大钊同志应孙

中山之约，赴沪与廖仲恺讨论国民党改组事宜。

本月 国民党改组工作加紧进行。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鲍罗廷为顾问，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28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同时，还决定明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三辑）

同月 5日北洋直系军阀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而当选“大总统”，10日正式就职。

这一丑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孙中山通电全国进行讨伐；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杭州等地都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参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

## 11月

1日 《北大日刊》公布了北大校评议会，下设各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名单。李大钊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

13日 《民国日报》付刊“觉悟”，发表《社会主义释疑》一文，署名李守常。

上海大学于苏联十月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研究会”，大钊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讲演。

本文针对人们由于对社会主义不了解而产生的种种疑虑，作了透辟的解释，从而宣传了社会主义学说。

29日 《民国日报》付刊“觉悟”发表题为《史学概论》的文章，署名李守常。这是大钊同志在上海大学的又一次学术讲演。后收入《守常文集》时，改题名为《研究历史的任务》。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只有马克思，“才



把历史的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才真正从本质上观察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因此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无一时不在变革中。

关于历史研究的任务，他借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陀德的话指出应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是“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进步的真理。”

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他又强调，历史“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必须要改作重作，不要迷信古人、不怕推翻前人的定论，让我们“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统集合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吧！

本月 12 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案，务求主义鲜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山大学学报》1978 年 第五期）

## 12 月

1 日 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题为《时》的文章，署名李守常。

本文针对当时章士钊、梁启超等散布历史的循环论和退落、悲观、怀古的思想，从对“时”的观念的感想，告诫人们要去掉颓废的历史观，树立“兴奋鼓舞的历史观与乐天努力的人生态观。”

他指出，时间是一直向前流动的，“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

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他鼓励人们要面向未来，珍重现在，在这有进无退一往无返的时间里，努力奋进，作出无愧于古人的事业。

4日 在《民国日报》付刊“觉悟”上，发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署名李守常。这是大钊同志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劳动问题讲座上的演讲记录。

本文以通俗的语言，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贫困痛苦的根源。

8日 在《时事新报》付刊“商学”第三十三期上，发表《王著货币论书后——致王效文》的通信，署名李大钊。

信中就王著货币论一书，提供了有关的古代货币情况，并以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了货币的形成和发展。

9日 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主持召开第十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讨论有关改组问题。会上廖仲恺报告改组的意义及措施，成立了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大钊同志出席这次会议。（参见《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五期）

11日 为《清代通史》初版本作序。

《清代通史》是青年学者肖一山编写的一部篇幅浩瀚的著作。出版时，梁启超、今西龙（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博士）等中外著名学者曾为之作序。大钊同志是作序者之一。

中旬 离沪返回北京。

17日 在北大校庆之第二日纪念会上发表讲演，“略谓北大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外界黑暗势力有如过眼烟云等语。”（《京报》12月18日）

20日 在《新民国》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难艰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署名李守常。

“二七”惨案发生后，由于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使有些人产生了悲观、畏难的情绪。大钊同志在这

里以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教育人们，要以雄建的精神，去冲破革命道路上艰难险阻，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他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但我们要象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扬子江和黄河那样，不管遇见沙漠还是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洪流滚滚，一泻千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路。”

本月 在《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孔道西的历史观》，署名李大钊。

本文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先驱，百科全书的编辑者之一，孔道西的社会历史观点。

同月 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独秀签署的第十三号通告。

通告明确规定了我党各级组织，在帮助国民党组织和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应当采取的步骤。

年底 大钊同志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本年冬他和北京区委的赵世炎、邓中夏等负责人，亲自给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蒙古族青年讲解马列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并向他们介绍革命书刊。不久，这批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奎璧、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成了蒙古族中的第一个党支部。这批蒙古族青年干部的成长，为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准备了重要的干部条件。

1924年（三十六岁）

## 1月

4日 主持在京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大会在北大第三院礼堂召开，出席千余人。

会议听取了报告，选出李大钊、谭仲逵、许宝驹、谭克敏、张国焘等六人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京报》1月6日）

5日 与其他代表一起，乘特别快车南下，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京报》1月6日）

同日 《北大日刊》刊登注册部布告（二）李大钊先生因事离京，其所授史学史、史学思想史、及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回校后再行补讲。

上旬 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经上海时，曾出席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在国民党一次大会上共产党人应采取的态度。中央在这次会议上，组织了一个由李大钊领导，有谭平山、瞿秋白等参加的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张国焘：《我的回忆》）

10日 抵广州。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所写，北京出席大会一行“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

11日 孙中山先生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李大钊为首的北京代表，示以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征询意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中旬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夕，数次前往住广州东山的鲍罗廷寓所，商谈大会各项事宜。当时瞿秋白亦住在这里，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和各种文件正在这里草拟。（张国焘：《我的回忆》）

15日 《北大日刊》刊登校长启事，聘请李大钊等为校庆二十五周年纪念册编辑导师。

18日 《北大日刊》发表公告，公布改选校教职员临时代表团结果。大钊同志当选为二十四名代表之一。

20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日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五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其他四人是：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

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早在大会开幕之前，大钊同志就与廖仲恺等协助孙中山进行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21日 大会继续举行。

是晚赴鲍罗廷寓所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应取的立场和步骤。出席的还有谭平山、瞿秋白等。（张国焘《我的回忆》）

23日 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用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

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生计。”（《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五期）

28日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意见书》。

早在筹备改组国民党时，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人，曾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反对孙中山容纳共产党的政策。本日当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右派又进行捣乱，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所谓“党中有党”以排斥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这个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李大钊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发言并印发了这份《意见书》。

《意见书》严正阐明了我党的立场，指出。“我们相信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了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固有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意见书》申张了正义，驳斥了右派，在会上发生了强烈影响。

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经过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努力，最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提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

30日 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于本日进行了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的选举。执行委员共二十四人，当选的其他共产党员为谭平山、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中有共产党员林祖涵（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沈定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31日 参加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执、监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组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确定了各部部长人选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等地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指导当地党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本月21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1870—1924）逝世。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知列宁逝世的噩耗，以极为哀痛的心情，立即宣布休会三日，各行政机关一律下半旗致哀并以大会名义电唁苏联政府。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隆重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孙中山主祭并亲手题了“国友人师”的挽额。

同时全国各革命政党、进步团体也举行了广泛的悼念活动。

## 2月

7日 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等联合举行的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的大会上发表演讲。随后发表在本月16日出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号”上，题为《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署名李大钊。

本文指出：“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文章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争自由、表现出来的伟大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指出：“二七”证明了“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京汉路的流血，已经“埋下第二次命革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二七’被难的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在指引着我们“向前革命，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15日 大钊同志联合北大教授四十七人，联名写信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敦促迅速恢复中俄邦交。（《晨报》2月16日）

29日 《北大日刊》刊登注册部布告（二）李大钊先生刻已回校，下星期起，照常授课。

大钊同志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历时近两月，已经返回北京。

本月 据《京报》23日报导，全国铁路工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十一路代表共计四十余人出席。大会发表了宣言，选举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表示了铁路工人在我党领导下，已从“二七”的创伤中站立起来。

### 3月

8日 中共北京区委于本日进行改组，由大钊同志担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张昆弟主管劳动运动，何孟雄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范鸿劼任会计……。（“北京区委在24年5月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央文件汇编》）

中共北京区委成立于22年。大钊同志在主持北京区委的工



作中，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各次斗争都集体讨论确定方案。对同志十分信任、对干部放手使用。他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况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应比家人还亲”。在叮咛工作时，他常爱说的口头语是：“大而化之，你瞧着去办吧。”他从不搞宗派，反对盲从……因此“数以百计的干部，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很少降敌……”大钊同志的领导作风足称楷模。（罗章龙：《亢幕义斋回忆录》）

13日 大钊同志联合北大教授四十七人，再次联名写信致顾维钧，敦促恢复中俄邦交。

同时领导北京各阶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请愿、游行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外交，要求从速签订中苏协定。北京学生联合会在致顾维钧的信中声称：“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势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晨报》3月22日）

30日 在北京主持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在大会发行的《列宁纪念册》上刊有署名李守常，题为《列宁不死》的纪念文章。

文中推崇了列宁的伟大人格。再次指出：“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列宁的功业，“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因此列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他的主义将永垂不朽。

文章还指出，列宁“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认识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侮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谤毁以后，亦几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 4月

20日 根据国民党第一次执委、监委会议决定，国民党北京

执行部成立。在北京织染局二十九号，分设各部办事处，开始办公。

主要成员有：

一、秘书处：

常务委员：丁维汾、王法勤、石璞。

二、组织部：

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

三、宣传部：

部长：马叙伦；秘书：邹德高。

四、青年部：

部长：于树德；秘书：邓飞黄。

五、调查部：

部长：王法勤；秘书：潘云超。

六、妇女部：

部长：褚雪松；秘书：缪伯英。

这个机构虽然成立，但由于当时直系军阀的迫害，大钊同志不久离京及经济困难等因素，致各部的活动未真正展开，惟秘书处常务委员，仍寻觅秘密地点，指挥各省市筹备员，秘密进行筹设各地党部。

本年11月起，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变动为丁维汾、王法勤、于树德。秘书路友于。这个常务工作班子至25年2月又有变动。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合订本第十号)

本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我党曾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工作。在北京执行部成立不久，天津和直隶省党部先后宣告成立，随后又在保定、唐山、石家庄等北方广大区域建立了国民党地方党部。这些机构大部都是以共产党

员为骨干建立的。如于方舟负责组建国民党顺直省党部并任执行委员。于树德负责在天津一带，韩麟符在内蒙等地进行发展国民党的工作。河北的共产党员刘秀峰担任了保定市国民党党部组织部长……。我党利用这个合法地位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

## 5 月

1 日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二十四期发表《这一周》一文，署名守常。

文章在介绍了5月第一周的四个纪念日（即：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节；5月5日伟大革命先驱马克思诞生纪念日；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以后着重指出，“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回思过去一切的痛史，以作国民的薪胆，大声疾呼的向国民喊到：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唯一的仇敌！”我们的口号是：被压迫民族及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

9 日 出席北大评议会第三次特别会议。据查这是大钊同志最后一次参加评议会。（《北大档案》）

13 日 下午在北大第三院第一教室为北大政治学会作题为“人种问题”的演讲，由刘伯青记录。发表在6月20日出版的《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

本文解释了“人种”、“民族”与“国民”的概念，介绍了西方学者的民族观和人种学说以及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主义含义解释的发展演进。尤为重要的是，指出了人种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世界上关于人种问题发生的斗争必定与阶级斗争并行，为阶级斗争所制约。这已为俄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

20日 晤见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归来的张国焘，告以北京军阀政府即将进行大逮捕，令其从速收拾文件，加以躲避。(张国焘：《我的回忆》)

21日 张国焘违背大钊同志指示没有及时躲避，于本日晨在其寓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杨子烈等四人。

张国焘被捕后，供出李大钊、张昆弟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反动政府因而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晨报》3月)

下旬 由李葆华陪同往昌黎五峰山避难。

大钊同志从北京动身前，剃掉了胡子，扮成生意人的模样，父子两人从北京搭京奉晚车，次日天蒙蒙亮到达昌黎。下车后，直奔山里，住在看守韩昌黎祠的老人刘克顺家。为避免军警侦查，他整日都在屋里看书写文章。(李星华：《父亲和昌黎五峰山》

《河北日报》1979年11月7日)

本月 大钊同志离京的当天晚上，警察总监王怀庆派便衣特务到铜幌子胡同甲三号的住宅进行搜扑。这时夫人赵纫兰不得不带领孩子们回乐亭老家，不久反动军警又追到乐亭缉拿大钊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李夫人十分担忧，写信与大钊同志商量，说她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白设法取消通缉令。大钊同志当即回信指出：“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接着他又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最后，大钊同志满怀信心地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李星华：《五峰山二次避

难》《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6日)

这封信充分表现了大钊同志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同月 《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的第五十一种出版发行。

大钊同志一直把史学领域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史学要论》就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述史学理论的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书中指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简言之“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它是有“生命的”、“活的”、“进步的”，“周流变动”的，决不是呆板的陈编和故纸。过去那些浩瀚的史书、典籍，不过是历史的记录和研究历史的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

又指出“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从来的史学家，单从社会的上层（特别是政治变动）说明社会的变革，而不顾社会的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从它的基础，即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经济关系去考察，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

大钊同志在本书中把历史比作一座高楼，里边陈列着人类历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他认为只有登临这座高楼，才能清楚地认识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然而要攀登这高楼，必须要有一双脚踏实地的健足。也就是说研究历史必须具备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要点有二：“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凡事不盲目轻信，必须找出确实的证据，在此基础上阐明的道理，才能接近于真理。他谆谆告诫我们：“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

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和作一切事所应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月 31 日，据《晨报》消息，中苏协定于本日在北洋政府外交部，由顾维钧与加拉罕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字，至此正式恢复两国邦交。

## 6 月

4 日 北大第十次评议会通过决议，代表教授致函教育部，质问通缉李大钊事，不得随意毁谤教授。

本决议于 8 月 7 日以北京大学公函形式致教育部。

内容为：“敬启者，顷据本校评议会函开：近阅报载，内务部以工党一案，与本校教授李大钊有关，业经明令通缉，并有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等语。阅竟之余，殊深诧异，查李教授大钊从事本校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函请校长转函教育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如谓李教授大钊有犯法实据，请从速据实宣布，以释群疑。并请教育部提出国务会议，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想教育部有维持国家学术之责必能赞同斯意，急图挽救等情。理合据情，转陈恳祈”。（《北大档案》）

11 日 反动军警在北京和乐亭两地搜捕大钊同志扑空之后，又于本日由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发“海捕文书”密令各省

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查照办理，“严速拘拿”李大钊等人。

其内容如下：“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况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扶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扶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廖佩英等。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等因到部，除分行外，相应密咨”。（《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9）

同日 写《新闻的侵略》一文，发表在本月18日出版的《向导》第七十一期上，署名：T.C。

文中揭露英国路透社记者放出孙中山先生逝世的谣言，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遍设新闻机关，兴风作浪，造谣惑众，进行新闻侵略之严重。指出：广州政府驱逐路透社记者出境是“正当处罚”而且“中国政府应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

上旬 在避难期间，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大钊同志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旬 启程赴苏。

出国之前，大钊同志曾秘密回到北京，约集其他代表先后出发。途中曾在哈尔滨停留三日，住道外太古街路南“宏昌茂”杂

货店王芳田处（王系大钊同志的同族哥哥李景瑞的好友）后自哈尔滨经满洲里赴莫斯科。（《新港》1959年第五号）

17日 自本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钊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

据罗章龙回忆，当时上海中央派遣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代表团主要成员为：中共三大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罗章龙、中央委员会常委王荷波，中央委员兼北方局书记李守常以及其他代表人员共十余名。（《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六期）

又据刘清扬回忆，出席大会的代表，除前述几人外还有姚作民、彭泽湘、卜士琦（彭、卜二人为青年代表，后均叛变）及妇女代表刘清扬等。代表团团长是大钊同志。出席大会的身份证是一块白绸子，上有红字，介绍××参加大会。（1960年访问刘清扬记录）

本月 16日苏联帮助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这是一所培养革命军人的新式军校，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我党积极参加了该校的工作，不少共产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主任，聂荣臻、肖楚女、恽代英等任教官。

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委，积极支持了黄埔军校的工作，曾先后选送大批优秀青年赴黄埔军校学习。

## 7月

1日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做报告。（报告以琴华（UUHXa）的名字载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79年译出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第六期）。



报告列举大量事例，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明“中国人民一方面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军阀的存在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决定的，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对两者都要反对。”

接着阐述了我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着重介绍了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它与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它所通过的政治纲领的要点。

最后指出：“我们在国民党中间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派拉到我们这一边，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一支革命的先锋队”。

19日 《北大日刊》发布24至25年度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内载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担任现代政治课程并指导学生演习。

本月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大钊同志留下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期间，聂荣臻等人回国工作，行前大钊同志曾亲自谈话，交待任务。同时，在苏联还进行了参观、讲学活动。（1960年访问刘清扬记录）

同月 彭湃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它是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自24年7月至26年9月共举办六届，培养了七百七十二名学员，第六届主任为毛泽东，这一届规模最大，办得最好。大钊同志曾从北方各省选派大批优秀青年参加了这届农讲所的学习。他们毕业后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访问杜松寿等人的记录）

## 8月

本月 在逗留苏联期间，曾到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游览休息，住东方大学宿舍。并参观访问了苏联少先队的活动，了解革命后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李大钊选集》512页）

同月 冀东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乐亭县支部成立。

年初，大钊同志派北大学生、共产党员王岑伯回乐亭县，创办乐亭中学，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农村党组织。于本月在乐亭县成立中共党支部。（李运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河北日报》1979年10月29日）

## 9月

4日 于莫斯科写《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发表在本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付刊“觉悟”上，署名守常。

这是大钊同志在苏联期间写的一篇通讯，叙述了他在苏联参观的一些见闻及革命后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关切。

月初 去列宁格勒参观，住“国际海员之家”。

又参观劳动宫，访问列宁格勒职工苏维埃。

又参加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工人代表大会。

又参观列宁格勒近郊儿童村举办的少年国际的活动。（《李大钊选集》511页）

28日 在莫斯科写《上海的童工问题》，发表在25年4月《中国工人》第四期，署名守常。

这是大钊同志从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和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第十九卷第八号上，所载关于上海童工的资料，加以摘录的。

在上海的外人自治会对上海童工的情况做了一次调查，其主要情况是：雇用童工的工厂共二百七十五个。（其中日本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意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二，华人营办一百九十。）童工总数为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含有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童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

本文还扼要介绍了在棉厂、丝厂、烟厂、火柴厂工作的童工的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

大钊同志说，在苏联看到儿童的幸福生活，就想起了陷入黑暗生活的这十七万幼年群众。因而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引起上海的劳动团体和青年团体的注意，设法改善他们的境况。

## 10月

25日 冯玉祥在北京举行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统一大事。

在本年九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树起反直旗帜，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贿选总统曹锟，发表了一定程度倾向革命的政纲，并将自己所部改称国民军，从而使北方形势发生了某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

冯玉祥的部队原称西北军，在直系军阀中属于比较进步的队伍。北京政变前后，北京区委把这支部队作为兵运工作的重点，大钊同志本人曾多次亲自对冯玉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到这支部队中，从事革命的政治工作，在士兵和下层军官中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而对这支部队的政治倾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考访问刘贯一记录）

## 11月

由于北京政变后出现的新形势，大钊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激情，于本月回到祖国。（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返国途中，又曾留住哈尔滨王芳田处。同行者有袁子贞（河北霸县人在欧洲工作的华侨）。据王芳田回忆，当时日本人办的《盛京日报》登过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对大钊同志的通缉令，因此王芳田曾劝说他不要回北京，还是先到别处暂避一时为好。但大钊同志微笑着说：“哪个革命者不被通缉，干革命还能怕通缉吗！”这样，就又回到了北京。（《新港》1959年第五期）

本月1日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联名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请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又联合皖系，组成了以段祺瑞为执政的临时执政府。同时，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势力也乘机而入，使北方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

以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斗争策略。

10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对内扫除军阀，使之永不复起，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申明接受我党于23年6月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

13日，孙中山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19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重申关于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发出急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号召，并指出国民会议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目的是：对内成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的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全国人民在统一的革命目标下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

## 12月

下旬 大钊同志回国后，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大钊同志负总责。成员有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领导整个北方广大地区（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内蒙等地）的工作。发行机关刊物《政治生活》。

早在党的“一大”之后，北京最初由共产党小组而建立支部委员会，22年成立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党组织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基本上是沿几条主要铁路干线伸延进行的。以北京为中心，向东经天津而唐山、锦州、沈阳、哈尔滨和大连；向南经保定而石家庄、邯郸、郑州；向西经南口而张家口、太原、榆林、延安、西安等等。到此时，仅据河北省的不完全统计：除在北京、天津、保定、唐山等地建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外，还在石家庄、完县等地建立有九十七个县委、特别支部和支部，党员人数迅速增加。

党的北方区委就是为适应形势的这种发展建立起来的。（据访问罗章龙等的记录）

31日 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

孙中山扶病入京，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了北京各界十万人的盛大欢迎。孙中山发表了《入京宣言》，指出：“满清虽倒，而国民之

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在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此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参见魏宏运，《孙中山年谱》）

本月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各进步团体纷纷参加筹备国民会议和迎接孙中山北上的活动。至12月上旬，北京已有二百余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晨报》《京报》12月）

## 1925年（三十七岁）

### 1月

4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经一个月的筹备，于本日下午在北大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并定名为“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6日，在虎坊桥阅微草堂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三十余人，路友于主席报告加入团体已三百。”

会上，选举了大钊同志的助手，共产党员朱务善以及顾孟余为总务主任。（《晨报》1月6日、7日）

17日 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讲演。他在讲演中首先“详述葡萄牙、荷兰等国势力东侵之历史，因英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甚，叙之尤为详尽。”接着，分析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经验教训。赞扬了孙中山先生“现在看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祸患，高树国民革命的旗帜，以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号召”，并热切希望“全体国民都应在此旗帜之下，努力奋斗。”最后，针对一些人认为反帝是否会导致如同义和团笼统排外的疑虑，郑重指出：“这其实是

一个错误，现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仅仅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反对他们全体人民”。（《京报》1月20、22日）

这次讲演大会是由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举办的。大钊同志的讲演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主张。

21日 下午3时，主持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的北京各界纪念列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千多人，“场中共产党及青年团员极多，并散发各种传单及列宁纪念相片。”担任大会主席的大钊同志，在开幕词中，“略谓今日为列宁周年忌日，我们今天开会纪念他的意义，因为他是世界革命指导者，同时又为东方被压迫者的良友”，“致词毕，全场起立，由乐队奏演第三国际歌。次由赵士（世）炎报告列宁事略……”大会结束时，大钊同志请全体起立，带领全场高呼：“列宁主义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京报》《晨报》1月22日）

22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这次大会于11日召开，出席的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五十人，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

这次大会上，大钊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月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遂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加委李大钊、于右任、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等为政治委员，以代替孙中山在治病期间处理一切政治事务。

中央政治会议每星期开会两次，此外还有一些临时会议。会议往往在上午举行，大钊同志均按时到会。在会上，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对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员的企图，作了有原则有策略的斗争。（李大钊：《狱中自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八号；张国焘：《我的回忆》）

同月 资产阶级右翼份子胡适决定参加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14日《京报》载有胡适致许世英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 2月

1日 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根据段祺瑞颁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列席善后会议的资格是：（一）大有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领袖；（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府聘请或特允者（但不得逾三十人）。这是与国民会议相对抗的一个会议。

善后会议的召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大钊同志领导北方人民开展了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

23日 《北大日刊》第一版登载的注册部布告说：“李大钊先生现已回京，原授之史学思想史定于下星期一起开始讲授，……一、此项课程于半年内讲完，二、讲授时间：星期一第一时、星期六第一时、第二时共三小时。三、地点：第一院十四教室。”

这是指大钊同志从苏联回国后，继续在北大任教。

本月 发表《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文，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二七”二周年纪念册》，署名守常。

本文总结了“二七”斗争的经验，并向工人群众发出继续战斗的革命号召。文中写道：“京汉路工热烈奋勇战斗的精神……已开了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第一幕”，“显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和位置。”“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因此，“工



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同月 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于7日在郑州举行代表大会，并组织了“二七”纪念活动。

### 3月

1日 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在会上作了演说，“略谓：真正国民会议之召集，非由诸位代表回去在工人农民中组织宣传不为功等语”。

出席开幕式的各地代表共八十九人，列席百余人。邓颖超作为天津代表参加了大会，并被推举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京报》3月2日）

7日 大钊同志面告当时铁路工人运动负责人张国焘，段祺瑞政府的警探已探出他的住处，令其立即离京。第二天清晨，张国焘在铁路工人掩护下，悄然出京南下。（张国焘：《我的回忆》）

8日 出席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二十多个团体发起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京报》3月9日）

又，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张继等于本日召开会议，成立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企图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排挤出去。（《晨报》3月9日）

10日 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到会二十余人。

会议首先讨论了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种种办法。会上，“以于树德，李大钊二人发言最多，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开会成立时，到会人数竟有两千以上，实为不可轻视之举动。而同志俱乐部之总章内，载有跨党者不准入会一条，明系反对共产之表示。如果任其成立，未免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本上发生影响，非设法抵制不可云云。”

在大钊同志等提议下，“当议决登报否认该俱乐部为本党同志所组织，与本党毫无关系，以免误会。”“又以于右任及张继二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是日不应加入同志俱乐部之大会内。应向于、张二人提出严重交涉。”

会议还提议：“自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京之后，因无武力可借，不能发生强制效力。一般党员，已不受执行委员会之支配，危险情形，不堪设想。现值广东陈（炯明）军完全失败。不如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会广州，将来全国执行委员会，仍在广州举行。俾有所凭藉，易于支配云云，此项提议已一致通过云。”（《晨报》3月12日）

这次会议在大钊同志等坚决斗争下，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打击。

11日 下午2时，中国国民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欢迎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钊同志出席并作演说。（《京报》3月12日）

12日 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大钊同志参加了治丧处秘书股的工作。“秘书股主任：汪精卫……，中文主稿：邵元冲、谢无量、李守常、吴玉章、路友于……”（《京报》3月14日）

16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三次大会，会议议决组织四种委员会：（一）国际问题委员会；（二）内政问题委员会；（三）财政问题委员会；（四）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聘请大钊同志担任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京报》3月17日）

19日 上午11时，孙中山灵柩“由铁狮子胡同行轍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内。由国民党员分组举柩。”大钊同志分在第二组。（《京报》3月19日）

又，在孙中山逝世期间，大钊同志作了“挽孙中山联”。全文

如下：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夺，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哀思录》第三编）

20日 出席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四种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京报》3月21、22日）

同日 教育总长王九龄签发的教育部第71号训令中说：“据宪兵第二营报称，北京大学首倡共产党李大钊，字秀昌。现住该校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并不日开会议决进行手续之消息等情，据此，当函复该司令部加意严密侦察，随时报告。兹据报称，于本月九日据第二营续报，探闻北京大学共产党首李大钊于昨晚在该校第三院寄宿舍召集党员密开会议之事，其宗旨系令各党员分派成组，密住京师中学以上各校，运动学生加入该党等情。……”令北京大学“即便遵照，严密查察，认真防范，是为至要……”

（《北大档案》）

22日 在大钊同志及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北京印刷工人举行大罢工。织布、造纸等厂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晨报》3月24日）

23日 《京报》载：北京市民孙中山主义宣传大会交际股，接洽李大钊，杨杏佛、李石曾、顾孟余、吴稚晖等，“请其担任在各大学及公共场所轮流讲演孙中山先生之事略及学说。”

27日 上午，在北大红楼会见北京印刷工人代表，并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成立“工人同志会”的问题。

工人代表走后，会见了在北京工作的陈毅，听取了陈毅关于军事消息的汇报。接着，又会见了作青年工作的刘弄潮，对他去东北如何开展工作作了指示。随后，和他谈起了鲁迅，并嘱他去看望鲁迅。

下午，主持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会议。（《百科知识》1979年第二期）

29日 上午，在北大红楼和陈毅谈论唯物辩证法的应用问题。少倾，刘弄潮赶到，向他汇报了昨晚会见鲁迅先生的情况。（《百科知识》1979年第二期）

30日 北京大学发表声明，该声明说：“据京师宪兵探报，三月九日晚，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寄宿舍召集党员，密开会议，并称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居住等语，查本校第三院并无寄宿舍，第三院教员休息室，亦向无人住宿，九日晚间亦无人在第三院开会，该项训令所载探报，显系讹传……”（《京报》3月31日）

本月 大钊同志致函中共中央，报告了孙中山立遗嘱的整个情况。（张国焘：《我的回忆》）

在追悼孙中山的三天活动中，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北京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发动几十万人参加活动，散发三千多份《政治生活》（特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宣传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

同日 发表《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载北京《民国日报》，署名李守常。

文中指出蒙古民族在辛亥革命前，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蒙古王公的封建制度及喇嘛教的四重压迫之下。辛亥革

命后，“中国国民党虽曾努力于国内诸民族平等的结合”，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勾结，“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

接着引述了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从而说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即从此数语为归。”

最后写道：“中国国民党续遵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遗训，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愿与蒙古国民党共为两民族作自由联合的介绍。两民族的民众，盍兴乎来！”

## 4 月

16日 下午1时，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长街教育会举行闭幕式。刘清扬任大会主席，“朱务善，邓颖超等相继演说。”会议在高呼“国民会议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等口号声中闭幕。（《晨报》4月17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历时一个半月，由于政权掌握在反动军阀手中，会议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它教育了群众，揭露了敌人，传播了革命主张，对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高潮，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8日 收到北大学生鄢祥提给蒋梦麟并转顾孟余、胡适、马夷初、李四光、李大钊、高一涵的信一封。（《北大日刊》4月18日）

30日 《北大日刊》载蔡元培3月31日自欧洲写给蒋梦麟的信。信中提及，请转托大钊同志“婉告俄人及留俄之华人”，他因健康关系，临时取消了访俄计划。

本月 大钊同志召集陈乔年及印刷工人等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第三教室开会，讨论成立印刷厂，为党印刷刊物等事。

据参加会议的印刷工人刘明（鉴堂）回忆：“……这天到会的有陈乔年、陈楚梗（化名陈昌华）、陈为人，刘抵如和我五人。开会前，李大钊同志很谦虚的向我说：‘你就是刘明吗？’我说：‘我就是刘明。’大钊同志说：‘我们要建一个印刷厂，主要是印《响导》、你们把这工作做得好点快些。’他跟着说：‘我有点事，你们几位谈罢。’就离开走了。开会由陈乔年主持。……印刷厂开工后，主要印刷《响导》《政治生活》及传单等……。”（《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一期）

同月 宣化皮工五千余人举行罢工。

## 5 月

7日 中共中央局在“关于国民党二次大会，广东政治问题，建议本党北京、广州临时委员会及训练人材等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局离京广甚远，不能直接指导，决定由中局指定中委二人会同当地书记外加技术委员二人组成临时委员会。……开封办一民党宣传学校，守常、麟符、永滋负责。”（《中央文件汇编》）

本月 1日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在广州开幕。

同月 在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

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于14日，再度罢工。15日，日方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杀伤工人十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斗争。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这一斗争转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于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国主义的大

示威运动。

这一天，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举行反帝大示威，号召收回租界。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抗议枪杀工人。英国帝国主义巡捕悍然开枪，打死十一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立即实现了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运动很快遍及到北京、广州、汉口、南京、重庆、香港等许多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怒潮，从而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 6 月

3日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愤怒的北京人民立刻沸腾起来。在大钊同志及北方区委领导下，迅速将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展开反帝斗争。这一天就有五万多群众参加示威游行。

5日 成立了有四百八十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推举大钊同志的助手、共产党员刘清扬等三十人为临时执行委员”，（《晨报》6月4、6日；“访问刘清扬记录”）

10日 北京举行了二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参加的团体有“国民党北京市党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辛店总工会”“京汉铁路工会”等几百个。四郊农民也第一次赶来参加。

游行前，二十多万人齐集天安门召开了五卅运动中第一次“北京国民大会。”党对这次大会作了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会场上搭起了五座讲台，同时进行演讲。刘清扬为中央台主席。她“用传声筒说明筹备经过，并谓到会诸君皆系有心肝尚未死去之

同胞，请愿念上海被惨杀同胞，誓雪国耻……台下掌声如雷。”

“主席宣告请众脱帽，静默五分钟，以志哀悼。万众无声，俯首垂泪”，“逾五分钟，有上海工界代表孙宗防报告英日巡捕惨杀同胞经过，声泪俱下，泣不可仰。台下群呼‘为工界同胞报仇！报仇！’……大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最后，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言》写道：“……本大会除纠合全京市民，愿为全国先驱，一致援助被难同胞，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外，尤希望全国同胞悼念死者为国捐躯，熟察己身之日处危境，一致奋斗，誓不摧挫英日，打倒帝国主义不止。”《宣言》庄严宣告：“自惨案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

这次大会在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领导下，开得极为成功。

会后，二十万群众冒着滂沱大雨游行二十余里，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气概。（《晨报》6月11日，《京报》6月16日）

同日 中共北方区委发出《告国民书》，以指导这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25日 为全国总示威日，北京各界三十万人游行示威，“冒暑游行六小时，奔走数十里。”“尤可注意者，参加游行以工人为最多，学生尚居其次。至下午天安门之追悼大会，则痛哭挥涕者亦以工人为最多。”（《晨报》6月26日）

30日 北京五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一说二十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朝鲜、印度、土耳其、日本，德国等国代表应邀出席大会。共产党员刘清扬、朱务善以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均参加大会并作演说。会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震动了全场。（《晨报》《京报》7月1日）

本月 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一直坚持到1926



年10月，为支援北伐而自动结束。这次大罢工历时十六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 春 夏 间

五卅运动中，大钊同志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群众革命运动。

五卅运动前后，大钊同志派了一批蒙古族党员回内蒙开展革命运动。从湖南调到北方工作的肖三，由大钊同志派往张家口搞地委的工作。（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第七期；“访问肖三记录”）

又，北京成立了第一所区委党校，来自各地的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各地工作。大钊同志对于区委党校的工作给予很大的重视，常亲临指导。

区委党校成立时，校址设在北京新街口蒋养房内，年底，迁北京大学第三院。罗亦农曾任校长。（访问刘清扬记录，访马润民记录）

据当年参加过区委党校训练班的杜松寿回忆：“约在1925年底1926年初，大钊同志主持了北方区委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训练班……训练班授课地点设在北大第三院一个小礼堂或大教室，人数约在二百人上下。训练班请了当时的马列主义专家学者和在领导岗位上的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讲课。大钊同志讲课次数最多，……他讲课解说生动，语调激愤，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和强烈的感染力。另外，还有陈启修、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陈为人等……这些教师大部份以后都去了广州，成为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师。……大钊同志通过训练班

培养的革命青年既壮大了北方地区的革命力量，也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选拔了人材。”（杜松寿：《回忆李大钊同志》）

## 8 月

14日 讽刺小品《拆穿西洋镜》脱稿，发表于11月16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五期上，署名冥冥。

文中辛辣地讽刺了一个“挂起艺术家招牌”，招摇过市的人，把其丑恶的灵魂暴露于众。

本月 国民党左派廖仲恺20日上午11时，在广州遇刺身亡。

## 9 月

7日 发表《北京有两种电车》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晨报》上的“北京”专栏是24年12月开辟的。自本日至26年8月止，前后共发表二十五篇署名明明的短文。这些短文是否确系大钊同志所作，需待进一步考证。

9日 发表《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一文，载《政治生活》第五十期，署名猎夫。

又，发表《为何叫小孩在街拉屎》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1日 发表《京官不可不做》《北京的路灯》两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5日 发表《非抽这种烟不可》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6日 发表《拍掌叫好》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

署名明明。

17日 发表《缠足是干什么?》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6日 发表《言无二价》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本月 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出通告:“各校同学应一律武装起来,组织大规模的学生军。”“暑假留校同学已行动起来”,“要求在开学两周内,把学生军组织起来。”(《晨报》9月5日)

在党的领导下,在学生军的基础上又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准备进行革命的武装战斗。

同月 国民党北京全体党员于12日下午在民国大学礼堂,召开了廖仲恺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执委于树德任主席,到会五千余人。(《京报》9月13日)

## 10月

4日 发表《邮政局里的洋价》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4日 发表《大减价》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7日 发表《他是中国人么?》《早婚与矮子》两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5日 下午1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二百多个团体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召开了“关税自主运动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等口号。“游行秩序,甚为整齐,外人参观照像者甚多,至5

时许始散会，当场所散传单有二十余种之多，语极激烈云。”（《晨报》10月26日）

26日 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举行所谓“特别关税会议。”

在大钊同志及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多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当队伍行进到新华门前，遭大批武装警察的阻挡。“北大教职员学生为前导，一时呼声震天地。学生至是当奋勇前行，有如潮涌，警察以枪柄阻学生，并夺学生大旗两面，学生亦以旗杆还击。旋又有人拾瓦砖互击，两方击战半小时，计伤学生警察各十余人。……警察当场捕去北大学生数人。”

会后，游行大队“沿途高呼：‘反对关税会议’‘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所散发传单，约有百余种，计数十万张。”（《晨报》10月27日）

本月 大钊同志由赵世炎陪同赴张家口参加内蒙“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

“工农兵大同盟”是北方区委根据内蒙的特点组织起来的团结蒙、汉各族劳动人民进行共同斗争的群众性组织。大钊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并作了报告。大会选举大钊同志为“工农兵大同盟”书记，赵世炎为付书记，吉雅泰、张治平、陈印潭、李若愚等为委员。

在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内蒙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八辑）

同月 为加强北京地区（括包天津、唐山、山西等地）工作的指导，经中央决定，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分开。

## 11月

14日 发表《夜市上的买卖》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8日 发表《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一文，载《政治生活》第五十八期，署名猎夫。

本文分析了国民军、直系军阀、奉系军阀三个势力的“三角关系”。肯定了民众的巨大力量，但对这种“三角关系”的发展趋势估计不够准确。

19日 发表《公寓的写真》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于树德、丁惟芬、王法勤、于右任等。该电严驳西山右派会议如下：“（一）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体会议，只能在广州开会，已经议决在案，前已定期开会，何得违反决议；（二）此举显然未得北京执行部之同意；（三）熊克武已因通敌被捕，听候审判，何得通电请其来京，公然违反中央决议及政府命令。以上三点，以中央委员而举动若此，可耻孰甚，惟冒签之事，已成习惯，望北京执行部诸同志，切实查明，如系冒签，请复电声明，其主动者应提出惩戒。”（《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十一辑，《京报》11月27日）

2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于树德、丁惟芳、王法勤、于右任等，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北上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将邹鲁交北京执行部查办。（北上外交代表团由林森、邹鲁率领，于10月16日到京，邹鲁系参加西山右派会议成员之一。）（《京报》11月27日）

同日 发表《减而不减》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

署名明明。

22日 下午1点，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大会”，参加大会的团体有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总工会、北京工人雪耻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参加大会的，“约计五万余人，其中以劳工为最多，又为最热心。”到会群众高呼“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欺骗的关税自主通过”“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随后，举行了大游行，并与警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京报》11月23日）

同日 发表《长安街上的新剧》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7日 国民党右派林森、覃振、居正、邹鲁等于23日在北京西山召开了反共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本日，大钊同志等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20、21日急电在《京报》上公开登布，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

同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芬、恩克巴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致电各级党部、严驳“西山会议派”。（《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十一辑）

28日 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行政委员会”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大钊同志领导了这次斗争。

“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所有群众即齐集于神武门前，到者以学生工人为最多。北京总工会领导，多数工人臂缠红布参加此会……主席宣布开会后，群众即整齐队伍向执政府进行，当时执政府已停止办公，群众遂转赴段氏私宅……”（《响导》（影印本）

-四〇期）

29日 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

政权，由国民裁制”，“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记北京民众革命运动》，《政治生活》第五十九期）

首都的民众革命运动，由于“第一：国民党右派的告密，……第二：国民军首领的犹豫”，“原定计划并未能达到。”（《响导》（影印本）一四〇期）但它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力量，给反动军阀以沉重打击，做了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响导》（影印本）一三八期）

同日“西山会议派”在《京报》上刊登“紧要启事”。启事说他们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有议决各案，系本党生死存亡，一切议决之效力，当然拘束各地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并声言“久为共产分子把持之北京执行部”在《京报》上的启事是对他们的“虚构侮蔑”。要“海内外忠实之同志一致声讨破坏本党之分子，并拥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之一切议决”。

《京报》同一版刊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发布的“通告”。通告说：“本月24日接中央贺电，嘱本执行部查明召集西山会议，铄电内列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扬、邵元冲、邹鲁、戴季陶、叶楚沧、沈定一、张继、谢持、吴敬恒、茅祖权、付汝霖等是否本党赞成，抑系冒签，并嘱查明此次会议之主动者以凭核办等因，除分别函达外，以上各人如系被人冒签，可于五日内登报声明，或具函本执行部声明，又各同志凡深知西山会议之内幕者，亦请函告本执行部，以凭转电中央为要，特此通告。”

本月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6日《晨报》上刊登“十月革命第八周年纪念大会启事”：“本月七日为俄罗斯十月革命第八周年

纪念日。俄国十月革命，开民族解放之先声，得劳动者奋斗之胜利。世势一变，历史为荣。兹特定于是日（星期六）下午1时假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纪念大会。……尚望各界人士，届时蒞临为幸！”

## 秋

蒙族党员吉雅泰来北京向大钊同志汇报内蒙开展革命运动的情况，大钊同志做了重要指示。他要求在内蒙工作的同志多作实际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发展和团结一切进步势力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废除王公扎萨克的封建特权制度。（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第七期）

又 大钊同志把许多青年送往苏联或送往黄埔军校学习。

据李运昌回忆，1925年秋，乐亭县党组织介绍他到北京找大钊同志，准备赴苏联学习。“我在北京市翠花胡同找到了大钊同志……他看完了信，说道：‘赴苏联的船从天津已经开走了。现在黄埔军校派人来北京招生，你去报考黄埔军校吧。在那里要好好学习。’……”（李运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河北日报》1979年10月29日）

## 12月

2日 西山会议派发出通电，非法宣布取消共产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党籍。电内称：“查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即林伯渠）、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各依议决开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十一辑）



15日 发表《得罪后再借光》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5日 本日《京报》刊登了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公开名人演讲大会启事。”

启事说：“兹定于25日下午2时假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敦请吴雅晖……李守常、肖子升、赵世炎诸先生演讲帝国主义的基督教侵害中国种种情形及补救方法。务希各界同盟踊跃往听是盼。”

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及各区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同时在《京报》刊登“紧要启事”，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

北京执行部的紧要启事说：“……查近日谢持、邹鲁等复在各报冒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大登广告，声称取消共产派党籍，并将全部党员重行登记，分别去取云云，纯系冒用名义，违背党纪，本执行部除将彼等行动报告中央提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外，特此声明，俾党内外咸知真相。”

北京特别市全体党员大会紧急启事中说：“本特别市全体党员于24日开全体大会，一致否认违法之西山会议及所妄发之宣言、通告，除急电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厉惩办外，恐各界人士不知内情受其欺骗，特此郑重声明。”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及各区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启事中说：“查有谢持、邹鲁等少数叛党分子前曾盗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集非法会议，妄发宣言，近日又冒名登报声称解散本特别市各级党部，实属破坏本党，违反纪律，除由党严办外，特函辨明，免滋疑误。”

30日 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连载《政治生活》第六十二期至六十七期（25年12月30日至26年2月3日），署名守常。

这是大钊同志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一篇重要论文。文章用大量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对中国农民及土地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指出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作用，号召革命青年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明确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本月 大钊同志听取了楚图南关于云南工作的汇报后，要求楚图南立即赴东北工作，并转达他对东北工作的一些意见和指示。（据楚图南的回忆）

同月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出兵东三省的侵略行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等八十多个团体，31日在天安门举行了国民大会。

## 冬

在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领导下，京东七县组织了农民协会。同时，还领导了山西一些县份和内蒙呼和浩特等地的农民革命斗争。（李星华1979年6月18日谈话）

## 年 底

大钊同志派耿炳光去陕北巡视工作，于26年初在绥德成立党团地委。（《陕西省近百年大事记述》）

1926年（三十八岁）

1月

1日 下午3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在翠花胡同八号举行元旦升旗典礼。大钊同志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的身份，参加并发表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说。（《顺天时报》1月6日）这篇演说，发表在《国民新报》副刊第卅一号上。

他在演说中，回顾了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以来，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以及孙中山对北方革命青年的希望，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挑拨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谬论，号召“国民党中的同志，不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抑是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披肝沥胆地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他指出：“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徵，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徵。全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李葆华回忆说，这次升旗典礼是针对国民党右派另立伪市党部的分裂行为而举行的。“这天父亲回到家里以后，向我们讲起同国民党右派的这场激烈斗争。他说，右派只讲‘青天白日’，那怎么行！我们还要‘满地红’嘛。”（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同日 北京总工会经过八、九个月的酝酿，宣告正式成立。5日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北京总工会不独是保护工人利益，防止资本家等反动势力进攻的武器，并且是整顿工人队伍、联合全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求工人根本解放的机关。”（《晨报》1月6日）

6日 在《政治生活》第六十三期上发表《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一文，署名守常。

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决不能有真正的和平，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常有战争的危險潜伏着。尤其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他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今日，战争的危險更是一天一天的逼紧。”“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恐怕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文章号召：“中国的民众应该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众，起来反对这残忍的战争。”

同日 国民党右派分子在《晨报》刊登启事。启事中说：“本执行部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决议于开除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后，所有本党党员必须一律重新登记……北京全市为七党区登记……”

8日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及北京特别市党部联合刊登启事，指出：“日来各报所载‘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注意’启事一则，谓将北京市划分七党区并在北大三院等处登记云云，纯系叛变本党之少数分子冒用本执行部名义所为。除已通告各区分部并查办外，恐新来党员及党外人士认假为真，受其骗惑，特此声明。”（《京报》1月8日）

9日 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发表公告：“本党部自十三年七月成立至今领有党证之党员共二千八百一十三人，离京及去黄埔军

校者七百八十六人，故目下党员在京者共有二千零二十七人；惟查已向本部报到而划入各区分部者为一千七百八十二人，尚有二百三十一人未曾报到。此中不无误向南花园一号冒称北京执行部之非法机关登记者。特再通告，望未向本部报到之党员，务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将住址函报翠花胡同八号本部，以便划入区分部，幸勿迟误，致于党籍。”（《京报》1月11日）

13日 下午1时，出席“北京国民反日大会”在民国大学举行的讲演大会。大钊同志在讲演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之历史，发挥详尽”，“听讲者有二千数百人，讲者颇为透澈，听者亦极感动。”（《晨报》《京报》1月24日）

21日 出席北京各界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与会者约有千人。”（《京报》《晨报》1月22日）

大钊同志在会上演讲时说：“同志们！列宁先生已去世二年了！他的死是世界的大损失，而且他给了我们很重的责任。今天我们追悼他，就回想到我们的中山先生。……所以，我们同时感觉列宁的死是个损失，中山先生的死，也是我们的损失。二年以来，国民革命的局势如何紧迫，而两次死去我们的领袖，损失何等的重大！我们的责任更如何的重大！我们所以不能不联想到中山先生，而感觉自己的责任更应该努力！”

他强调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策略。”因此，他号召：“无论列宁主义者或中山主义者都不应该两下分离。等到中山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列宁主义胜利了。在坐的同志们，你们不管是列宁主义信徒，中山主义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

“散会的时候，大家更高呼了口号，声震屋瓦，群众的热烈精神更加增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第三国际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政治生活》第六十六期）

27日 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日，遭日本侵略者杀害。下午，“北京国民反日进兵南满大会”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召开郭松龄追悼大会。大钊同志出席并作讲演。（《京报》1月24、27、28日）

28日 上午11时，徐谦赴俄文专科学校上任。大钊同志及苏联大使加拉罕等作为来宾出席上任仪式并发表了演说。

本月1至19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使会议坚持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通过了制裁国民党右派的《弹劾西山会议议决案》。

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颖超、夏曦等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同月14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非基督教大同盟，北京学生总会等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反日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沿途……大呼下列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对日经济绝交！’‘实行抵制日货！’‘反对奉直勾结！’‘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召集国民会议！’‘国民革命万岁！’”等，“并发散各种反日及反对当局之传单。”（《晨报》1月15日）

31日 继续举行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

## 2月

7日 下午，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总工会，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二·七”罢工三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一千多人，大钊同志的助手陈为人为大会主席，陈启修等作了演讲。

21日—24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

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四天，会议七次。”……“会前中央及南北负重要责任同志，已有数日的非正式讨论。”

会议日程共有十一项：一，现时的政局与党的主要职责；二，中央地址问题；三，国民党问题；四，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五，广东问题；六，三特区工作；七，河南问题；八，铁总问题；九，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十，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十一，反吴宣传问题。

会议集中注意“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一案：“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彭建华关于北方区委的一些回忆》）

24日 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大三院召开各级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会上，谭平山报告了省港罢工的经过，陈毅报告了北京的党务工作。会议议决本月26日全市党大会提案：（一）援助广东被封锁案；（二）最近对时局发表宣言；（三）致电国民军讨张、吴以反英日案；（四）拥护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五）拥护二大决议及二届中央执委会；（六）每同志在总理周年前至少介绍一人入党，以作纪念。（《京报》2月25日）

25日 据《京报》26日报道：“昨日为师大新华学会公开讲演之第三日，原定于右任、陈启修、李大钊讲演，后均因事未到……”

26日 《京报》登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宣布废止启事。启事说：“按二大决议执行，市内党务仍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翠花胡同八号）办理。”

大钊同志后来在《狱中自述》中写道：“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

28日 北京国民讨张吴大会在师范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国民党市党部等一百多个团体。（《京报》3月1日）

### 3月

1日 下午2时，出席北京学生总会在女师大大礼堂举办的讲演会，听众一千余人。会上，大钊同志作了题为“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比较观”的讲演。瞿秋白也作了讲演。他们的讲演，“均极受听众之欢迎。”（《京报》3月2日）

7日 《京报》报道：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妇女界定于8日下午在艺术专门学校开纪念大会。“已敦请徐季龙、陈启修、于右任、李守常、吴稚晖、谭平山、顾孟余、瞿秋白、李石曾、于永滋、安体诚诸先生……讲演。”

12日 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北京二十万人举行盛大公祭活动。大钊同志为国民党公祭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于本日出席了国民党左派在太和殿举行的纪念活动。（《京报》《晨报》3月13日）

同日 发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载《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上，署名李大钊。

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特别赞扬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相联结”的伟大功绩；赞扬他“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迹。”

13日 同陈毅一起参加清华学校举行的孙中山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清华周刊》）



14日 赴天津指导该市党的工作，并于本日在天津群众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演说会上发表演说。（《京报》3月17日）

17日 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党的长期帮助和群众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由于倾向革命，势力扩大，引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恐惧。本月，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因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干涉，于12日公然派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自卫，发炮还击。13日，日本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16日，又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以所谓维护“辛丑条约”为名，向段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除防务。这种野蛮的行径，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怒。本日，在党和大钊同志的领导下，群众包围了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

据参加过这次行动的李葆华回忆说，“……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的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18日 北京市总工会，学生总会等二百多个团体十万多人集会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上通过了要求驳斥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八项提案。会后，群众整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上午，大钊同志与赵世炎等召开了北方区委会议。散会后，大钊同志即参加国民大会请愿队伍的游行，并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反动军阀政府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群众四

十七人，重伤二百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大钊同志的头部和双手都负了伤，并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得以脱险。

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鲁迅全集》第四卷）

当晚，大钊同志召开了北京党、团地委的联席会议，议决将斗争坚持到底，组织对死者的抚恤，对伤者的慰问。召开追悼会，并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卖国本质。

在此后的几天里，北京成立了“各界昭雪会”，“各界废约驱段大同盟”，为惨案发宣言，发通电，对反动军阀政府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19日 段祺瑞政府发布逮捕大钊同志等的通缉令。通缉令以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屡肇事端”的罪名，要“严格查究……并著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

该通缉令是18日夜由段祺瑞亲自出席的内阁会议议决的。（《晨报》3月20日）

20日 中国共产党就“三·一八”惨案，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人民起来打倒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府，废除“辛丑条约”，建立人民政府。

同日 发表《电车收入渐少的原因》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3日 发表《逛的是什么》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6日 发表《北京现在的三多》《店铺找钱也欺人》两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月底 在反动军阀加紧迫害的形势下，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大钊同志领导北方区委机关转入地下。

据刘清扬回忆：就在惨案发生的两三天后，大钊同志率领国共两党党部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里继续战斗。“进去的有李大钊同志以及党员干部于树德、刘清扬、范鸿劼、杨景山、陶永立、陈延年、陈乔年等。我与于树德是负责国民党的工作任务的。国民党进去的有丁惟汾、路友于、邓文辉、谭祖尧（谭也是党员作国民党的工作）……徐谦原来就住在大使馆西院的俄‘庚款委员会’里……”

不久，国民党的领袖徐谦、顾孟余、陈友仁、丁惟汾相继离京。为了迎接北伐高潮，保存革命力量，我党也将许多同志调离北京。从此，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都担在大钊同志一人身上。（访问刘清扬记录）

本月 大钊同志派一批革命同志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批同志原是派往黄埔军校的，在“三·一八”惨案中有几人牺牲了。后因蒋介石策划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大钊同志遂转派这批同志赴广州农讲所。（杜松寿：《回忆李大钊同志》）

同月20日 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排斥、打击共产党人，阴谋篡夺领导权。

蒋介石这一反革命活动，得到国民党右派的称赞。29日，西山会议派谢持、覃振，林森，邹鲁等召集上海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致电蒋介石以“罢勉”。该电鼓励蒋介石“祛患必须彻底，与其图蔓，莫如徒薪……惟我忠勇之同志，努力为之。”（《申报》3月30日）

## 4月

9日 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段祺瑞。在英、美、日帝国主义

指使下，直奉军阀联合攻击国民军。16日，奉军占领北京，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

据李葆华回忆：“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跑到父亲住所，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同月 奉军占领京、津一带，加紧对革命的迫害。24日，奉系军阀以所谓“宣传赤化”的罪名，封闭了《京报》。26日，枪杀了《京报》主编邵飘萍（振青）。（邵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青团员，一说为共产党员。）

## 5月

6日 发表《欠薪机关也不索薪》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12日 发表《茶房老爷》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本月 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载《政治生活》第七十六期，署名猎夫。

本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一文，并结合中国的史实加以分析。使人们“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

同日 派陈毅去四川工作，参加顺（顺庆，即南充）泸（泸州）起义，配合北伐。（1959年3月17日刘伯承在成都与程子健、杨尚岑的谈话）

同月3日 北京卫戍总司令发出所谓“保安办法十七条”的

布告，其中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 春 末

派马文彦赴河北省涿县，策动吴佩孚直系军田维勤部下的营长许权中起义。后许率部由涿县开往国民军驻地一张家口。（《1980年1月西安市政协马文彦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函》）

《晨报》26年7月的有关报道中，透露出田维勤部的七十七团三营长许权中起兵一事。

## 7 月

1日 发表《吃不得的振梅汤》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22日 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载《政治生活》第七十九期，署名猎夫。

本文用大量事实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积极进攻的两大方策，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最后指出：“……综合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的凶猛……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全国民众号召各地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张、吴的战争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

本月9日 广东革命军誓师北伐。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攻克株州。12日，进入长沙。

## 夏

派马文彦和于右任一起去莫斯科，请冯玉祥回国，在北方进行国民革命，策应北伐，以期会师中原。（《1980年1月西安市政协马文彦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函》）

## 8月

1日 发表《一个坐电车的朋友》一文，载《晨报》《北京》专栏内，署名明明。

8日 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载《政治生活》第八十、八十一期合刊，署名猎夫。这是大钊同志关于中国农民武装运动的一篇重要的著述。

本文对红枪会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作了全面的分析，着重指出“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并且“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也着重指出“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这又是“武装农民运动中一个极大的危机。”从而他号召一切革命者，“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

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  
……”

本月 奉系军阀在北京继续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进行血腥镇压。6日，《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被枪杀。7日，《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被捕。

同月27日叶挺独立团血战汀泗桥，获大胜。30日，攻克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全线崩溃，退守武昌。

## 夏 秋 间

中共中央通知大钊同志等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

据罗章龙回忆：“中央决定了这件事，叫我到北京来，和大钊同志一道经过上海到武汉去（因铁路不通）。我到北京后就向大钊同志传达了中央这个决定，希望在武昌攻下之前到达那里。……大钊同志说：‘你先走，我还要安排一下，安排好了我就来。’我说：‘这不行，你是北方人，路上又要绕一个大弯子才能到武汉，我陪你走方便些，通过封锁线，你一口河北话是过不去的。’他说：‘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我现在工作摆不开，所以，只好你先走’……。最后，中央根据这种情况，同意我先期离京。以后他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作。……”

（罗章龙1980年1月10日谈话纪录）

## 9 月

15日 《中央政治通讯》第三期，刊载《守常政治报告》。

17日 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到达绥远五原。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及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

命。

事前，冯玉祥曾派人到北方区委找到大钊同志，说明他将在五原誓师，要求北方区委给予协助。大钊同志当即派方仲如前往冯部，并带去他给冯玉祥、刘伯坚的信件。（方仲如：《关于李大钊同志的回忆》）

五原誓师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委及其他地方党组织派往冯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四百人之多。其中，著名的共产党人有刘志丹、陈延年、王若飞、王一飞、方仲如、曾晓渊，李连城、贾一中、贾午等。这四百人分别在总政治部（以刘伯坚为首）及各路军、师、旅、团政治处工作。如刘志丹在第四路军任军政治处长兼参谋长，方仲如任第五路军政治处长。（方仲如：《关于李大钊同志的回忆》、“刘贯一1980年1月15日谈话纪录”）

在如何部署军事行动的总方略上，冯玉祥完全采纳了大钊同志的意见：“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

26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写信给大钊同志。信中说冯玉祥在苏联进步甚大，颇可乐观。”

关于“国党与国军之关系”，蔡和森向大钊同志转告了“此间要人意见。”

蔡在信中还谈到他对国民军的工作意见，以及望大钊同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 10月

1日 晨，“各校学生所组织之‘共进社’在后门内三眼井某公寓召集会员讨论会务，被密探侦知，捕去二十余人。”（《晨报》10



月3日)

共进社社员绝大部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钊同志当即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被捕人员。北方区委的同志在大钊同志领导下，经过多方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终于将这批同志营救出狱。(方仲如：《关于李大钊同志的回忆》)

本月10日 北伐军攻克武昌。

## 12月

15日 《中央政治通讯》上载《守常同志来信(12月5日)》。

本月 在东北工作的楚图南回到北京，向大钊同志汇报了《哈尔滨时报》和滨江大戏院被搜查封闭，一些同志被捕或转移的情况。大钊同志指示说：“开展工作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被封闭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并让楚图南赶快回东北，因为，“随着大革命北伐的形势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壮大，东北将成立新机构。”(《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一期)

## 冬

在大钊同志领导下，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扩大。在北京，我党联合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左联”为当时北京左派最高形式的组织。参加“左联”的有“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革命青年社”、“新滇社”、“革新社”、“琼岛魂”、“琼崖协进会”、“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九个团体，总人数在二千人以上。“左联”是党领导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统一战线的联合组织，它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本年 自本年3月底至1927年春，大钊同志肩负领导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始终战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李星华1979年6月回忆说：“父亲在隐蔽期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领导北方革命群众运动和对于北伐军的支援上。”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北方区委利用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壮大了党的组织，发展了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从“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2月，共产党员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共青团也有了更大发展，除各大学外，许多中学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同时，国民党员也由二千多人增至四千多人。另外，“东三省之青年及知识界入国民党者近来渐增，已不下二千名。”（《晨报》3月17日）

同时，大钊同志及北方区委还派遣许多同志深入广大农村开展斗争。扩大原有的农民组织，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使河北、内蒙、山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仅据1926年底乐亭、玉田、清苑、蠡县、围场等十八个县的统计，就有农民协会会员七千二百九十五人。农民协会的发展，加强了农民运动的组织力量。

大钊同志还领导北方区委为配合北伐胜利进军作了大量工作。如：提供北方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参加革命军队；对敌军进行多次的策反工作等。与此同时，还领导了北方工农群众展开反对军阀的斗争。如河北磁县党组织为阻挡奉军南下，曾秘密组织工人炸毁了漳河大铁桥，并发动农民协会会员三百余人，破坏铁路三、四里，割断沿途电线，将各渡口的船只沉入河底，阻止敌军通行。

又，大钊同志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从敌人抄走的大量文件而编成的所谓“罪证”目录上，可窥视一斑。现录部份如下：

（一），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致天津、太原、绥远、唐山、正定各处支部函三十余件，催促进行工作及报告等情况，函后均

系李瑞祥署名（李瑞祥即“北方区通信处”代号）

（二）北委扩大会议议决各种运动扩大方案及煽惑民众各种方法之通告由八十六号至一百二十号（按：北委即北方区政治委员会）

（三）北方区对于东北以后工作意见之稿件；

（四）白芳渠通告第一号至第十五号，内系指示各种宣传方法（白芳渠即北方区的代名）；

（五）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及鼓动工农群众阶级斗争之各种计划；

（六）讨论发行《瀑布半月刊》以宣传共产主义之底稿一件；

（七）李守常等讲演共产主义之教材目录及其内容之底稿；

（八）工作总则一本，内述今后如何谋党之发展及注重党员教育等情形；

（九）共产党训练党徒宣传工农兵入党及鼓惑其在社会上奋斗之各种方法；

（十）北京地方1926年九、十、十一、十二月等月份工作报告一本；

（十一）大连共产党支部九月份工作报告；

（十二）正定地方1926年11月份工作报告书一本；

（十三）中国共产党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报告在张工作情形；

（十四）山东党员泰和、佐治等十一、十二月份工作报告书一本；

（十五）1927年3月河南共产党员工作之状况；

（十六）1927年顺直三月份工作报告书一本，附宣传部最近工作计划；

（十七）晋泰和等在山西进行各种工作报告书六本；

（十八）关于工人运动议案一种；

- (十九) 顺直农民问题报告一本；
- (二十) 北京共产党党部，向农人方面宣传鼓惑一致加入打倒帝国主义运动事；
- (二一) 北方区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纪要一本；
- (二二) 北京市党部筹办妇女职业学校请加指导致守常之函件；
- (二三) “妇女运动”、“小商人运动”、“青年运动”各种提案；
- (二四) “C.Y”北方区工作大纲及通告一本；
- (二五) 中国共产党唤起北京市民起来革命之传单；
- (二六) 我们最近在北方国民党工作中应取的态度一种；
- (二七) 募集北伐捐帐三本；
- (二八) 永泰报告在军队中演讲情形，由宣城致李大钊之函件；
- (二九) 守中询广东能否于最短期间出兵自郑州致李大钊之函件；
- (三十) 署名常者叙述煽惑甘旅、袁旅等部反戈情形致张之江、鹿钟麟之电稿；（《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八、九册）

## 1927年（三十九岁）

### 1月

上旬 大钊同志及北方区委派杨春林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农运特派员与冀东党的同志们一起，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反抗奉系军阀的“旗地变民”的斗争，在几个月时间里，使玉田、遵化、迁安、蓟县、博野、蠡县、交河等县的反抗“旗地变民”斗争获得

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这些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增强了农民的斗争意志。

24日 写信致徐谦、顾孟余等人。

大钊同志在信中，对于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企图，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信中写道：“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十八册）

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在广州正式成立。1926年11月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那里，并阴谋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篡夺革命果实。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927年1月初，武汉人民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庆祝大会。但蒋介石不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决定，遂致电武汉中央，坚持要迁都南昌，并扣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阴谋，大钊同志的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

25日 大钊同志主持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给国民党政治会议写报告书。报告书分为四部份：（一）关于靳云鹗的报告；（二）关于杨宇霆的报告；（三）关于山西阎锡山的报告。其中，谈到了阎的代表孔繁蔚师长与大钊同志相见的情况；（四）关于最近外交团的态度报告。其中详细报告了大钊同志与大内畅三（日本众院议员，大学教授，中日文化事业协会秘书）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话情况。

在北伐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欲通过间接接洽提出日方条件，以试探国民政府的态度。大内畅三即负此使命来华。

报告中写道：大内“要求与守常面谈，守常遂约他当晚在俄款委员会相见。是晚九时，大内自带一通译方梦超与他同来，寒暄数语后，守常即告彼日方条（件）已经看过，不过有些点还望

先生予以更明晰的说明可乎？大内说好，以下便是守常和大内的问答了。（略）……”

“……从这次谈话和六个条件，我们可以看见日本注重的几个要点来：（一）主张中国暂时南北分治；（二）在分治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在东省内的‘免得权’不生动摇；（三）愿怂中国收回数十年为英把持之海关行政权；（四）日本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别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就是六条的骨干，此外的辞句，都为装饰外面的好看服罢了。大内与守常见面后的一日，大内即乘晚车返东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十八册）

26—29日 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改选。在大钊同志指导下，事先通过“左联”，团结了左派群众，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终于使左派大获全胜，实现了北方区委所提出的“将党权（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的口号。这个胜利，在组织上加强了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

### 3月

随着北伐军的进展及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奉系军阀惊恐不已，遂以“前方战事吃紧，京师治安至关重要”为理由，一方面，大肆逮捕革命进步人士，至月底，各校被捕的进步学生达四十余人。（《晨报》3月29日）一方面，严加监视密查移至苏联大使馆西院北方革命指挥机关，逮捕了机关的工友阎振三、张金印。大钊同志的处境愈加危险；许多同志和朋友劝他离京暂避，都被他婉言谢绝。刘清扬奉调离京赴上海，行前劝他一起走，他说：“你是党调走的，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访问刘清扬记录”）夫人赵纫兰十分替他担心，也多次劝他离京。他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  
(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贾芝：《坚守岗位》)

## 4 月

6日 上午，大钊同志被捕。

在帝国主义的默许、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进行了空前未有的大搜捕。“午前七时半顷，……先有数十名便衣巡警，三五成群。”“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即时全体入内搜索。”  
(《晨报》4月7日)

这一天正是清明节，天气温和。夫人赵纫兰领着小女儿艳华到兵营附近散步，大女儿星华在外屋看报，大钊同志在里屋伏案写字。随着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声，大钊同志迅速从抽屉里取出小手枪，镇定自若地领着星华走到院里，进入一间僻静的小屋。不久，一群特务、宪兵、警察蜂拥入内。一个特务指着大钊同志问前几天被捕的阎振三：“你认识他吗？”这位经党教育的老工人只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那家伙狞笑着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随即逮捕了大钊同志。(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

先后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以及国民党左派邓文辉等，夫人赵纫兰以及女儿李星华、李艳华也一同捕去。

下午2点，敌人“审讯”大钊同志。当时大钊同志“目光充足……态度尚极镇静。”当敌人问他为什么要居住在苏联大使馆西

院的兵营里时，“李答因与俄人有友谊关系，且喜该处清静云云。”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顺天时报》4月7日）

当晚，荷兰公使欧登纳以公使团首席公使资格发表声明，“大意谓：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晨报》4月7日），帝国主义分子积极参与逮捕共产党人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7日 下午1点30分，在司法处对大钊同志进行第二次审讯。“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晨报》4月8日）

“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敌人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顺天时报》4月8日）

此后，对大钊同志进行了多次审讯。每次审讯，除对于“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辨白，谓并无此项行动。”（《晨报》4月17日）

轮番审讯，严刑拷打无济于事，张作霖变换手法，派他的参谋长、号称“小诸葛”的杨宇霆，以同乡关系前来劝降。大钊同志无限愤慨，严词痛斥。

8日 书写《狱中自述》。

在《自述》中，大钊同志回顾了自己革命、战斗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

《自述》，以豪迈的革命气概，铿锵有力的语言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为了保护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他在《自述》中写道：“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危难中，表现了大钊同志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高尚品德。

大钊同志“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李星华回忆说，一次，敌人把她和母亲及妹妹带到法庭上，见到了大钊同志。他“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而是另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

大钊同志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张篁溪：《李大钊殉国记》，《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二辑）

同日《晨报》发表了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社论说：“今兹处置共产党事件，吾侪以为根本上应取宽大精神，……吾人以为处置方法，应依照普通手续，交付法庭办理。”

大钊同志被捕以后，北方党组织，以及广大工人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各界进步人士，都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铁路工人还计划劫狱，并组织了劫狱队。大钊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亦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北方党组织接受了大钊同志这一意见。（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烈士传》——苏南新华书店出版）

9日 下午7时，国立北大、师大等九校校长召开了校务讨论会，议决营救办法。议决的几项办法中有：“李为九校教员，义

难坐视，急盼官方移交法庭审讯。”（《顺天时报》《晨报》4月11日）

大钊同志被捕后，杨度利用其在北洋军阀政府内任职的有利条件，左右周旋，积极设法营救，终以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会议。“结果，议决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并且“由全场推举梁士诒、杨度二人为代表，前往顺承王府陈述意见。”（《晨报》4月11日）

国民军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

同日 据《顺天时报》报道：敌人对大钊同志等的“预审”结束。

10日 九校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九校代表，前往拜访张学良军团长，陈述九校意见。余、张等提出意见如下：“（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晨报》《顺天时报》4月11日）

同日 杨度及梁士诒作为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代表，约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前往顺承王府会见张作霖。“至于梁、杨、罗三人在顺承王府如何建议，得何结果……尚未探悉。但闻顺承王府对此项建议 既然讨论会提出，甚为重视云……”（《晨报》4月11日）

12日 下午4时，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大学的校长召集会议，就大钊同志被捕事，议决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晨报》4月13日）

同日 据东方社莫斯科12日电：本日下午，莫斯科十万工人、职员举行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晨报》4月14日）

同日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2至15日，上海工人惨遭杀害者三百余人，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先后英勇牺牲。

此后不久，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汉口《民国日报》5月12日，《晨报》4月29日）

14日 《顺天时报》报道：“自李大钊等捕获后，张作霖曾电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征询意见，已接了复电。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

张宗昌的电报说，李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晨报》4月29日）

与此同时，国家主义派头子、法西斯政客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

15日 《世界日报》报道：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书中列举了十条宽大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此论奖掖行德，而宜主宽大者八……。”

16日 《世界日报》报道：“李大钊等被捕后，各方面营救甚力，兹闻又有李之同乡白眉初、李时、武学易、李采岩等三百余人……联名呈请释李。”

呈文中说：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

28日 上午10时，奉系军阀悍然不顾人民群众与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里秘密进行“军法会审”，对大钊同志等二十名革命志士宣告死刑。

下午1时许，大钊同志等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晨报》4月29日）时年三十九岁（三十八周岁）

与大钊同志一同牺牲的十九名烈士是：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晨报》4月29日）

晚，“李大钊之妻李赵氏及长女星华、次女艳华……由警厅开释、即行回宅。”（《晨报》4月30日）

30日 中外新闻记者纷纷到府右街朝阳里四号李宅，访问李夫人，“至李宅现尚有便衣侦探监视。”（《晨报》5月1日）

又，几日来，各报对大钊同志艰苦朴素的生活，均作了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晨报》《顺天时报》4月30日，5月1、2日）

大钊同志一生过着清贫刻苦的生活。在北大工作时期，他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除全家节衣缩食只花三、五十元外，其余全部用来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援革命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由于缺乏活动经费，他便从这一百二十元工资中拿出八十元交给小组，使大家深为感动。但他对党的经费却界限极严格。冬天大钊同志家里，因为无力买煤取暖，寒如冰窖，有人提出拨用一点公款买煤，他坚决不许，严肃地说：“党费怎能滥用！”他的一生，无愧于“人民的忠仆”这一称号。

## 5月

1日 大钊同志的灵柩由长椿寺移往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

2日 长女李星华前往妙光阁浙寺照料，大钊“友辈前往者亦甚多”，“至朝阳里四号李宅慰问李夫人者，颇不乏人，并有馈赠零用者。”（《顺天时报》5月3日）

又，大钊同志的同乡李凌斗等与大钊舅父一起商议善后事宜。

10日 下午4时，李夫人及女儿星华、艳华乘车回乐亭原籍。（《顺天时报》5月11日）

大钊同志牺牲的噩耗传来，革命同志无不为之深切哀悼！党的机关报——《响导》周报，发表了题为《悼念李大钊》一文，文中说，“……自从他们被捕以来，固然明显看出他们是无生还希望的，但他们被杀的消息，仍然如青天霹雳一般，使我们感觉异常的悲痛！”“李大钊同志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他是最勇敢的战士，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奋斗。他的名字早就为全中国革命者所识”，并被中国人民“牢记不忘”。（《响导》周报一九五期）

月中，中共中央及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有近万名同志参加。并且，中共中央派专人北上，料理大钊同志丧事及一切善后事宜。（罗章龙：《亢慕义斋回忆录》）

同时，武汉革命政府也隆重举行追悼会及报告会，据何香凝回忆：“在汉口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在国民军中，“先后在陕、豫等处为李举行追悼会，且为李发丧，全军带孝。”冯玉祥为之树碑，亲书“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碑文。（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烈士传》一 苏南新华书店出版；吴镇峰：《冯玉祥吊李大钊等同志碑石》，《陕西日报》1979年11月23日）

此外，武汉的《中央日报》，南昌的《红灯周刊》等，都发表了悼念文章。

大钊同志的牺牲，亦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深切哀悼。《共产国际》月刊及《真理报》等均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指出对李大钊等判处死刑，“其责任，不独中国军阀负之，即号称文明社会亦不能辞其咎，北京外交团利用其权力，而由张作霖执行之”；文章号召“全世界之工人，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加于中国工人阶级之新暴行须奋起反对……”（《顺天时报》5月4日）

## 公 祭 仪 式

1933年4月

22日 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举行公祭仪式。

大钊同志遇难后，灵柩寄于妙光阁浙寺六年之久。此时党通过北大学生、生前友好及遗属出面发起组织公葬。

本日有北京的进步团体、教育界、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并有日本、朝鲜等国革命人士前往致祭，送大批挽联、挽幛、花圈。

23日 举行灵柩出殡仪式，自浙寺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由于党的组织领导及大钊同志的崇高威望，使这次出殡仪式变成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据《晨报》报道：“九时半启灵，送葬者有教育界及男女学生约七百余。起灵时全体肃立，唱国际歌，继即静默志哀悼，殡仪最前列于旗伞执事，次为影亭，中供李大钊遗像，后即棺罩，由李之子女在前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

北京教育界及各文化团体送的挽联二十余副。内北京青年的一副，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一联为：“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

送葬队伍越聚越多，致“车辆拥挤，不能通行”。沿途举行路

祭，至西单时，“由送葬者推代表读祭文，全体行三鞠躬礼，演说，唱国际歌，停留约半小时继续前进。”至西四牌楼又有大钊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乐亭同乡举行路祭，青年们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反动军警当即捣毁祭坛，驱散游行队伍，逮捕男女学生四十余人。

大钊同志的灵柩安葬时，党曾派人送来一块刻有镰刀斧头和碑文的石碑，由于当时处于蒋介石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只好随灵柩一起埋入墓中。

北大教授刘半农受同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内容为：“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君讳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岁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习政治经济之学。既卒業东游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所诣益精。归国后作为文章布之甲寅、新青年诸报，理致谨严，思度宏远，见者称道。以民国七年一月改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九年九月任政治史学两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君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赵氏纫兰，子三震华、光华、欣华，女二星华、炎华。越六年其友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创议募资，为营窀穸，遂于民国二十二年○月○日葬君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戴候斯穴，挥涕怆怆，惟神魂之得所，迪吾民于恺康。”

这篇碑文，也未能用。后只刻了一块由刘半农书写的，记有大钊同志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石碑，竖立在墓前。

本月 北大校长蒋梦麟等曾为这次公葬和瞻养遗孤发起募



捐，捐款者有鲁迅、李四光、易培基、刘复等一百余人，款达六百多元。

同月 中共河北省委曾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名义，发表《为公葬无产阶级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

《宣言》指出，大钊同志“是共产主义最忠实的信徒和坚决的执行人”，是“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和实际领导了北方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袖。《宣言》号召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学习大钊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为反对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而英勇斗争，“继续大钊同志的牺牲精神前进！”

## 附二

# 李大钊著作目录

## 一、遗 文

### 一九一二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隐忧篇	写于1912年6月，发表于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李钊	

### 一九一三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大哀篇	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李钊	
“弹劾”用语之解纷	同上	同上	
更名尾年小启	同上	同上	
朱舜水之海天鸿爪	同上	同上	
暗杀与群德	5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2期	同上	
复景学铃君	同上	同上	
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	同上	同上	
裁都督横议	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同上	

论民权之旁落	同上	同上
原杀——暗杀与自杀	9月1日《言治》月刊第1 年第4期	李大钊
论官僚主义	同上	同上
一院制与二院制	同上	同上
政客之趣味	同上	同上
是非篇	同上	同上
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 会议	10月1日《言治》月刊第 1年第5期	同上
宪法颁行程序与元首 文豪	同上	同上
	11月1日《言治》月刊第 1年第6期	同上
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	同上	同上
各国议员俸给考	同上	同上
游碣石山杂记	同上	同上
《自然律与平衡律》跋	同上	同上

### 一九一四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风俗	7月10日《甲寅》杂志第 1卷第3号	李守常	
物价与货币购买力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同上	李大钊	
	11月1日《中华》杂志第 1卷第11号	李守常	
国情	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 1卷第4号	李大钊	
我的自传	1980年5月30日《革命文 物》第3期	写	用英文 就。

## 一九一五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警告全国父老书	2月	李大钊	
《中国国际法论》译叙	4月(健行社发行)	同上	
启事三则:	同上	同上	
1. 再版《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			
2. 蒙古丛书第一种——《蒙古及蒙古人》			
3. 世界风云与中国			
国民之薪胆	6月《国耻纪念录》	李大钊	
欧洲战事谈	8月1日《通俗》杂志第1期	冥、冥	
厌世心与自觉心	8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	李大钊	

## 一九一六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民彝与政治	5月《民彝》杂志第1期	守常	
“晨钟”之使命	8月15日《晨钟报》	同上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同上	同上	
“第三”	8月17日《晨钟报》	同上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	8月20日《晨钟报》	同上	
介绍哲人尼杰	8月22日《晨钟报》	同上	
权	8月29日《晨钟报》	同上	
政谭演说会之必要	8月30日《晨钟报》	同上	
达科儿之“爱观”	同上	同上	
培根之偶像说	8月31日《晨钟报》	同上	
青春	9月1日《新青年》第2卷	李大钊	

	第 1 号	
奋斗之青年	9月3日《晨钟报》	守常
新现象	9月4日《晨钟报》	同上
别泪	同上	同上
祝九月五日	9月5日《晨钟报》	同上
李守常启事	9月9日《晨钟报》	李守常
国庆纪念	10月1日《宪法公言》第 1期	李大钊
制定宪法之注意	10月20日《宪法公言》第 2期	同上
省制与宪法	11月10日《宪法公言》第 4期	同上
宪法与思想自由	12月10日《宪法公言》第 7期	同上

### 一九一七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矛盾生活之二重负担	1月10日《宪法公言》第 9期	李大钊	
“甲寅”之新生命	1月28日《甲寅》日刊	守常	
调和之美	1月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孔子与宪法	1月30日《甲寅》日刊	同上	
真理	2月1日《甲寅》日刊	同上	
真理(二)	2月2日《甲寅》日刊	同上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2月4日《甲寅》日刊	同上	
预定制宪期间案	同上	同上	
论收毁制钱宜有准备	2月6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中国与中立国	2月7日《甲寅》日刊	同上	
回春之北京	同上	同上	
元宵痛史	2月8日《甲寅》日刊	同上	

日本之托尔斯泰热	同上	同上
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 不有所表示	2月9日《甲寅》日刊	同上
我国外交之曙光	同上	同上
黄金累累之日本	2月10日《甲寅》日刊	同上
可怜之人力车夫	同上	同上
今后国民之责任	2月11日《甲寅》日刊	同上
威尔逊与平和	同上	同上
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	2月12日《甲寅》日刊	同上
战争与铜	2月14日《甲寅》日刊	同上
德皇之欺世论	同上	同上
爱国艺术家罗丹翁病笃	同上	同上
学会与政党	2月15日《甲寅》日刊	同上
诗人达阿儿之行踪	2月16日《甲寅》日刊	同上
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 为攘权之武器	2月17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外交研究会	同上	同上
北美之风云儿	2月18日《甲寅》日刊	同上
新中华民族主义	2月19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一致与民望	2月21日《甲寅》日刊	同上
“极东门罗主义”	同上	同上
议会之言论	2月22日《甲寅》日刊	同上
哭沈汉卿君	2月21、22、23、24日《甲寅》日刊	同上
政论家与政治家（一）	2月25日《甲寅》日刊	同上
蔷薇缘欤？蔷薇恨 欤？	2月28日《甲寅》日刊	同上
政论家与政治家（二）	3月2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 问题	3月5日《甲寅》日刊	同上

愛國之反對黨	3月7日《甲寅》日刊	同上
立憲國民之修養	3月11日《甲寅》日刊	同上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選 不管部之國務員問題 (三)	3月14日《甲寅》日刊	李大鈞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選 不管部之國務員問題 (九)	3月17日《甲寅》日刊	同上
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 (一)(二)(三)	3月19—21日《甲寅》日刊	守常
法國內閣改組之由來	3月24日《甲寅》日刊	同上
面包與和平運動	3月25日《甲寅》日刊	同上
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	3月27日《甲寅》日刊	同上
俄國大革命之影響	3月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戰爭與人口問題	3月30日《甲寅》日刊	同上
青年與老人	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號、5月18日《甲寅日刊》轉載	李大鈞
戰爭與人口	4月1日《言治》季刊第1冊	同上
美與高	同上	同上
大戰中歐洲各國之政變	同上	守常
最近奧國政變之顛末	4月1、2日《甲寅》日刊	同上
學生問題	4月3日《甲寅》日刊	同上
學生問題(二)	4月5日《甲寅》日刊	同上
都會少年與新春旅行	4月7日《甲寅》日刊	同上
講演會之必要	4月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	4月12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大戰中之民主主義	4月16日《甲寅》日刊	同上

真理之权威	4月17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大亚细亚主义	4月18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不自由之悲剧	4月1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4月20日《甲寅》日刊	同上
罪恶与忏悔	4月21日《甲寅》日刊	同上
简易生活之必要	4月22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中心势力创造论	4月23日《甲寅》日刊	同上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中、下、下续）	4月24、25日，5月2日，5日《甲寅》日刊	同上
川局罪言	4月26日《甲寅》日刊	同上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4月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旅行日记	6月9、10、11日《甲寅》日刊	同上
自由与胜利	5月21日《甲寅》日刊	同上
乐亭通讯	5月28、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		未署名 据刘奎考证
校长及教务长易人	6月25日《甲寅》日刊	
辟伪调和	8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六号	守常
暴力与政治	10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号	同上
此日	同上	L·S·C

### 一九一八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书	3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大钊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书	3月19、20日《北京大学日刊》	同上	



“今”	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同上
强力（致高元君）	4月18日《法政学报》第1卷第2期	守常
新的！旧的！	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李大钊
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	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	同上
调和之法則	同上	同上
调和利害	同上	守常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同上	李大钊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同上	同上
胡适《美国的妇人》跋	同上	守常
雪地冰天两少年	同上	剑影
俄国革命与文学家	同上	未署名 据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92页，存疑。
Pan...isra之失败与Democmcy 之胜利	7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10号	守常
庶民的胜利	11月15日演讲、《新青年》第5卷第5号	同上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11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	李大钊
《国体与青年》跋	12月，载《国体与青年》一书	同上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1979年5月《人民文学》第5期	同上
《西洋大历史》序	载李泰棗：《西洋大历史》一	同上

书

一九一九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新纪元	1月5日《每周评论》第3号	未署名	据刘弄潮考证
北京的“华严”	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	明明	
新自杀季节	同上	同上	
面包问题	同上	同上	
政客	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	同上	
国民仲裁	同上	同上	
平民独裁政治	同上	同上	
过激乎？过情乎？	同上	同上	
乡愿与大盗	同上	同上	
放弃特殊地位	同上	同上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2月1日《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李大钊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同上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2月7、8、9日《晨报》	守常	
劳动教育问题	2月14、15日《晨报》	同上	
战后之妇人问题	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李大钊	
祝黎明会	2月16日《每周评论》第9号	明明	
黎明日本之曙光	同上	T.C生	此篇为东

京通信、  
似不为  
李大钊  
所作。  
存疑

秘密外交	同上	明明
罪恶之守护者	同上	同上
青年与农村	2月20—23日《晨报》	守常
死动	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	明明
普遍选举	同上	同上
光明与黑暗	8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	同上
过激派的引线	同上	冥冥
新旧思潮之激战	3月4、5日《晨报》 又载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守常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工人不如骡马	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明明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3月14—16日《晨报》	守常
强国主义	8月16日《每周评论》第13号	明明
小国主义	同上	同上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8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大钊
现在与将来	8月28日《晨报》	守常
统一癖	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	常
白人阀	同上	同上
混充牌号	同上	同上
解放后的人人	4月13日《每周评论》第17号	同上
宰猪场式的政治	4月20日《每周评论》第18号	同上

汽车与邮片	同上	同上
废娼问题	4月27日《每周评论》第19号	同上
“五一节” May Day 杂感	5月1日《晨报》	守常
秘密交外与强盗世界	5月18日《每周评论》第22号	常
黑暗的东方	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同上
太上政府	同上	同上
第五师军人	同上	同上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同上
牢狱的生活	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	同上
不要再说吉祥话	同上	同上
新华门前的血泪	同上	同上
改造	同上	同上
哭的笑的	同上	同上
戚先生感慨无如何?	同上	同上
赤色的世界	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守常
最危险的东西	同上	同上
光明权	同上	同上
我与世界	同上	同上
阶级竞争与互助	同上	同上
忠告黎明会	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	同上
黑暗与光明	同上	同上
真正的解放	同上	同上
战粟	同上	同上
万恶之原	同上	同上
灰色的中国	同上	同上
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	同上	同上
日本人听者	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同上

寄若愚、慕韩	8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判
再论问题与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	李大钊
五峰游记	8月30日《新生活》第2期	孤松
五峰游记(续)	9月7日《新生活》第3期	同上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9月、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同上
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	9月21日《新生活》第5期	孤松
赤色青色	9月28日《新生活》第6期	同上
大笑话	同上	同上
难兄难弟	同上	同上
秘密……杀人	同上	同上
新鲜名词	10月5日《新生活》第7期	同上
圣人与皇帝	同上	同上
黑暗运动	同上	同上
文治国庆	10月10日《新生活》第8期	同上
面包运动	同上	同上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同上	守常
武装祭孔	同上	孤松
妇女解放与Democracy	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李大钊
时代的落伍者	10月26日《新生活》第10期	孤松
应考的遗传性	同上	同上
双十与五四	同上	同上
东西村落生活的异点	同上	同上
时间浪费者	11月2日《新生活》第11期	同上

	期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同上	同上
人与禽兽	同上	同上
参战军呢?	同上	同上
牺牲	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同上
谁是“有实力”者?	同上	同上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同上	同上
掠夺物品的遗迹	同上	同上
妨害治安	同上	同上
死	同上	同上
寺内死了	同上	同上
“鼓吹共产主义”	11月16日《新生活》第13期	同上
	期	
那里还有自由	同上	同上
圣裔的恤金	同上	同上
联人社会	同上	同上
被裁的兵士	11月23日《新生活》第14期	同上
归国的工人	同上	同上
一个自杀的青年	同上	同上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11月30日《新生活》第15期	同上
	期	
“一心一德”	同上	同上
“用民政治”	同上	同上
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11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	李大钊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12月1日《新潮》第2卷第2号	同上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同上	守常
“中日亲善”	12月7日《新生活》第16期	孤松

“裤子”	同上	同上
主义	同上	同上
什么是新文学	写于12月8日，发表于 1920年1月4日《星期日》 周刊“社会问题号”	李大钊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 (答高承元君)	12月12日《国民》杂志第2 卷第1号	李大钊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讲演	12月13日讲演，载《平民 教育》第10号	李守常
什么是歪史	12月14日《新生活》第17期	孤松
禁止说话	同上	同上
互助	12月21日《新生活》第18期	同上
工读(一)	同上	同上
工读(二)	同上	同上
大联合	12月28日《新生活》第19期	同上
物质和精神	同上	同上
生活神圣	同上	同上

### 一九二〇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	李大钊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1月1日《星期评论》第31期	同上	
哭冯国璋	1月4日《新生活》第20期	孤松	
又是一年	同上	同上	
忏悔的人	同上	同上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1月15日《解放与改造》 第2卷第2期	守常
低级劳动者	1月18日《新生活》第22期	孤松
整顿学风	同上	同上
真是梦话	1月25日《新生活》第23 期	同上
“特别体恤”	同上	同上
知识阶级的胜利	同上	同上
精神解放	2月8日《新生活》第25期	同上
山穷水尽的青年	同上	同上
好一对兄弟国家	同上	同上
都市上工读团的缺点	4月1日《新青年》第7卷 第5号	李守常
“五一”运动史	5月1日《新青年》第7卷 第6号	李大钊
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	5月15日《少年中国》第 1卷第11期	同上
国民公报案判决感言	5月16日《晨报》	明明
红萝卜党	5月30日《新生活》第 37期	孤松
乱七八糟	同上	同上
自然与人生	6月20日《新生活》第38 期	同上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8月15日《少年中国》第2 卷第2期	李大钊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	8月17日《晨报》	李守常
各团体标明本会主义之 必要	9月15日《少年中国》第 2卷第3期	同上
变革的原动力	10月17日《新生活》第41 期	孤松



人治与自治	同上	同上
拥戴与欢迎	10月1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T·C 待考证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	李大钊
欧文底传略和他的新村运动	12月8日《批评半月刊》第4号	同上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	北大唯物史观讲义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北大讲义	
史观	《史学思想史》讲义	李守常
鲍丹的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鲁雷的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韦柯及其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同上	同上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同上	同上

### 一九二一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自由与秩序	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李大钊	
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	2月19、26日, 3月5日 《北京益世报》《好周刊》	李守常	全文未载完。
民众的新年	2月20日《新生活》第45期	孤松	
近来的倒戈运动	同上	同上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	同上	同上	

北京平民生活的一瞥	3月5日《新生活》第46期	同上
黄昏时候的哭声	同上	同上
山西	同上	同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期	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3月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3月《曙光》2卷2号	S·C
社会主义下之实业	同上	同上
中国学生界的“bay Day”	5月4日《晨报》	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	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	李守常
美国图书馆之训练	12月1日《晨报》	守常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12月15、16、17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 一九二二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今与古（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	1月8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现代的女权运动	1月18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	守常	
论自杀	1月30日《学艺》第3卷第8期	李守常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2月14日《晨报》	李大钊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2月21—23日《晨报》	同上	
胶济铁路略史	3月5日《新生活》第	孤松	

黄庞流血记序	3月23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失恋与结婚自由	4月1日《晨报》	守常	
致晨报记者	4月2日《晨报》	同上	
非宗教宣言	4月4日《晨报》	李大钊	该宣言为 12人署名 据吴虞日 记记载,该 文系李大 钊起草
宗教妨碍进步	4月9日《北京周报》第12号	李大钊	
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5月1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5月6日《晨报》副刊	守常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6月《非宗教论》文集	李守常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	同上	
生物学的教育观	7月28—3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T·C	不象李大钊所作待考证
李守常启事	10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守常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11月7日《晨报》副刊	守常	
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	12月1日《晨报》副刊	同上	
为辞图书馆主任职启事	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大钊	
本校(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感言	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守常	
女界的自贬	12月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T·C	待考证

社会问题与政治

12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 李大钊  
《觉悟》

### 一九二三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1月16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李守常	
平民主义	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之《百科小丛书》第15种	同上	
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	2月5日《江声日刊》	李大钊	
关于讨论知识阶级的两封信	2月5日、10日、载《晨光》第4期	T·C	待考证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	2月《申报之最近五十年》	李大钊	
“今”与“古”	2月《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	同上	
马克思经济学说	3月12日《时事新报》	李守常	
演化与进化	4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李大钊	
史学与哲学	4月17日—19日天津《新民意》副刊《星火》	李守常	
普遍全国的国民党	4月18日《向导》第21期	T·C·L	
工人国际运动略史	5月1日《晨报》副刊	同上	
强权底下的劳动状态	5月1日《互助》	S·C	待考证
纪念五月四日（在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	5月5日《晨报》		
N·T学校里	5月11日《时事新报》	T·C	待考证

		《青光》专栏		
实业改造的中心势力	5月17日《北京周报》 第66号		李守常	
英国合作党底说帖	5月前后《平民》158期	S·C		待考证
愚人节	6月2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T·C		本篇为小说待考证
痴子	6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上		同上
桑西门的历史观	8月《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		李大钊	
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	9月16日《北京周报》第80号		李守常	
“大国民”的外交	9月16日《努力周报》70期	S·C		
中学旧制国文教授改革草议	10月18《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T·C		本文寄自长沙，不象为李大钊所作。待考证。
社会主义释疑	11月1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李守常	
研究历史的任务	11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上	
时	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李守常	
劳动问题的祸源	12月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上	
王著货币论书后	12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商学》第33期		大钊	
清代通史序	12月11日《清代通史》初		李大钊	

		版本		
劳动问题概论	12月14、18、20、21、 23、27、30日《民国日 报》副刊《觉悟》	李守常	未见原 件，有可 能与“劳 动问题的 祸源”为 同一篇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 民	12月20日《新民国》第1 卷第2号	同上		
孔道西的历史观	12月《社会科学季刊》 第2卷第1期	李大钊		

### 一九二四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	李大钊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 七”	2月16日《新学生》第14 期纪念“二七”并追悼列 宁号	同上	
团体生活在今日社会上 的意义与价值	3月8日《共进》第56期	T.C	待考证
列宁不死	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追 悼列宁大会刊行的《列宁 纪念册》	李守常	
通信一则	4月13日《响导》63期	S.C	待考证
这一周	5月1日《北大经济学会半 月刊》第24期	守常	
小品文三则	5月8日《京报》《显微镜》 专栏	S.C	待考证
洋大夫	5月17—21日《京报》	同上	本篇为小

说，待考  
证

- |                         |                       |     |     |
|-------------------------|-----------------------|-----|-----|
| 史学要论                    | 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 李守常 |     |
| 冒险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 6月10日《共进》第63期         | S·C | 待考证 |
| 新闻的侵略                   | 6月18日《向导》第71期         | T·C |     |
| 人种问题                    | 6月20日《新民国》第1卷第6期      | 李大钊 |     |
|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 7月1日，载1919年《教学与研究》第6期 | 琴华  |     |
|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 11月1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守常  |     |

### 一九二五年

- | 篇名                        |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 署名       | 备注        |
|---------------------------|--------------------|----------|-----------|
|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            | 《“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 守常       |           |
| 挽孙中山联                     | 《哀思录》第二册           | 李大钊      |           |
|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                 | 8月北京《民国日报》         | 李守常      |           |
| 上海的童工问题                   | 4月《中国工人》第4期        | 守常       |           |
| 我对于学校行政的感想                | 5月13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 T·C      | 待考证       |
| 北京有两种电车                   | 9月7日《晨报》<br>《北京》专栏 | 明明<br>同上 | 待考证<br>同上 |
| 为何叫小孩在街拉屎                 | 10月9日《晨报》《北京》专栏    | 同上       |           |
|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人东方大势年表 | 9月9日《政治生活》第50期     | 猎夫       |           |

京官不可不做	9月11日《晨报》《北京》 专栏	明明	待考证
北京的路灯	同上	同上	同上
非抽这种烟不可	9月15日《晨报》《北京》专栏	同上	同上
拍掌叫好	9月16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缠足是干什么?	9月17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言无二价	9月26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留刘某某	9月26日见张次溪:《李大 钊先生传》		李大钊
邮政局里的洋价	10月4日《晨报》《北京》 专	明明	待考证
大减价	10月14日《晨报》《北京》专栏。	同上	同上
他是中国人么	10月17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早婚与矮子	同上	同上	同上
夜市上的买卖	11月14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拆穿西洋镜	11月16日《洪水》第1卷第 5期	冥冥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 战局	11月18日《政治生活》 第58期	猎夫	
公寓的写真	11月19日《晨报》《北京》 专栏	明明	待考证
减而不减	11月21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长安街上的新剧	11月22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得罪后再借光	12月15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土地与农民	12月30日—1926年2月8 日《政治生活》第62—67期	守常	

### 一九二六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新帝国主义与战争的酝酿	1月6日《政治生活》第 63期	守常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1月8日《国民新报》副刊 第31号	同上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 会上的演说	1月27日《政治生活》第 66期	李守常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 革命史上之位置	3月12日《国民新报》孙 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李大钊	
电车收入渐少的原因	3月20日《晨报》《北京》 专栏	明明	待考证
逛的是什么	3月23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北京现在的三多	3月26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店铺找钱也欺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欠薪机关也不索薪	5月6日《晨报》《北京》专 栏	同上	同上
茶房老爷	5月12日《晨报》《北京》 专栏	同上	同上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 观	5月《政治生活》第76期	猎夫	
吃不得的擦梅汤	7月1日《晨报》《北京》专 栏	明明	待考证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7月22日《政治生活》第79期	猎夫	
一个坐电车的朋友	8月1日《晨报》《北京》专栏	明明	待考证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8月8日《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	猎夫	
守常政治报告	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		
美国之煤油及橡皮问题	10月6日《天津庸报》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11月《政治生活》	李大钊	
守常同志来信(12月5日)	12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 一九二七年

篇名	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	署名	备注
狱中自述初稿	4月	李大钊	
又	同上	同上	
又	同上	同上	
狱中自述	同上	同上	

## 二、诗

岁晚寄友(两首)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李钊	
题蒋卫平遗像	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	
登楼杂感(两首)	1913年9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	李大钊	

笑蒋卫平（两首）	1913年9月1日《言治》李大钊	
	月刊第1年第4期	
咏玉泉	1913年11月1日《言治》	“
	月刊第1年第6期	
有感	“	“
南天动乱，适将去国，	“	“
忆天问军中		
吊圆明园故址（两首）	“	“
筱舫、寿山往阿尔泰诗	1917年4月1日《言治》	“
以赠之	季刊第1册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	“
送别幼蓂	“	“
送别相无	“	“
太平洋舟中咏感	1917年4月1日《言治》	李大钊
	季刊第1册	
寄霍例白		钊
复辟后寄友人	1918年7月1日《言治》	李大钊
	季刊第3册	
山中即景（两首）	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	“
	第5卷第8号	
山中即景（又一首）	1918年8月19日《白坚武	李守常
	日记》第7册	
悲犬	“	“
歌谣选（三则）	1918年10月3—6日《北大	“
	日刊》	
岭上的羊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	李大钊
	国》第1卷第3期	
山峰	“	“
山中落雨	“	“
谚语（两则）	1919年9月28日《新生活》	守常

	第6期	
欢迎陈独秀出狱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	李大钊
	第6卷第6号	
赠小峰	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
吊伊	1922年2月25日《平民》	S.C. 待考证
	第91期	
忆负生	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	S.C. 〃
	副刊《觉悟》	
寂寞	1923年12月1日《新江西》	T.C. 〃
	半月刊第15号	

### 三、信

致霍例白	1916年	钊
致李泰莱	1917年	〃
致郁亮章	1919年	〃
致胡适	〃	大钊
致李平白（4件）	〃	钊
致胡适	1920年	守常
致启明	〃	大钊
致周太玄	1921年	李守常
致胡适	〃	守常
致沈士远	1922年	
致胡适	〃	李大钊
致胡适（2件）	1923年	〃
致周启明（2件）	1923年	李大钊
致胡适	1924年	
致徐秀龙等	1927年1月	李大钊
致革痴	1917年	钊
致北大注册部		

致北大会计课

致蒋梦麟

## 四、讲义

### 唯物史观（北大讲义）

1.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2. 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
3.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4.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5.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6.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7.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未完）

### 史学思想史（北大讲义）

1. 史观△
2. 今与古△
3. 鲍丹的历史思想
4.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5. 韦柯及其历史思想
6. 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7. 桑西门的历史思想△
8.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9.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0.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凡有“△”符号者，曾在期刊或“选集”上发表过）

## 五、译文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

李钊

刊第1年第1期

中国国际法论	1915年出版	李大钊	
		张润之	
精琦民宪法论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 第3期	李大钊	
世界观	“ “	S、C生	
哀音	“ “	守常	
国家与个人	“ “	守常	
西伯利亚制酪协会同盟 会	1922年11月4日《平民》第 127期	S、C、	待考证
我们的价值	1922年12月11日《批评》旬 刊第8期	T、C、	待考证
俄国植麻中央协会	1923年1月《平民》第134期	S、C、	“
Malon 和他的Integral Socialism		大钊	1922年寄 周启明

## 六、图书主任布告等

图书馆主任告白	1918年1月24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3月1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6月5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6月29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9月10日《北大日刊》
图书馆主任布告	1918年9月14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10月14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10月16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10月22日《北大日刊》
图书馆主任告白	1918年10月26日《北大日刊》
“ “ “	1918年11月13日《北大日刊》
“ “ 布告	1918年12月23日《北大日刊》
图书馆主任布告	1819年1月30日《北大日刊》

图书馆主任	告白	1919年5月1日《北大日刊》
" "	布告	1919年5月29日《北大日刊》
" "	" "	1919年6月24日《北大日刊》
" "	" "	1919年9月11日《北大日刊》
" "	" "	1919年11月15日《北大日刊》
" "	" "	1919年11月18日《北大日刊》
" "	" "	1919年12月1日《北大日刊》
" "	" "	1919年12月2日《北大日刊》
" "	通告	1920年5月29日《北大日刊》
" "	布告	1920年6月30日《北大日刊》
图书主任	启事	1920年10月30日《北大日刊》
" "	布告	1920年11月10日《北大日刊》
图书主任	通告	1921年2月4日《北大日刊》
" "	启事	1921年11月4日《北大日刊》
" "	通告	1922年2月4日《北大日刊》
" "	启事	1922年3月8日《北大日刊》
" "	通告	1922年11月20日《北大日刊》

## 七、联合署名的启事、文告

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	启事、简章	1918年2月18日《北大日刊》
为李辛白父丧捐赠聘仪	启事	1919年8月20日《北大日刊》
为北大教授朱蓬仙逝世	发起致送聘仪启事	1919年9月25日《北大日刊》
举行全校教职员公宴庆	祝双十节启事	1919年10月6日《北大日刊》
李超女士追悼大会	启事	1919年11月19日《晨报》
工读互助团募款	启事	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

- 组织北大教职员会启事** 1920年1月20日《北大日刊》
- 北大教职员会起草委员会启事** 1920年2月10日《北大日刊》
- 致函杜国庠等十六人** 1920年8月12日《北大日刊》
- 致函北大教职员会当选委员** 《北大档案》
- 介绍学生工作启事** 1920年4月9日《北大日刊》
- 争自由宣言** 1920年8月1日《晨报》
- 临时国民大会启事及提案** 1920年8月21日《北大日刊》
- 组织“北京大学赠灾会”启事** 1920年9月23日《北大日刊》
-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 1920年12月4日《北大日刊》
-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启事** 1921年6月26日《晨报》
- 关于召开教职员会的公开信** 1921年12月8日《北大日刊》
- “俄国灾荒救济会”函** 1922年2月28日《北大日刊》
- 紧要通告** 1922年3月13日《北大日刊》
- 速开全校大会启事** 1922年4月28日《北大日刊》
- 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
- 谭陈纬君夫人行状** 1922年6月24日《北大日刊》
- 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1922年6月1日《少年中国》第8卷第11期)
-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1922年9月24日《晨报》
- 全校同人公鉴** 1922年10月7日《北大日刊》
- 上书大总统请罢免彭允彝** 《北大档案》



- 致函顾维钧敦促迅速恢复中俄邦交 1924年2月16日《晨报》
- 再次致函顾维钧 1924年8月22日《晨报》
- 致电各级党部，严驳“西山会议派” “192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第11辑”

## 八、有题无文（或残文）

- 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 1920年6月20日《晨报》
- 图书馆教育 1920年8月8日《晨报》
- 自然与人生 1920年11月28日《少年中国》  
第2卷第7期
- 社会与个人 1921年7月30日《晨报》
- 工人的国际运动 1921年12月21日《北大日刊》
- 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 1922年11月7日《晨报》
- 社会主义的将来 1922年12月28日《北大日刊》
- 印度问题 1923年1月9日《北大日刊》
-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 1925年1月19日《京报》
- 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比较观 1926年3月1日《京报》
- 原杀
- 西洋伦理学史 在北大，女高师等所开课程
- 社会学 // //
- 女权运动史 // //
- 图书馆学 // //
- 现代政治 // //
-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 //
- 社会主义同盟草案 (见《李大钊先生传》)

- 对社会的告白 (见何干之《纪念革命前驱李大钊》)
- 新旧同志的分别 1924年《国民日报特刊》
- 致鲁迅(三封) 《鲁迅日记》
- 致白坚武(六十余封) 《白坚武日记》
- 致天问信及长诗一首 1919年

编者注：这个目录是在已见目录基础上加上我们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新发现的著译汇编而成。供研究、参考、订正。

## 编 后 记

李大钊同志作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有一本如实记载他光辉一生的《年谱》，以便后人学习和研究。为此，我们于1979年5月着手编写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反映出大钊同志的生平和革命事迹，我们查阅了从1909—1927年有关的报刊和档案，通读了迄今为止已搜求到的他的著作、诗文、书信、演讲、“启事”、“布告”等。访问了他的亲属和与他共过事的罗章龙、刘仁静、张申府等多人。但是，由于有关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的历史档案资料保存甚少，难以查找，他的手稿又几乎全部遗失或被烧毁，加之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所限，所以本书难免有遗漏甚至错误之处。现先内部付印，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补充和订正。

本书在编写中，承蒙张静如、马模贞、姚维斗、黄真、张守宪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市委党校、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等单位提供了许多方便，谨此志谢！

编 者

1980年9月